



#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9 年总第 9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 **16th**  
2003-2019  
ANNIVERSARY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16届全球年会 (F20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19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 全球稳定：新变局、新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发展，如何把握全球经济、金融趋势中的“变”与“不变”，如何完善和发展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 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 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从创立至今, 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 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 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 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 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 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 特此说明。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会刊  
2019 年总第 9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 (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大会主席 / Chair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联合主席 / Co-chair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陆克文 Kevin Rudd  
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周小川 韩升洙 肖卡特·阿齐兹 赫尔曼·范龙佩 若泽·曼努埃尔·杜朗·巴罗佐  
ZHOU Xiaochuan, Han Seung-soo, Shaukat Aziz,  
Herman Van Rompuy,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让-克洛德·特里谢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Jean-Claude Trichet, Edmond Alphandéry, Domenico Siniscalco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周汉民 祝宪 林建海 梁锦松 梁维特 洛朗·法比尤斯  
Sultan Bin Nasser Al Suwaidi, ZHOU Hanmin, ZHU Xian, LIN Jianhai,  
Antony Leung, Leong Vai Tac, Laurent Fabius  
珍妮·希普利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埃内斯托·塞迪略  
Jenny Shipley,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Ernesto Zedillo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吉耶尔莫·奥尔特兹·布莱恩·佩斯科 戴青丽 李纪珠  
Mehmet Simsek, Guillermo Ortiz, Bryan Pascoe, Deborah Lehr  
Dr. Jih-Chu Lee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安雅山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钮小鹏 方风雷 李梅  
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 Yasser Elnaggar  
James Rothschild, Rick Niu, FANG Fenglei, Li Mei  
史蒂芬·格罗夫 张红军 弗兰克·里斯伯曼 李彤  
Stephen P. Groff, ZHANG Hongjun, Frank Rijsberma, Li Tong

编委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SONG Min, NIE Qingpi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F22, Pearl Development Building, Hengli Tow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E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独家拥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2019 年 11 月 22-24 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在广州举行。本届年会以“全球稳定: 新变局、新发展”为主题, 邀请国际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200 余人汇聚一堂, 全方位探索金融创新和稳定发展之路, 积极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思想和经济增长新思路。

本届年会共设置 30 多场对话和讨论, 包括政策对话、领袖对话、丝路国际联盟大会、国际资本市场峰会、国际金融科技峰会、国际绿色发展峰会以及区域圆桌会议等。议题涉及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贸易秩序变革与货币支付体系、大数据、未来货币形式与金融监管、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以及中欧经济金融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等。

作为创立于中国, 由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外交及战略智库平台,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专家学者,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和合作伙伴关系。国际金融论坛 (IFF) 正日益重要地发挥着“非官方 G20”的作用, 成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进一步充分利用和发挥全球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研究智库和人才培养这五大功能, 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我们特别出版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 (F20 峰会) 特刊, 以共享智慧与真知灼见。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稳定：新变局、新发展**  
**Global Stability -**  
**New Transition, New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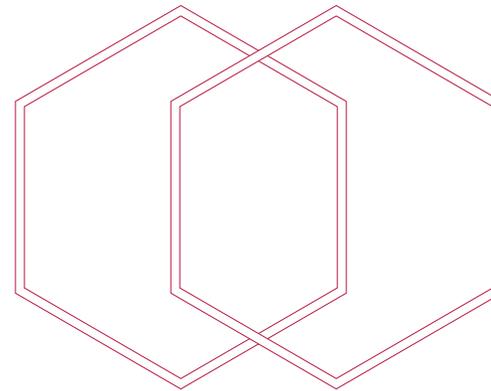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 目录 CONTENTS

国际金融论坛 (IFF) 2019 年全球年会以“全球稳定: 新变局、新发展”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财经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人分析研判经济形势, 共同探讨应对之道。



## P8 / 大会开幕致辞

韩升洙 IFF 理事会主席  
韩国前总理  
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李 希 广东省委书记  
周小川 IFF 大会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 P15 / 开幕大会 —— 全球稳定: 新变局、新发展

范龙佩 IFF 联合主席  
欧洲理事会前主席  
比利时前首相



阿齐兹 IFF 联合主席  
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罗约 IFF 理事  
菲律宾前总统  
菲律宾众议院前议长

梁 涛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  
李 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洛朗·法比尤斯 IFF 理事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  
法国前总理

迈克尔·诺贝尔  
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

## P29 / IFF 政策对话 (1)



## 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金融系统

### P40 / IFF 政策对话 (2)

全球货币未来: 大数据、未来货币形式与金融监管

### P47 / IFF 政策对话 (3)

全球贸易秩序变革趋势与货币支付体系竞争

### P55 / IFF 政策对话 (4)

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影响



### P64 / IFF 圆桌会议 (1)

如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 P77 / IFF 圆桌会议 (2)

中国对外开放圆桌会议: 新一轮机遇

### P90 / IFF 圆桌会议 (3)

中国 - 中东金融合作圆桌会议

### P102 / IFF 领袖对话会 —— 全球新形势下的中欧经济金融深度合作

### P111 / IFF 峰会 (1)

2019 丝路国际联盟大会 (I): “一带一路”促进全球新增长



### P123 / IFF 峰会 (2)

国际资本市场峰会 —— 资本市场: 开放、创新和新未来

### P135 / IFF 峰会 (3)

国际金融科技峰会: 金融科技的应用

### P145 / IFF 峰会 (4)

国际绿色发展峰会: 全球碳定价机制会议

### P152 / IFF 峰会 (5)

2019 丝路国际联盟大会 (II): 金融服务“一带一路”



### P164 / 区域圆桌会议 (1)

中国 - 东盟金融圆桌会议

### P181 / 区域圆桌会议 (2)

中国 - 拉美金融圆桌会议

### P194 / 区域圆桌会议 (3)

两岸金融圆桌会议: 开放、互通、融合

# 加强国际合作， 共创繁荣和稳定的未来

■ 韩升洙 / IFF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这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的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到贸易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如果中美的贸易局势恶化，还会导致2020年全球GDP增速进一步下降0.8个百分点。

当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发达经济体生产力提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增速急剧下降、英国脱欧、通货膨胀，以及未来货币政策缺乏运作空间等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下行压力。

面对经济增长迟缓的压力，很多国家包括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这些年普遍采取了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一些大型经济体的利率一直在走低。事实上，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一些投资者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会承担更多的风险；另一些投资者在观望，以防范未来风险。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国乃至全世界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中国是亚太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三分之二。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十年来的高速增长经济和正面的外在因素，是避免全球金融危机扩散到亚洲经济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3万亿美元GDP规模的巨大全球化经济体，所采取的行动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中国想要继续从全球化中受益，并且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就需要找到一个政策方案使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个正面外溢效应，从而保障全球化的可持续性。

其实中国进行一些政策性的改革也符合自身利益，比如说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会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航者。再比如降低贸易壁垒，尤其是有关投资的壁垒和简化政府采购流程，会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提升生产力，这些都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



韩升洙

改善。

在2019年11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强调中国要进一步开放。中国新的《外商投资法》将会给外商提供国民待遇，并通过强有力的法律规定来保护外商投资者和知识产权。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目前一些非常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失去了诸多信任和稳定性，为了开辟下一段路，我们需要共同信任、共同合作。

过去70年，多边主义所带来的安全和繁荣需要进一步延续

和提升。我们要更加努力，争取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平等和繁荣，我们要携起手来发展更强有力、更公平的全球经济。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金融科技的变革带来很多机遇和风险，无论是机器人、大数据还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技术都会创造新的产业、新的

## 大会开幕致辞

加强国际合作，共创繁荣和稳定的未来

韩升洙，IFF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9

开创广东国际金融合作发展新局面

李希，广东省委书记

11

金融监管须跟上全球经济金融创新的步伐

周小川，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3



就业机会。我们应当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移动通讯设备、手机的发展虽只有十年,但已经彻底改变了银行业的基本生态环境,有些大型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也受到了科技初创公司的威胁,这绝对是一次大变革。而中国完全有机会,利用这些新技术释放金融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让那些没有被金融体系服务的人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所以,在科技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多边合作,才能确保全球化和科技化的好处,能够更平等地惠及所有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跨国或者世界问题。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多边主义,因为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好新科技,共创一个繁荣和稳定的未来。我真心希望国际金融论坛 (IFF) 可以在这个使命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促进未来的多边主义。

## 开创广东国际金融合作发展新局面

■ 李希 / 广东省委书记



李希

初冬时节,美丽的花城广州依然花繁木秀、生机盎然。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在珠江之滨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财经精英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格局深刻变化,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深刻指出,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举措,共建开放合作的世界经济,共建开放创新的世界经济,共

建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包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这表明了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的决心,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东当好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和国际社会观察我国的重要窗口。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选择永久落户广州,并以“全球稳定新变局、新发展”为主题举办本届年会,对广东更好地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为金融开放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广东正面临新的重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按照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广东正携手港澳全力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

示范,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全力支持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高地,法治城市的示范,城市文明的典范,民生幸福的标杆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和全球的标杆城市。全力支持广州在城市的综合功能、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广州与深圳比翼双飞,牵引推动珠三角核心引擎,沿海经济带主战场,北部生态发展区在各自赛道上赛龙夺金,全省加快形式“一核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新格局。重大国家战略在广东的实施,正推动广东实现“一子突破,满盘皆活”的生动局面,使广东的经济在各种风险挑战中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

**广东未来还将为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更加巨大的空间,无论是支持实体经济还是服务民生社会事业,无论是大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还是支撑“一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金融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2019 年前三季度，广东的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都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4%，全年将突破十万亿元人民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继续稳居全国第一，华为、腾讯、广汽、雪松、美的、格力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迸发出强大的动力。广东经济加速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在广东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金融业增加值约占全国的九分之一，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广东做出了先行的探索。广东未来还将为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更加巨大的空间，无论是支持实体经济还是服务民生社会事业，无论是大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和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还是支撑“一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金融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发展空间。

全球贸易秩序的新变化，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绿色发展的新趋势，都对全球金融发展和变革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机遇与挑战，唯改革创新者胜，唯开放合作者强。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深圳强化科技金融优势，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广州将发挥老城市新活力，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焕发新的生机。广东不仅将在改革、开放、创新中进

一步地发展自己、强壮自己，也必将为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创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多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机会。

面向未来，广东将奋力书写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篇章，我们诚挚邀请在座的各位朋友多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更深入地认识广东、了解广东。广东愿与海内外的朋友们真诚合作，互利共赢，为推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 金融监管须跟上 全球经济金融创新的步伐

■ 周小川 / IFF 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小川

很荣幸参加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国际金融论坛已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论坛，在推动经常性对话和交流，进行高层交流，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政策，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9 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十字路口。2019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9 -2020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3.5%，目前这一预测已经下调到 3.2%，这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一个预期。全球的领导人都表达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忧虑，因为经济可能会走向长期慢速增长，并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对社会和经济政治的影响。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贸易紧张度增加、保护主义抬头，已经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而且不仅影响全球经济的分工和货物的交换，也影响了全世界投资者的信心，

使得未来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国际合作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把我们带到前所未有的状态。负利率、长期的通缩和财政不平衡，给全球政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也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全球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

这些情况都意味着我们更需要进行交流和对话，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强韧的经济体系，推动全球增长。幸好，这些贸易紧张和金融的波动反而增强了很多人对全球交流和合作的信心。在今天这个会上，我很期待在以下几个话题上与各位进行交流。

**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对话。**增强全球的理解与互信，这是贸易和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希望贸易摩擦不会继续升级。刚才韩升洙主席谈到全球贸易状况，提出面对贸易摩擦，要强化世贸组织的改革，需要提出合理的建议，并讨论增加跨国投资以及很多可能影响各个国家利益的情况。现在有一些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为借口阻挠跨国投资的情况，这会带来一种

风险，会让全球化倒退，而且会对全球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造成威胁。

**其次，我们希望严谨地研究货币政策。**面对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出现的情况，希望研讨推出电子 SDR 作为全球货币的一个基础。研究一些关键的国内问题，现在各个国家国内宏观经

济管理都面临一些挑战。在目前低通胀的环境情况下，需要严谨地研究货币政策，要明确货币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否要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如宏观货币政策与大家关心的全球资本市场关系，可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资本市场来分配全球的储蓄，提高储蓄效率，同时来预防市场的分化。

*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把我们带到前所未有的状态。负利率、长期的通缩和财政不平衡，给全球政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也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全球经济及其各个组成部分。*



**第三，我们希望金融监管要跟上全球经济和金融创新的步伐。**收入再分配会有很大的影响，要特别留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同时，要充分考虑全球气候变化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此外，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技术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可以让我们重建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和互联互通。我想说，金融科技也能够带来全球金融业很多的机遇，如互联网支付和分布式账本技术，需要专家们更深入地讨论这些新的发展趋势。

中国正在进入转向高质量发展以及深化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近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强了改革，比如利率开放和汇率的灵活性。同时，中国也在加速开放金融业，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是中国持续将其经济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证据。这些努力也证明了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对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期待。刚才李希书记的讲话也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了广东省的最新情况，知道广东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共同探讨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可能遇到的政策挑战，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外，中国还将继续贯彻“一带一路”倡议，这也是我们会议的主题之一。这次会议是 IFF 第 16 届全球年会，另一个是可以看到我们 IFF 的标识，可以看到“F20 峰会”这一提法，也可以看到我们想为 G20 峰会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另外可以看到，还有丝路国际联盟，“一带一路”也是本届 IFF 全球年会的主题之一。

我希望国际金融论坛 (IFF) 能够继续为我们提供一个场景、提供一个机会，让世界上最杰出的领导人进

行思想碰撞，提出最好的想法和建议，为未来全球经济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

## 开幕大会

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如何维护多边主义	16
范龙佩,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一带一路”给巴基斯坦改革和发展带来机遇	18
阿齐兹,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以科技创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9
阿罗约, 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菲律宾众议院前议长	
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 为金融稳定发展提供制度和机制的保证	21
梁涛,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	
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23
李超,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气候风险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25
洛朗·法比尤斯,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	
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可持续发展	27
迈克尔·诺贝尔, 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	

# 全球化的影响以及 如何维护多边主义

■ 范龙佩 /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范龙佩

全球化是一个巨大而广阔的概念，其范围涵盖经济、体育、娱乐、文化、旅游、气候、移民等众多领域。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急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使“地球村”概念家喻户晓。然而，经济全球化虽然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有大量弱势群体并没有从中获益。他们仍然是本地人，没有成为“地球村”的“村民”，而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拉大了城乡差别和代沟，也带来了文化冲突。此外，我们也担心新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的高峰已经过去，2012-2016 年期间全球贸易总量每年只增长了 3%，大约是之前 30

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半。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受到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被严重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境贷款的增长率近 10 年来也一直在放缓。此外，还有一些保护主义之外的因素给全球贸易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公司的供应链越来越短，它们的生产地离销售市场越来越近，这可能源自于监管或政治方面的原因。

全球化也带来了大量的无序人口迁移，从而催生了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这些趋势的一个侧面。比如说，非洲人口爆增，可能在本世纪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一块大陆，欧洲作为非洲的邻居，已不能承受非洲移民数量。全球化尤其是贸易的便利以及各国的经济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实现了脱贫，期间发达经济体市场为移民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在过去的全球化模式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种互补、共赢的局面，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全球和睦。但是，在全球和睦中也伴随着一些国家国内的分化，并最终威胁到了多边主义框架，甚至是全球化自身的可持续性。

那么，我们如何维护多边主义的 future 呢？

我们要认真考虑经济增长的平等性。在国家层面，

各国政策都开始转移到社会和民生上。推动创新的变革不应该是一个零和游戏。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可以鼓励更多的经济活动，对大量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欧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一方面，我们需要依赖自由市场，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补偿性的区域政策。政府公共部门有责任对于这个自由市场

做一些调整，但如果政府的干预过多，就会形成保护主义措施，对人民的生活质量起到负面影响。

**气候行动融资须与公正转型融资齐头并进，例如投资于全民社会保护、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以及开展为新经济培养新技能计划。我们必须提高透明度并强化问责制，以便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净零未来的进展，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洗绿”。**

我们应该选择开放，但是开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有国家都要遵循市场的游戏规则。多边框架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来自于公平和自由的贸易。如果发生纠纷，需要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化解矛盾。如果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失效，那么各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措施。

欧盟的态度是要坚持对话、遵守原则。我要强调欧盟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的强力支持者，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意识到不可能依赖进口的技术，在战略性的领域我们需要自己的顶尖公司。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主权。欧盟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英国现在要脱欧，但是其出口市场的一半在欧盟，而服务和产品的出口不如资本全球化的程度。当前，资本只有 G20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层面，比如欧盟的框架内才能够得到稳定。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现在欧洲中央银行是唯一的银行监管机构，与此同时很多措施都还是国家层面的，但是只有通过这些政策协调，我们才能够往同样的方向努力。为应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都增加其货币供应以避免通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随时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一些政府又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不能替代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是什么呢？我们本来应该解决贸易战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现在极低的利率带来了过度投资的风险。目前全球私人或政府债务都远远超出十年前，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金融市场扩张得太大了，已经承担了太多投资风险。现在这样的扩张型货币政策一旦产生下一场金融危机，就会影响到政治层面，很多国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居民的储蓄也会受到影响，老年人的储蓄会萎缩，年轻人的负债会增加。所以，货币政策能发挥的功能是有限的，很多需要政治方式解决的问题，现在却依赖货币政策来解决，包括贸易战，包括脱欧。问题越早解决越好，不然如果再次发生全球金融危机，要找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应对政策就更难了。过去这些年来，全球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大幅度下滑，同时政治矛盾增加，现在这种政治气氛一旦未来发生经济危机将会成为很大的负担。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只有在遇到巨大危机时才会协作，欧盟就常常是这样。实际上，在平常时期，我们也需要加强多边合作，这样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才能做到从容应对。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混乱当中建立秩序，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解决扭曲市场的补贴问题。现在

的问题是，市场情况变化了，但是世贸组织解决问题的机制没有变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适应新的经济关系。世界各国应该共同采取措施，建设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而不应该互相斗争。

欧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现在 G20 的发展令人失望。金融危机后 G20 变成一个讨论的场所，而不是决策的中心，全世界几乎没有跨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同。另外，还有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亟需解决，比如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债务水平，以及他们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因此，现在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这不是一家新机构或者一个政府能够解决的，全球治理需要各个机构及各国政府共同协作，需要各方面都贡献他们的力量。没有全球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有共同的责任，要以全球的视角，才能更好地保护每个国家的利益，只有走合作共赢这条路才能实现繁荣。全球化未必就此失败了，我们不应该退出全球化，也不应该让全球化退步！

## “一带一路”给巴基斯坦改革和发展带来机遇

■ 阿齐兹 / IFF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齐兹

生活中唯一可以确定就是变化，每一个国家、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都在参与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今世界有很多变化在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很多国家在不断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我想告诉大家，“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倡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举措，它正在给很多国家带来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它是我们见到过最好的与邻国互助、共同发展的理念之一，巴基斯坦很荣幸成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我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及其执行的透明度感到自豪。虽然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倡议，我今天也不想花太多时间解释它是什么，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原总理，为了巴基斯坦的发展需求，我曾负责保证“一带一路”项目的执行和实施。传统意义上的援助，给予支持，但经常要求被援助方采用一种特定方式来接受。“一带一路”更愿意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来提供合作，这种做法令人钦佩。我相信中巴两国通过“一带一路”深入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我任巴基斯坦总理期间，与中方一起推动了第一

个“一带一路”项目在巴基斯坦的落地，而今瓜达尔港口的建立和发展，让巴基斯坦拥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出海港口，这个看似简单的项目，却已为整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

没有一个国家坐着不行动就能实现其发展目标，各国都需要进行发展和改革包括巴基斯坦。进行改革的国家都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变化，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很多国家将要做的事情。

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欢迎大家到巴基斯坦来看一看“一带一路”项目修建的道路，很多人说这些道路简直堪比机场的跑道。“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标准很高，中方还把项目相关技术转让给巴基斯坦。我认为技术转让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

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改革，发达国家也需要改革，我在很多国家居住过，包括发达国家，所以深知这一点，当然我相信发达国家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一定要走上这条发展变革、走向繁荣之路，每个国家、每个公民都将从中获得更好的机遇。

现在有很多“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在巴基斯坦落地，我相信还会有更多项目上马，包括建设自来水网络等无附加条件的项目。这些项目只是为了增进国家之间互助和信任，因为邻国繁荣，地区就会稳定和平，和平才能促进国家发展，进而促进全球的发展。总之，“一带一路”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变革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提升很多人生活水平的合作机制。

## 以科技创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 阿罗约 / IFF理事、菲律宾前总统、菲律宾众议院前众议长



阿罗约

2019 年 11 月，菲律宾代表团来到广东佛山会见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该公司成立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际。创始人杨国强曾是一名农民，后转职做工人。2005 年，杨国强就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了女儿杨惠妍——也是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惠妍从而成为了富豪排行榜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的女人。

我此次实地考察的是佛山碧桂园集团最新修建的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正在生产智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制造和安装各种节能建材。我们见到了机器人生产的产品，也见到了机器人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场景，这些曾经是科幻小说里的内容，充分展现了现代机器人的发展和中国科技的进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离不开科技发展，中国 40 年的发展实践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第一，制定发展目标；第二要改革开放；第三，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第四，要重视科技发展。

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的大国，也是一个创新的大国。中国实现累计超过 7 亿人脱贫，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碧桂园、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它们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曾表示，机器人、无人驾驶、区块链、3D 打印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技术的发展，会加快推进社会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也会导致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甚至威胁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可能也会受到一定冲击，比如说如果机器人取代工人，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会受到深刻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一方面要加强科技教育，一方面也要培育新的就业领域，比如社会工作、媒体工作、娱乐工作、医疗护理工作和信息工作等不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领域。

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如何达成一种共赢呢？习近平主席曾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菲律宾与中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发展对于菲律宾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现在在菲合作共赢关系受到一些挑战，一些国家或个人对于多边主义的信心有所动摇，美国开放的贸易政策受到了保守派的很多谴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障国际贸易局势的稳定呢？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中国向世界表明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中国将始终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此外，我们也需要构建数字经济监管规则，例如依据数据流通和电商的规则构建公平的、可信的全球贸易体制。对于金融领域方面，我有两点补充：

一是中国对于共同发展的理念，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比如说世贸组织所管理的都是国际贸易体系的软件，但是它需要一个配套的硬件设施，即基础设施建设，这正好是“一带一路”所要解决的问题。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先提出“一带一路”要突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搭建一个融资平台，来保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运行。我非常荣幸参加了丝绸之路国际产业联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探索如何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促进国家之间贸易稳定发展，尤其是中国与它的合作伙伴之间贸易关系的稳定。

二是通过金融科技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环境。例如，微信金融服务，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尤尼斯先生用科技平台提供的小型贷款和微型贷款，这样才能实现包容性的金融，才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保证经济稳定和繁荣。

国际金融论坛（IFF）强调金融合作，依据新的路线，新的发展趋势，可以探索如何促进普惠金融和包容性金融的发展，保障世界贸易体系的稳定，推动全球数字贸易和现代化发展。

## 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为金融稳定发展提供制度和机制的保证

■ 梁涛 /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



梁涛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具体到金融方面同样需要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为金融稳定发展提供制度和机制的保证。

下面我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看法。

### 一、维护金融稳定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都把维护金融稳定作为核心任务，采取了包括完善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优化金融结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目标就是提高金融业的治理能力，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降低金融危机的破坏力。金融稳定与社会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监管组织，推出了一系列监管改革措施，提高监管的标准、推动监管合作，以增强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

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金融局势已然错综复杂，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趋于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为应对经济下行，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回归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投放，下调了货币水平，对新兴经济体汇率资本市场的稳

定和市场流动性产生了外溢影响。一些国家已处于负利率的状态，货币政策空间压缩；一些国家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导致政府债务水平、赤字水平大幅度上升；有的国家已经面临财政困难；还有的国家则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摩擦加剧，进一步阻滞了全球经济增长。

另外，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也在威胁着全球经济市场的稳定。总体看，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不容乐观，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递减，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维护金融稳定依然任重道远。

### 二、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

近年来，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企业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风险总体可控，为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总的来看，我们维护金融稳定具备不少有利的条件。

首先是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优化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加快，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绿色环保、居民服务等新的领域、新业态蓬勃发展，为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2019年三季度末，位于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科技服务业的银行贷款同比增速分别达到42.1%、17.4%、35.3%，明显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0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接近10%。

第二，宏观政策得到空间和弹性，我国宏观政策弹性充足，政策回旋余地较大。逆周期调节不断加强，为实现内稳的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驾护航。近年来，我们有序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为化解金融风险提供重要保障。

第三，存量金融风险有效释放，防范化解风险的经验更加丰富。过去几年针对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坚决整治金融市场乱象，2017年以来压缩了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稳妥处置部分金融机构风险，有序化解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总的来看，金融领域的野蛮生长的现象得到了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状态转向收敛。我们

也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防范化解风险的经验。

第四，金融业保持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重要金融机构运行稳健。我国金融机构的拨备和资本充足，银行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达到 6.7 万亿元，拨备覆盖率超过 180%，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14.54%，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达到 247%，具有较强的损失吸收和风险抵御能力。

银行业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核销力度，过去两年共处置不良贷款 4.9 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在 2% 以下，为更好地应对风险腾出了空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经营稳健、管理规范，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当前金融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风险问题，金融业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还存在较多的风险和隐患。部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条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三、增强金融业治理的能力，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增强金融业治理能力，首先要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信贷的顺周期特征会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在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可能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要进一步加强逆周期的调解，完善金融机构尽职免责和激励考核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推动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

此外，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和同业网络中传播。进一步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稳妥处置风险水平高、行业竞争少的机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交易对手的管理，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防止单家机构的风险蔓延引发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还要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超过 5000 家，但是机构种类不多、业务模式相近、客户选择集中。一些热门的行业和客户多头融资、过度融资的问题严重的同时，部分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获得金融支持较少，或者没有合适抵押物的企业无法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金融供给的适应性、普惠性明显不足。而要大力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中小银行要改进商业模式，找准发展的定位，不求大而全、专注小而美。切实发挥扎根当地服务小微的积极作用，金融业要善用新兴技术，充分发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手段，解决小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充分发挥股东、管理层、员工等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形成激励机制，推动金融机构沿着正常的方向发展，有效地应对内外部风险。所以要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内控机制和风控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科学设定内部激励考核体系，减少规模和速度等数量指标，增加风险防控、服务实体经济效益提升的质量因素，完善综合体系。

要进一步加强合规建设，把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作为开展业务前提和底线，其他参与金融活动的机构也必须遵守监管规则纳入框架。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要持续提升监管能力，加强金融监管，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防火墙，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让制度的防火墙防火，让监管的高压线带电。规范金融运行范式运作力，提高监管的前瞻性、预见性。对于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减少风险损失和处置成本。

要加强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指导金融机构开展不利情景下的压力测试，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应对预案，把问题讲得严重一些，把风险应对准备措施做得充分一些，努力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筹金融监管资源、形成监管合力、消除监管套利，共同维护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

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消除风险薄弱环节，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国际金融监管的举措，对促进世界各国乃至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在当前金融体系面对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宏观经济的协调性，结合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推广监管措施在全球范围内一致有效实施，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完善跨境风险处置机制，提高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业治理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更加有效地维护金融稳定。

增强金融业治理能力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既是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责，也是每一家金融机构和每一个金融参与者的共同责任，需要我们相互支持、携手努力。借此 IFF 全球年会契机，我要衷心地感谢关心中国金融业发展，支持中国金融业监管事业的各国友人和各界朋友，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同心协力，共同为增强金融业的治理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做出新的贡献。

# 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 李超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李超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下行压力加大。但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孕育兴起，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新的变化，中国将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变革，以及发展动力变革。

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降低宏观杠杆率，支持科技创新，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独特的作用。为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投融资功能，提升金融体系与供给需求体系的配套已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2019 年以来，中国证监会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走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着重于优化资本市场供给，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推动创立科创板，并使试点注册制改革顺利落地。自 2019 年 7 月份开始以来，科创板总体运行平稳，已有上市公司 56 家，市值超过 7000 亿元，发行上市、交易、

持续监管等改革后的基础制度初步经受了市场检验。

二是完善有助于直接融资功能发挥的制度安排，坚持新股发行常态化，提升融资便利性，修订《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创业板重组上市。《上市公司分拆上市再融资制度规则》已经完成，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三是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我们公布了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九条措施，其中放宽外资从事证券投资和基金托管业务准入，全面推开 H 股全流通改革，扩大期货品种范围等六项措施已经落地实施。A 股平稳纳入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沪伦通”、“中日 ETF 互通”也正式启动。2019 年前十个月，沪深两市共 143 企业完成 IPO，合计融资 1624 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 8394 亿元，全市场并购重组交易金额 1.42 万亿元，交易所市场发行各类债券 6.16 万亿元，其中公司债券 2.59 万亿元，均超过了 2018 年全年的水平。

近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其中流入股票市场超过 2400 亿元，显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有信心。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资本市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成熟高效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也离不开强大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资本市场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的支持。从上市公司看，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粤港澳大湾区有 A 股上市公司 563 家，合计市值 10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5% 和 18%。从中介机构看，注册在广东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都位居全国前列，一大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汇集于此，中介机构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近年来，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运行，“基金互认”的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总体来看，资本市场在服务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新格局中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国证监会将深入贯彻并全面落实这一精神，并且以关键制度创新来促进市场健康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增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能。我们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升多层次市场体系覆盖面和包容性，坚守科创板定位，支持和鼓励拥有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硬科技企业上市，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深化新三板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的试点，加强各层次市场有机联系，促进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充分发挥科创板试验田作用，逐步复制推广科创板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实行更加市场化的发行定价机制，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等机制，完善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制度，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是持续强化监管，推动市场主体建设，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增量，调整存量，畅通多元化的退市渠道，完善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完善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提升行业机构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是加快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2020 年全面取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的外资股比的限制，加

快修订 QFII、RQFII 相关的制度规则，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投资范围，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拓展外资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住”。

五是着力优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机制，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增加资本市场法治供给，加大违法成本和惩治力度，强化法治诚信约束，通过强化监管和制度革新，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成为各类投资者可信赖、有价值的市场。

## 气候风险 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 洛朗·法比尤斯 /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



洛朗·法比尤斯

最近有一项研究向很多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威胁世界稳定的风险是什么？回答首先就是核冲突，第二是全球变暖，第三是恐怖主义。我想简要从气候风险角度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稳定的风险之一。**从空间和时间上来说，气候变化都是很大的风险。从空间上来讲，目前全世界都已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影响；从时间上来讲，我们今天所做的抉择会影响到未来人类的世世代代。气候变化是对发展的一个挑战、一个威胁，它的后果不仅是生态上的，而且会影响卫生和民生状况。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约有数百万人因为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尤其不公平的是：最贫困的人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而贫困人群其实是排放最少的群体。

据专家估计，到 2050 年的时候，将会有超过 10 亿人生活在易发生气候灾害的地区。可以想象，未来气候变化将会对很多地方的社会稳定、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威胁，因为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贫困人群，同时也会影响富有群体。

2018 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达到了 3400 亿美元，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说现在有一个“碳泡沫”理论，就是无序的低碳转型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我们必须认识到从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会带来重大社会影响和金融风险。因为不再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转型采用新燃料，可以想象将对很多化石燃料领域造成巨大冲击。如果低碳转型缺乏充分的规划、准备和控制，其造成的后果将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严重。

### 我们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并确保全球稳定呢？

为了说明现在面临的威胁，我拿这张纸演示给大家看。想象一下，这张纸代表着现在在全球化石燃料的排放量，要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到 2030 年全球碳排放量必须减少 50%，到 2040 年再对折，2050 年再缩小一半，即使这样仍然会有数万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想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金融稳定，需要遵循一些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多边主义。**作为 2015 年 COP21 大会主席、《巴黎协定》签署的主持人和见证人，我要特别向中国致意、向习近平主席致意，向联合国、向欧盟致意，如果不是他们强有力的多边努力，《巴黎协定》是不可能签署成功的。

多边主义是成功的关键，我们需要执行碳定价机制，而这个机制必须是多边主义的，才能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有一个概念叫“气候团结”，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气候团结”呢？比如气候基金，这个基金已经为 100 多项气候变化缓解和应对项目融资，项目投资额有 1500 亿美元，这些项目的范围包括节能减排、可持续能源和清洁能源等，从巴基斯坦到越南、埃及都有项目投资。我们希望把《国际环保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传达至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并体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决策当中。

**第二个原则是需要程序。**决策部门需要选择有社会责任性的投入，很多有责任心的金融机构已经作出了这个选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宣布把可持续性纳入其投资的审核标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也宣布要制定减排的目标。还有欧洲投资银行最近宣布停止投资化石燃料项目，也就是 2021 年之后它不会投资煤、碳、气、油、石油项目。因为有气候变化的要求，金融机构在做出深刻的改变。

**第三个原则是提升投资的公平与社会正义。**“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项目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是绿色的“一带一路”，它可以投资建立了很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绿色项目。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些投资的公平和社会正义。我们的金融工具如果要受到更广大人民的欢迎，就需要在投资中考虑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的风俗和不同个人的偏好，需要更加具有包容性。

气候变化和金融稳定有着非常紧密的相关性，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搭建一个公平、平衡、可持续性、稳定的世界。

## 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 推动可持续发展

■ 迈克尔·诺贝尔 / 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主席



迈克尔·诺贝尔

过去几百年，很多国家先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比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以及二战后的美国。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未来制造业和销售的重心应该是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比如像以广州为代表的开放和发达地区。

成为世界大国同时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不仅要对本国国民负责任，也要对全世界的人民负责任。人类在 20 世纪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包括污染、全球变暖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滥用。

举个例子，像新德里这么一个大城市，空气质量可能已经不适宜居住，这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现象。人类过度利用能源、食品、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资源，对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地球的很多资源在被无限制消耗中急剧恶化，比如过度捕鱼、过度伐木、过度开采等。现代农业过于依赖对化肥的使用，这些化肥和化学品渗入湖泊和海洋，造成水污染非常严重。空气也受到了污染，造成了大量健康隐患。气候变化导致的南北极冰层消融会使海平面上升，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

我们亟需改变能源使用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方法。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这个基金成立于 2007 年，致力于减少世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在农业、林业、工业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和可持续的利用方法。这项工作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实践上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确保未来人类生活的繁荣和舒适。中国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努力投入环保的同时，也促进和发展了本国经济。

我很高兴看到广州已经在接受、鼓励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转型。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无污染、惠及民生的环境。这需要从年轻人做起，为此，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和一些高校合作，将建立一个针对年轻人的可持续发展大奖，由基金会和牛津大学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选、发布。

我们希望给这些年轻人提供资源，让他们做可持续方面的研究，提名标准如下：第一，研究的技术具有优化自然资源使用、改善生态服务的能力；第二，要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第三，研究成果可以为环境治理带来积极的影响；第四，不能是纯理论研究，要具有可推广性且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因为有些研究成果是纸上谈兵，无法投入生产或推广使用；有些研究成果，能够商业化推广成为实实在在改善环境的产品。我们要支持研发的是具有商业推广和实用价值的技术和产品。我们计划每年都颁布这个奖，获奖者和四位提名人将会在基金会的可持续大会获得该项荣誉。

123 年前，我的先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将他的一切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成立诺贝尔奖委员会。然而，我们现在要成立的这个基金，并不能直接收到诺贝尔奖基金会的钱，而是要依赖外部的融资渠道。目前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摩纳哥的宪法储备基金以及一位慈善家斯蒂文的捐献。我们的基金约有三亿美元



的规模，基金会的活动预算主要来自于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国家和大学的资助。第二个渠道就是慈善，也就是由慈善家直接给钱。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方法，因为如果捐钱给慈善机构，有一部收入是可以免税的。第三个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渠道，那就是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比如 VC 公司、投行，还有像在座各位，还有很多金融投资者，他们可以通过投资创新技术的应用，在制造、销售商业化产品中获得回报。比如日本的新电力汽车、特斯拉汽车、风电汽车等等，中国在这方面也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通过应用新能源技术提供非常低成本的太阳能、风能等其它可再生能源。

改变大家观念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上车系安全带，开始如果不系安全带就要交罚金，但经过一个较长的说服过程，上车系安全带成了下意识的动作和被普遍认同的观念，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还有抽烟，40 年前很多人在抽烟，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抽烟了。所以，要改变一种习惯和观念需要投入时间、努力和金钱。

同样，环保意识也是可以改变的。我曾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要像中国那样找到解决本国问题的方案。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家通力合作，其解决方案不只是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国，需要大家紧密合作，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应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合作，包括政府、学界、产业之间的合作。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和自己的优势，比如广东省就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甚至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

有的优势，比如可以利用创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价格非常优惠、有竞争力，并且可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政府可以要求企业购买这样一些产品或支持一些标准和协议，比如说低碳排放，让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总之，诺贝尔可持续发展基金会需要大家的大力支持。通过我们的务实合作，引入新技术、新资源，我们也希望与广州政府和广州的企业合作。



## IFF 政策对话 (1)

<b>全球面临着去全球化风险，而不是新的全球化</b>	30
埃内斯托·塞迪略，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b>做好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全球经济挑战</b>	32
朱光耀，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b>加强中国参与，重塑全球经济秩序</b>	33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基金会主席	
<b>以“双赢”战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b>	34
祁斌，IFF 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b>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让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b>	36
阿什拉克·哈桑·汗，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b>全球治理的风险与政策协同的必要性</b>	38
何建雄，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 IMF 原执行董事	

# 全球面临着去全球化风险， 而不是新的全球化

■ 埃内斯托·塞迪略 /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埃内斯托·塞迪略

当前我们面临的不是新的全球化，而是去全球化的高风险。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化已趋于削弱，但是当时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比如说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参与，同时大多数的经济体，如东欧也

已经参与全球经济中，它们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动力。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再次放缓，但随后我们又看到贸易恢复了，直到两年多前，贸易又再次放缓，2019 年全球贸易的增长非常缓慢，甚至比 GDP 的增长还要慢。我今天要澄清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前我们面对的不是新的全球化，而是去全球化。

全球经济治理是否在增强呢？我的答案是并没有增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2008、2009 年时，全球经历了非常惨痛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很多国家。当时，G20 领导人在第一次华盛顿会议时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缺乏

合作与团结，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缺乏一致性。随后各国达成共识一定要增强国际协作，这样才能渡过危机、防范风险。2009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的 G20 峰会设立了一个很好的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但遗憾的是，那一场会议的推动力没有持续太久。如果伦敦 G20 峰会的目标真的完全达成，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但实际上仅在国际金融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伦敦 G20 峰会目标的其它方面，各国都已经失败了。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不断增强自身能力以更好地履行责任。但在贸易领域，G20 领导人承诺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但直到今天，多哈回合并没有达成协议，甚至已经是完全停滞了。恐怕全球经济治理并没有真正增强，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仍面临巨大风险，处于危险之中。

全球经济全面放缓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如果真的发生，我预计是由金融危机的缺陷导致。金融危机的后果很严重，虽然我们能看到历史的经验，但现在我们离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也许更远了，甚至比十年前更遥远。这是由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缺乏加强全球治理的意愿。

**全球经济全面放缓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如果真的发生，我预计是由金融危机的缺陷导致。金融危机的后果很严重，虽然我们能看到历史的经验，但现在我们离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也许更远了，甚至比十年前更遥远。**

多边主义正在承受空前的压力，不仅是被削弱，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多边主义受到了存亡威胁。当前已经是非常紧急的时刻，虽然我们已就保护人类福祉、促进经济发展达成了共识，而且很多国家依赖于多边体系，尤其是最脆弱的国家希望和其它国家合作，小国利益在双边体系中是会被考虑的，虽然多边体系有时不够高效。然而，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多边体系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它们不尊重多边主义的行为已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气候变化、国际贸易治理都



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美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很多，但现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巴黎协定，甚至对人权协议提出挑战，还裁撤了对一些多边机构的资助。美国的诸多行为已经明显侵蚀、削弱了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

不幸的是，受到影响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合作、共同抵御美国错误行为的影响。有资源、有财力的国家首先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无可厚非，但同时也应该保护国际规则，然而一些国家选择了沉默甚至加入了削弱国际规则的行列。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发声、有力地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虽然它们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但从某种程度来说双边协议在能力建设和合理性方面是不足以达成两个国家目标的。如果不能维护国际秩序，人类发展的步伐将倒退。当前的世界国际纷争与分歧，不仅不能使任何国家获得安全的局面，而且会严重阻碍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发展。国家间的交流合作是重要的，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达成合作协议，支持多边主义、远离孤立主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应对共同的挑战。

当前多边体系面临许多挑战，我们需要各国勇敢地站出来，在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等诸多领域发声，比如说，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第 2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5) 将于 2019 年 12 月在马德里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国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比如在减排方面的承诺，而且要完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更好地监测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此外，当前应对气变的承诺还是不足够的，而且合规性也不足以让所有的国家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行为已经使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产生了很多贸易争议案件，但当前 WTO 上诉机构还面临法官缺失的问题。如果这些争议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全球贸易体系将会被极大削弱，所以 WTO 的所有成员应该一起投票选择出最好的法官来裁决这些案件，才能有更好的务实倡议。

## 做好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 朱光耀 /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朱光耀

2019 年，全球经济与全球化都面对相当大的挑战——保护主义与双边主义。根据 IMF 和 WTO 的数据，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有 3%，全球贸易增长只有 1.2%。这是一个警告，意味着全球经济、全球贸易的发展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挑战。

第一，现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状态让全球贸易产生了巨大问题，新的仲裁员不能获得任命，WTO 也不能通过新的预算，陷入了僵持的状态，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是一场灾难。所以，现在很难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这些目标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一致通过的，对全球减贫脱贫非常重要，只有实现 2030 发展目标才能保证全球的经济繁荣。世界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应充分考虑怎么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如何维护全球贸易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战、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以及现在美国提出的 WTO 调查都反映了美国政策的混乱。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有责任和义务去应对解决问题，尤其当各个国家都面对增长的挑战、贸易的挑

战以及像气候变化、全球和平与安全等一些关键紧迫问题的时候。

第二，我认为现在更紧迫的事情是通过 G20 进行宏观经济的交流和全球协调。现在负利率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有 17 万亿英镑的债券都是负利率的，日本中央银行的利率是 -1%，美国从 2019 年 10 月 17 日起下调利率，已经降了三次息；同时，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美国央行又买了 600 亿美元的联邦债券；欧洲央行从 11 月 4 日开始购入 200 亿欧元的政府债券，这些货币宽松措施将会如何影响国际市场呢？这是需要紧密观察的，宽松政策和措施是很大的不确定性来源。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观察，尤其是 G20 国家。

由于双边主义的抬头，G20 这样的多边性的经济协调机制功能就减弱了，所以要认真考虑如何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工作。

第三，数字经济。数字税务和数字货币，虽然这是一些新的概念，但如果全球能够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能推动包括数字货币、数字关税在内的进程。G20 希望在 2020 年提出这方面的政策建议，这将与每个国家利害相关，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最后，各国要共同筑起防线，以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简而言之，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2009 年在伦敦召开的 G20 峰会取得了一个很大成就，就是实现了一万亿美元的特殊提管权 (SDR)。可惜 2019 年 10 月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总而言之，要解决这些关键的问题有赖于全球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要发挥好 G20 的作用。

## 加强中国参与， 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 / 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基金会主席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

全球化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相反人类是全球化的产物，生命从 30 亿年前单一的来源扩散发展到全球各地。现在 74 亿人来自同一个地方，我们的祖先是从非洲移民出来的，所以说人类是全球化的产物。我们的祖先从非洲走出来时，带着他们的技术出来，促进了科技的全球化。但全球化总会有波折，中国曾在 15 世纪退出了全球化，而现在中国走在了全球化的最前列。各个经济体，如果审视全球化就会发现是全球化影响了人类，而不是相反。

我们现在面临的转变非常具有挑战性。首先，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仍在继续，应对危机带来的低利率造成了现在全球总体负债水平偏高，很多政府，包括发达国家政府，还面临着财政不平衡问题。因此，对各国政府来说，经济增速放缓是又一条重担，是很难担负起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表面上看金融体系得到加强，监管标准得到提高，投资组合也转向风险更低的领域，现在大家更专注于本国市场，一些机构退出了国际市场，但是仍有些不确定性。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一些新的科技颠覆，不仅仅是互联网或每秒能进行一万亿次计算的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机，不管这些技术有多么令人赞叹，它们

固然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但重要的是科技还有很多其它的动向，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生活会因为基因编辑发生变化，甚至人工智能可能给我们带来第二人格。

这些高度不确定的技术发展需要创新性的金融服务。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家可以化解风险、很好地管理这些技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将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内化，达成《巴黎协定》等更多包容性的目标。总之，我们应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气候变化目标。

第三点，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全球经济放缓，这其实是具有周期性而且是动态的。我们要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防止全球性经济倒退。

最后一点，关于治理与合作。全球经济结构在改变，比如包含了更多科技，并因而带来价值和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重心在向亚洲尤其是东亚偏移。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循序渐进改善全球经济体系，要将新的元素囊括其中的同时也要与旧的元素并存。

新秩序是非常复杂的，今天我想谈的是其中的一点——中国的领导力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中国知道如何去应对挑战。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等倡议，这些倡议与中国的影响力是相匹配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是对当前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而且将推动全球经济秩序改革。当然其中还存在一些风险，比如区域集团风险，因为我们有可能过度关注某一地区的协议，而忘记了多边原则，忘记了平衡原则，但是只要小心谨慎，还是能够达成目标。

中国处于全球经济中心地位，中国需更加国际化，中国所提出的倡议也需更加国际化。也许目前正是一个时机，中国要挑战自己，以全球视角为出发点，重塑开放的经济体系，包括一些底层原则。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改革也需要中国的积极性参与。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到这样包容性的、有创造力的全新体系当中！

# 以“双赢”战略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 祁斌 / IFF 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祁斌

全球化进程中有两类受益者和一类失落者：一类受益者是普遍受益的新兴国家；另一类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精英层、工业领袖。失落者主要是发达国家当中的蓝领工人。赞同全球化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中国等全球化的受益者；还有一些国家不是很赞同全球化，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了一些挑战，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这里边深层次原因比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四小龙”，尤其后来中国的崛起。中国确实学习能力比较强，改变了世界产业的格局和版图，对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有反思和改进自己治理的必要，比如说，如何去促进产业工人提高自身能力。中国改革之初有很多“夜校”，人们白天干工作晚上去“夜校”学知识；后来中国人又争相去读 MBA、EMBA，但是美国蓝领工人却不会干这些事情的。其实历史上这类事情发生过很多次，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的农民从放羊到学会织布，这就是一个自我升级的过程，所以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可以做一些治理方面的调整。

另外，全球化进程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脱欧。我觉得英国脱欧是个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欧盟的形成确实解决了人类发展中的很多冲突、矛盾。但很多因素掺杂在一起促成了英国的脱欧。英国如果留在欧盟中，从经济方面是受益的，但是因为欧盟有“四大自由”，使得移民问题、恐怖袭击等安全问题，以及几十个国家在一起协调的难度，造成欧盟一体化成本过高等很多弊端。所以，英国脱欧这个问题也提醒我们，有些东西走得太快、太远，可能也会有修正和倒退的可能性。

全球化，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能理想化。当然，全球化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以如果在全球化进程当中采取一些更加实事求是或者比较循序渐进的做法，可能会更好一点。

在全球化中，中国应该算是规模最大、发展最迅速的新型经济体，所以也是全球化秩序的最大因素之一。对此，2019 年年初我在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正值中美贸易战，我走到达沃斯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能发现有人在讨论中国，而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后来我受邀参加高盛的一个闭门晚宴，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在发言中我说在达沃斯大家都在讨论中国，都在讨论中美贸易纷争，实际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两件事：

第一，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增长？中国在过去 40 年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迅速崛起，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大致为 25%。中国从 40 年前养活 8 亿人，到今天 14 亿人口几乎可能有一半人在减肥。1978 年中国在全球 GDP 的占比只有 1%，今天全球 50% 的钢铁、60% 的水泥、25% 的汽车生产、制造于中国，这一切巨大变化都源自于两个推动力：一个叫改革，一个叫开放。

改革准确说是市场化改革，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第二，规模达到今天这一阶段的中国将如何与世界

相处？答案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win-win（双赢）。我想从实践中谈一下怎样落实双赢战略。在中美之间不能找到一个共赢点？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我们研究了他的主要选区——美国的“铁锈地带”，听上去是美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其实这些地区有很多优秀的企业远远领先于中国。

改革开放早期，宝洁、摩托罗拉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美国通用汽车（GM）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大部分人还在骑自行车，今天 GM 每年在中国的汽车销售量已超过美国本土，在中国每年卖 400 万辆，在美国只卖 270 万辆，而且在中国卖的每一辆汽车的利润都超过美国 30% 以上。再比如 A.O. 史密斯，本来是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热水器乡镇企业，现在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热水器品牌，其在中国的销售量在过去 25 年中，翻了 25 倍，已于 2016 年成功进入美国标普 500 强。

我们可以做一个基金，系统性地把美国这些产业和中国市场进行结合。一方面，帮助美国解决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帮助中国进行产业升级。所以，2017 年 11 月在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签署了中美制造业基金。当时签约的 2300 亿单子，我不知道别的怎么样，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发生了中美贸易战，但毫无疑问我们是把它成功落地了。第一，我们在全球募集了 27 亿美元；第二，投资了位于美国加州偏内华达州那个地方的一家制造业企业，它是制造散热器的，比如为苹果、特斯拉、思科、戴尔、波音等提供散热器。我们联合高盛把它收购了，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把它与中国的企业包括华为、vivo、oppo、小米、中国中车、联想、中国商飞等进行了成功嫁接。我们接手之前，这个公司已经在中国运营了十年，然而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额只占其全球销售额的 1.7%，在我们的努力下，过去一年，其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全球销售额的比例达到了 10%，翻了 6 倍，2020 年的目标是达到 20%，我们还要把这个数字提高到 30%，以证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赢战略，现在中国中车集团、中国的高铁、华为等都使用了它的散热方案。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国市场给它提供的业务增长，也给美国蓝领工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并增加了收入。

这个典型例子说明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还可以反哺一些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这样即使一些矛盾不能化解，

但是也可以降低一些摩擦和矛盾，而且可以加强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我们努力把这一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2019 年 3 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时候，在马克龙总统的见证下签署了中法产业基金。半年之后的今天，在马克龙访华之时，这个 10-15 亿欧元的中法产业合作基金已成功落地。

另外，我们还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比如英国。英国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从到汽车产业到飞机发动机，再到生物制药、ARM 都跟中国有广泛的合作空间，我们与汇丰银行以及英国 PE house（音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我们还跟日本进行合作，在安倍首相访华的时候签了中日产业合作基金，我们在日本的合作伙伴是：日本的第一大投行野村、第二大投行大和、第一大商行三菱、第二大商行三井、第三大商行瑞穗以及五大金融机构捆绑在一起跟我们合作。

我们现在正在磋商 12 个双边基金，除了刚落地的四个双边基金以外，下一步应该是中国分别与北欧、瑞士、意大利、以色列、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拉美，我们把 12 个双边基金看作 12 座桥梁。

如果说落地一个基金只能解决 10 个企业的问题，只能影响 300 个企业，那么我们想影响成千上万的企业怎么办？于是，我们开始举办产业合作峰会。我们从 2017 年开始创建中投论坛，第一年有约 1200 家中外 CEO 到中国参会，2018 年达到了 3300 家。2018 年，我们还带领 200 家中国企业的 CEO 去美国高盛进行了对话，2019 年在日本召开的中日产业峰会有 1300 家中日 CEO 汇聚一堂进行对话。

我们努力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牵线搭桥，我们称之为中国与世界的“非诚勿扰”。

**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还可以反哺一些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这样即使一些矛盾不能化解，但是也可以降低一些摩擦和矛盾，而且可以加强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

# 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让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

■ 阿什法克·哈桑·汗 /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什法克·哈桑·汗

近两三年来，全球化正在遭遇挑战。逆全球化情绪催生了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进而导致国际贸易当中的保护主义。也有专家说全球化已结束，全球治理的机制也越来越失灵。这种逆全球化的情绪带来了保护主义的滋生和抬头，它影响了全球贸易，也在威胁全球的繁荣。

为什么全球化受到冲击呢？我们看一下过去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它们获得了巨大利益，支撑了全球经济发展，减少了贫困，中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体现了全球化的成功。中国相信并参与全球化，过去 35 年里有 8 亿中国人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是，仍有很多人批评全球化，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些人被遗忘、被抛下了，没能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觉得有些人占的利益比别人多，他们担心全球化不公平。收入的差距扩大是全球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全球化是必须的，在全球经济里不能允许民族主义。

怎样才能使全球化进程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全球化

必须要成功，而且要为所有人服务。全球化和治理之间有很强的联系，现在经济发展的引擎已经从发达国家转至新兴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前总裁拉加德说，全球增长的 80% 来自新兴经济体，所以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可是全球的治理机制却还停滞不前，这是管理全球经济的那些机构的失败，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全球经济力量的转移。除了经济现状以外，我们再看一下全球产业现状和金融现状在过去这些年的变化。比如财富 500 强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意义或者说对全球治理的要求，就是要保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按比例获取他们的回报。

经济力量调整和全球化的过程也在重塑全球秩序，全球化的前进步伐凸显了当今全球治理机制处理新挑战的无力。怎么充分共享繁荣的成果？如何应对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第一，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应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第二，全球治理机制也要通过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增加其合法性。第三，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能够促进其更加开放，进一步打开它们的市场。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会降低金融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最关键的是要增强全球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应重新审议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调整配额的同时，还要重新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首席执行官和世界银行选派的过程，应该更具开放性和竞争性。

**全球化必须要成功，而且要为所有人服务。全球化和治理之间有很强的联系，现在经济发展的引擎已经从发达国家转至新兴发展中国家。**

面对调整和改变面临的沉重阻力，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该怎么办呢？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崛起，对很多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这些国家希望中国在提升全球金融治理方面能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中国也已发现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并积极参与其治理。中国现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在现有的金

融管理体系里，比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扮演更强的角色，中国货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建立了一些机制，作为对现有金融治理的补充，比如亚投行和金砖银行，这两家机构现在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重要补充。



融管理体系里，比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扮演更强的角色，中国货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建立了一些机制，作为对现有金融治理的补充，比如亚投行和金砖银行，这两家机构现在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重要补充。

从 1950 年开始至今，世界 GDP 已经增长了超过 14 倍，IMF 的成员国增加了 4 倍，现在 IMF 已经满足不了国际货币基金治理的所有要求，需要其他机构予以支持，所以区域性合作机制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机构来扮演这个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之前是欧洲的国家引领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变革，那个时候欧洲更受关注，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小国一直不能受惠于 IMF 这样的机构。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的设立为世界银行提供补充，那么中国是否也可以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些缺陷呢？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亚洲市场支持基金呢？一旦发生类似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发生的可能），我们是否需要其它的机构或者机制来做最后贷款人，作为对 IMF 的补充呢？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也想促请中国政府充分考虑，采取一些举措，促进区域金融治理。

# 全球治理的风险与政策协同的必要性

■ 何建雄 /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



何建雄

全球治理是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关键，但遗憾的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和增长的稳定性都存在风险。我暂时不赘述新全球化，说一说以前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层面——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种利益的权衡取舍。我们要加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生产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护缺乏竞争力的弱势群体，尤其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它们甚至从未参与过市场竞争。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曾出现多次像钟摆一样的左右摇摆，特朗普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导致了全球化衰退进一步加深。现在这个钟摆摆向了保护主义，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之相方，达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限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实行大胆的市场自由化举措，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开放资本市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让中国、苏联等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加入了自由经济的进程当中，正因如此，在过去 20 多年，全球经济才得以大幅度增长。

现在这个钟摆又在向回摆动，要回到二三十年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像脱钩、反全球化、贸易战、技术战等这类的词，其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全球化步伐

放缓？为什么没有强有力的举措来加强全球化呢？如果所有的参与方都能够从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受益的话，那整体应该是向趋向增长的。如果所有参与方都在试图保护自己相对弱势的产业，那总体而言方向将是负面、逆全球化的，将不利于全球稳定。这就是基本逻辑，这就是现在全球经济发展最底层的力量，也是未来的预期，至少在中短期如此。

全球治理的风险来源于几个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过短的政治周期，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客，痴迷于在竞选中获胜。而全球治理进行结构性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成果，政客不能受益、拿不到功劳，甚至功劳有可能转向他们的对手，所以这些急功近利的政客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现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上诉机构基本已经停摆，走到今天主要源于 WTO 机制存在三个矛盾：第一，WTO 的决策必须基于共识，即所有参与方要达成一致；第二，要不就全盘接受，要不就全面否决，没有中间可选；第三，WTO 的管理方根本就没有提出任何变革的方案。当 WTO 规模还小的时候，这三个矛盾不是很明显。WTO 创建伊始只有 40 多个签约国，而现在几乎囊括了全球所有国家。如果我们要去改革 WTO 的话，我们甚至要超出现在的机制来思考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全球治理的风险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改革可以循序渐进，改革的阵痛是轻微的，受到影响的人也不会感到明显利益损失。但现在全球经济增长疲弱，主要经济体的财政灵活度也非常有限，所以现在 WTO 改革的空间非常小。另外就是人的因素，因为世界重要的政治家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回顾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像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随之建立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于 1947 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WTO 的前身，这些体制和机构对于全球经济稳定、有效配置全球资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球化合作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次贷危机发生之后，



2008 年在美国总统布什召集下，G20 的所有国家领导人在一周之内齐聚华盛顿，共商应对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之策，既是帮助美国走出危机，也是帮助那些受到危机溢出效应影响的国家。2009 年在匹兹堡举行的峰会，将 G20 正式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它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提升了金融监管，于是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应运而生，对于监督各国改进行动、促进各国监管机构合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今中国所做的一些金融改革是与巴塞尔标准一致的。有些人有疑问，为什么别人生病，我们要跟着吃药呢？当时很多人都这样问，现在回顾，我们也是从中受益的。虽然杠杆率增长了，但是银行业整体变得更加健康了。二次世界大战才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那么多人失去了工作，那么多金融机构倒闭，那么多人流离失所，才迫使美国站出来召集 G20 国家一起合作解决问题。难道必须再来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才愿意再次走到一起合作吗？对此，我没有答案，但我认为起码在短期之内，必须减少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应给出合理化建议，尤其是应在经济结构方面给出一些建议。到底应制定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印钱也可以发钱，但是必须明确印钱和发钱的目的。央行可以说除非你有结构性的改变，否则不给你钱。所以我觉得结构性的政

策一定要非常清晰，才能够让投资人明白其中的风险。

在中长期，我们要加强 G20、IMF、BIS 等这些国际组织的政策协同效应。以前的协同效应是较强的，现在已经被削弱了。以前每次 G20 峰会，金砖国家会受邀出席，一起讨论经济全球治理等问题。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全球所有国家都应改变敌对态度加强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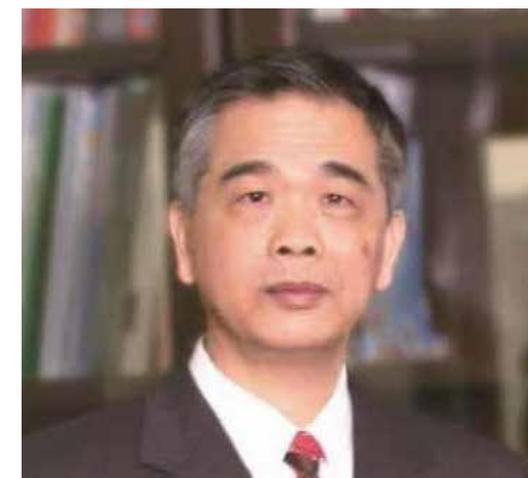
首先，我觉得应减少投资的政策限制，尤其是跨境投资。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其次，现在各国加入、退出国际条约的机制缺乏对称性，比如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对该国加入一个国际条约有审批程序，但是退出时，却没有制约，比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实际削弱了美国的国家信用。

世界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如果有人想跳船去找另一艘船，我只能说祝你好运，而跳船的人即使回来，也会造成水花把船上的人都溅湿。

# 从货币基本属性 谈数字货币

■ 李东荣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所以未来货币的发展趋势，始终离不开上述的四个方面。事实上，人们在提高货币使用的安全和效率方面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最早的贝壳、石头、骨头到金银铜等金属货币，再到今天的纸币；从最早的支票、汇票、本票，到今天的银行卡，以及银行芯片卡的闪付、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无不体现了人们追求提高货币使用的快捷、安全、便利方面的不懈努力。

30 多年前，货币流通是中央银行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讲货币流通主要是现金流通，也就是 M0 部分的流通。当时的关注点主要是现金流通与商品流通活动是否相适应。时至今日，这些本质方面并没有大的改变，如果说有改变，那就是从 M0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上，逐步转移到现在的狭义货币 M1 以及广义货币 M2 与商品流通相适应上。我们现在做的大量工作，还是聚焦于 M0 替代上的努力。

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例如在 M1 或 M2 的替代上，数字技术能否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甚至颠覆性的变化？我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积极去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要形成一种货币制度，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应用，那是一件需要非常慎重的事情，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中央银行在这个问题都是十分谨慎的，是要进行严格的论证和实践验证的。这里面，我认为币值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历史经验表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数字货币的使用，给我们带来的是在币值稳定基础上的安全、快捷、便利，它就是适应社会需要的，也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反之，如果数字货币的使用带来的是币值上的不稳定，或者是对币值稳定的冲击，它就不适应社会需要，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谈到货币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认为不能离开人们对货币的基本属性的需求，就是说它的发展始终不能违背货币活动的本质规律。

当前人们比较关注数字货币，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它的货币发行机制方面，第二是在货币使用的安全和效率方面。当然数字货币还可以划分为：法定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数字代币等等。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国内外都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和机构进行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一般来说人们对货币的认识或基本要求有以下四方面：第一是币值的稳定性，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基本前提；第二是货币使用和存储的安全性；第三是交易的便利性；第四是交割的快捷性。

可以说自从货币诞生那一天起，人类就不断应用各种新技术，朝着以上四个方面努力改进和完善。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的历史，人类不断改进和完善货币的发行和使用。但是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它都只是使货币更加适应、满足经济和社会活动需要的手段。

## IFF 政策对话 (2)

从货币基本属性谈数字货币	41
李东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数字货币与现有金融体系的融合发展	42
木内登英，野村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	
运用 PEST 分析模型解析数字货币	43
张立钧，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 CEO	
跨领域分析 Libra 的潜在风险与监管问题	45
亚历山大·艾斯尔，维也纳区块链中心首席科学官	
Libra 是否会成为“超主权货币”的思考	46
宋敏，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 数字货币与现有金融体系的融合发展

■ 木内登英/野村研究所执行经济学家



木内登英

首先我主要从两方面来讲 Libra (Facebook 推出的虚拟加密数字货币) 和其他三种货币。一方面是从互联网角度考虑, 另一方面是从央行数字货币 (CBDC) 角度考虑。我们认为监管不应该将 Libra 全面否定, 我们应该更加谨慎。我们需要把 Libra 以及其他虚拟数字货币与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融合, 并在严格、恰当的监管框架下进行分析。

很多人指出 Libra 和其他数字货币在全世界各地的银行已有 17 亿储备金。即使是在发达国家, 也有可能遇到现金方面潜在的风险, 也需要考虑货币使用的效率。举例来说, 在美国使用现金的管理成本达到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Libra 和其他的数字货币, 尤其是由平台发布的数字货币也存在很多问题。举例来说, 我们认为在央行没有储备金, 会威胁到币值的稳定,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当中。

我们看包括 Libra 在内的 Facebook 以及其他平台发布的虚拟货币, 他们都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并且利用数据分析成果, 但事实上对于用户来说并不是太公平, 为了避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监管方应该有所作为。

第二, 我认为在 2019 年 6 月 Libra 提出以来, 央行

数字货币 (CBDC) 在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和欧盟的国家开始有这样的讨论。CBDC 可以比较有效缓解 Libra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但是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也有可能减弱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在日本有一些人认为, 日本的中央银行应该推出 CBDC。日本的 Libra 支付率非常低只有 23%, 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在 2025 年把 Libra 支付率提高到 40%, 但是这个目标很难实现。所以, 如果中央银行要推出数字货币, 也可能会有有效防范现金风险。但是, 日本的中央银行非常谨慎, 不会积极推出这样的数字货币。

第三, 在监管方面, 我们一定要考虑有哪些措施可以有效吸纳或者是接受新型货币。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数据, 数据应该是监管部门非常关注的一项工作, 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 就可以确保大量用户能够在创新的过程中受益。比如说有一种创新可以要求私营部门的数字货币发行者, 把所收集的数据分享给其他的金融机构; 或者将发行者所收集的数据与社交媒体所收集的数据分开, 这是其中一种比较有创意的监管方法。

如果这些数字货币得到大规模的使用, 监管部门也有责任保证这些货币的公信力, 要保持消费者对他们的信心, 这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此外, 监管部门应该考虑要求货币的发行者有大量的货币储备作为担保, 这样才能够增强这个货币的可行性。

货币储备当中也应该有中央银行的存款。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考虑推出这样一个方案, 这样监管部门可以增强私营部门发行数字货币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如果某一个私营部门的主体面临破产, 中央银行可以进行跟踪监测, 甚至可以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 然后以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担保。所以我觉得创新主要应该由私营部门来推动, 但是监管部门或者公共部门也要参与。所以我提倡的是一种混合模式, 一个混合货币体制, 公共与私营部门的一个合作。

# 运用 PEST 分析模型解析数字货币

■ 张立钧 /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CEO



张立钧

我不看好以比特币为代表这些加密数字货币, 但是我看好区块链技术,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稳定币的出现, 引发了诸多思考。首先, 我们需要数字货币吗? 其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字货币? 再次, 数字货币应该由谁来发行? 最后, 应该如何运作?

在全球加速数字化经济、数字化生态系统、货币数字化的当下, 我们肯定是需要数字货币的。至于之后的三个问题需要运用方法论、PEST 分析模型进行多维度考虑。

其实, 很多的新兴事物都可以运用 PEST 分析模型, P (Politics) 从政治或政策角度分析; E (Economy)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S (Society) 从社会层面分析; T (Technology) 从技术角度分析。

首先, 从 P (Politics) 政策层面分析, 为什么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无法取代传统货币? 因为这里有一个

主权的问题。货币从最开始的贝壳、石头到铜币、银币等, 其本质都是商品货币, 但是到近代, 它已经拥有了国家信用货币的理念。所以, 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是否能取代传统货币的问题, 其实就是没有国家主权背书的货币, 能否取代主权货币的问题。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 如果说现在是 M0, 数字货币能够从 M1 到 M2 这样一个调解, 总量上如果没有一个中心化的协调, 怎样调控一个货币的总量呢? 当然还有监管、洗钱、逃税、恐怖行动等问题。

第二, 再讲 E (Economy),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货币属性有计量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存储。这三个都是货币的属性。什么样的货币能够同时具有这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是有主次优先顺序的。在人类早期时, 货币更多是商品货币属性, 是交易媒介, 不管是货币还是票号、票据, 它更多体现的是交易便利性。当货币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从央行的角度来讲, 更在乎的是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属性。央行职责是控制通胀、刺激经济, 所以它更在乎的是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价值稳定性问题。

第三, 再来谈谈 S (Society), 也就是货币的社会层面问题。普惠金融, 这是 Libra 提出的, 旨在帮助世界更多的人得到金融带来的好处。目前全球还有 20 多亿人口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银行服务,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 数字货币特别是非央行的数字货币, 是否可以把金融的便利性惠及他们? 比如说, 今天要给某个群体发一笔中国扶贫基金, 正常货币的发行只能通过程序去监控, 而数字货币是可编程的, 可以决定货币的取向, 不管 M0 还是 M1, 直接发放到该得到这笔扶贫基金的群体里, 从而达到普惠的效果。

当然从社会的角度讲, 还有隐私安全以及匿名等问



题。我们的现钞 M0 是完全匿名的，央行的 CBDC 原则上取代 M0 是数字化现钞应该也是匿名，但是它没有账户它有钱包，一旦有钱包再加上是数字的，每一笔支付都会留有痕迹。所以央行的 CBDC 能否真正做到匿名？

最后，从技术层面分析。比如 Libra 100 个节点能够真正成为去中心化吗？是需要 10000 万个节点还是 100 个节点，这是有待商榷的。区块链去中心化结构跟中心化的结构或者说其他混合的架构，哪一个架构更适合？这方面是讲我们需要去中心化的程度有多大。另一方面是效率问题，目前 Libra 它大概能够达到每秒一千多，无法满足整个经济社会的需求。当然这里还有像多方计算、同态加密等技术，另外怎样保证隐私权，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等是去中心化，央行的数字货币 (CBDC) 完全是中心化的。Libra 其实是一个稳定币，它是挂钩一揽子法定货币的稳定币。但是像 USDC、EUSD 这些是挂钩一种货币的、线上或线下的稳定币。这三种在我刚刚讲到 PEST 里面，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他们能覆盖的层面也是不同的。

## 跨领域分析 Libra 的潜在风险与监管问题

■ 亚历山大·艾斯尔 / 维也纳区块链中心首席科学官



亚历山大·艾斯尔

我是一个跨领域的研究中心的成员，在维也纳的一个区块链研究中心工作。我认为对于 Libra，我们应从一个跨领域的角度分析。区块链不但涉及数据保护、隐私保护等等很多法律问题，也有很多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例如目前每秒 1000 交易远远不够，如何大幅度提高交易的速度？技术的创新如何更好地转化为金融业的创新？

今天不管我们讨论的是 Libra 还是其他虚拟货币，我们其实都是在讨论金融产业的创新究竟会以什么形式呈现，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区块链、加密货币等金融新工具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使人们能更便捷地使用数字支付。

Libra 它首先是一个私有的货币，因为它不是由任何央行发行的，那么如何监管它？Libra 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尽管比特币已经出现好几年了，但因为 Libra 是可以被编程的，所以它仍是一个新的进展。Libra 是否安全，以及它会带来哪些风险，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Facebook 有数十亿用户，如果 Libra 被 Facebook 所有用户拿来用作一种支付方式的话，其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所以 Libra 的安全性及其能否成规模复制，以及如何提高它的效率，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除此之外，网络攻击的风险也是人们关注和

讨论的问题。另外，政府应从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并要对金融监管系统进行相应更新和完善。

总之，Libra 在技术层面仍面临很多挑战。我们要执行和落实怎样的数字货币系统？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才是最适合社会发展的？是用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还是区块链技术？

从另一个角度即数据层面看，我们知道这些交易会带来大量的数据，如果全部由 Facebook 的子公司发行货币的话，Facebook 上用户的社交货币和这些数字货币是什么关系？隐私数据安全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尤其在欧盟，如果 Facebook 开展这方面的业务，一定要遵守当地的监管框架和法律要求。除此之外，Libra 不像现金是完全匿名的，它是不可能匿名的，肯定会在网络空间留下痕迹，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除了技术风险、数据隐私风险以外，还有很多问题，包括从金融的角度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比如，用 Libra 做投资，一旦人们对这个体系失去信心，要刚兑的话，是否能够提供稳定的兑付渠道，如果不能，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这种情况下，Libra 协会是否应该考虑哪些资产是在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的。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Libra 是否要跟国际上的主要流通货币挂钩，还是仅跟本国的货币挂钩，完成在本国的交易？

除此之外，还要关注 Libra 监管治理，以及进一步更新的问题。例如，我们知道 Libra 有 Libra 基金会，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从 Libra 基金会退出，所以加入机制固然重要，退出机制也不可轻忽，需要同时完善加入和退出机制。现在已经有大量交易在用 Libra 这种货币完成，如果对其进行监管也是非常现实且重要的重要问题。还有洗钱、反欺诈等银行业一些常见的监管问题，以及信贷方面的问题，总而言之普通金融行业经常碰到的问题，在 Libra 货币领域也是不可避免的。

Libra 现在是由一系列托管机构管理之下的资产来支持的，因而它使用何种方式管理非常重要。Facebook 有数十亿的用户，所以其管理的额度堪称天文数字，所以对它进行更好的管理和治理显得格外重要。

# Libra 是否会成为“超主权货币”的思考

■ 宋敏 /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首先,我想说比特币存在很多问题。它跟我们讲商品锚或货币信用都不一样,它是根据算法,是具有稀缺性的。它有科学依据,根据算法到 2140 年全部挖掘出来,比特币总量是 2100 万枚,所以它的设计确实符合稀缺性。我们本来希望比特币具有稳定性,后来发现它确实没有稳定性。当然,比特币没有稳定性也可能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因为现在各个央行监管者对其定位还不明确,有的央行接受,有的央行禁止,所以它在监管上具有不确定性。比特币是一个新技术,按照原来的设想每四年减半,挖掘过程应该比较稳定。然而,当人们发现它能赚钱后,就拼命搞矿机花很多资源挖掘,因而挖掘速度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稳定。

另外量子计算有可能摧毁它技术上的基础。但是我认为比特币这个概念,不能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问题,就彻底否定它。比特币的发明基于区块链,现在很多人表示喜欢区块链不喜欢比特币,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如果一旦全球普及数字货币,比特币这种有算法作为基础的,既不是基于国家信用也不是基于商品、资产做锚的货币,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货币?

可能会带来通货紧缩的问题,如果数字货币比特币

是无限可分的就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市场决定了比特币的分配算法,原来一个比特币买一个,现在是 1/10 比特币买一个,后来到 1/100 比特币买一个。

不应很简单地否定比特币,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Libra 和比特币一样使用了区块链技术,但肯定不是根据算法 (BECE)。Libra 是基于一揽子的主权汇率,通过锚定一揽子的主权货币,以确保 Libra 的价值,得到大家的信任,然后经过多次电子、数字交易以后,是否会逐步抛开主权货币作为锚,是否会进阶到数字资产作为一个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现在经济已经在数字化,更多交易将来会在数字经济中进行,它本质上需要这样的数字货币。数据本身是资产,将来又有更多的数字资产,它很可能产生挂钩于数字资产 Libra 的货币,

因为初次接触这样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如果照此思路,接下来将是超主权的货币,通过 Facebook 再加上它本身想联合的其他一些货币,应该是联盟的概念。

假设是这样的联盟,没有锚定的东西,又与主权货币脱钩的话,就会出现垄断问题。一旦这个货币占据市场,大家都要用它,不用它很不方便时,就会任其宰割。所以,数字货币和主权货币挂钩,是目前阶段性的策略。

理论上它必须要与主权货币挂钩,但我对挂钩本身也有怀疑。Facebook 有这么多个用户,用了这么多的 Libra,如果大家失去信心要求换成主权货币,能换吗? Facebook 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是设计层面上的一些问题,量不大时可以做,但量大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第二点,Libra 如果按照现在的设计,刚开始在量不大时应该有可能成功。数字经济确实需要数字货币,Libra 有 28 亿用户,超过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和,所以可能会成为有很大受众群体的货币。Libra 挂钩一揽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很大挑战和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制定一些对策,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尽快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

人民币已经在 SDR 里面,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例如可以通过中国的微信和支付宝,现在其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



## IFF 政策对话 (3)

推动支付体系的不断发展	48
弗朗西斯科·达基拉, 菲律宾中央银行货币与经济副行长	
改革世界贸易规则和体系势在必行	49
周汉民, IFF 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打造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	51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解决跨境支付和结算的难点	52
姚前,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提升全球跨境贸易和支付结算效率	53
吉冈成充, 三井住友银行常务执行委员兼东亚本部部长	
科技与金融、支付体系与存储体系之间的冲突问题	54
朱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 推动支付体系的 不断发展

■ 弗朗西斯科·达基拉 / 菲律宾中央银行货币与经济副行长



弗朗西斯科·达基拉

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新兴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这主要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进行贸易和服务。而全球贸易和服务的发展又会反过来激励国内工业发展,从而使各贸易国的 GDP 快速发展。GDP 增长又给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和分销等各方面带来更多机遇。

很多人认为菲律宾最大的出口商品是香蕉片,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出口更多的是电子芯片。1995 年,电子芯片在菲律宾的出口占比为 22%,现在已经达到 57.4%,电子芯片出口总额为 342 亿美元。

菲律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贸易近几年有所放缓。根据 IMF 的预测,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只有 1.25%,中美贸易摩擦的停止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菲律宾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为 3%,WTO 的预测为 2.7%。为了更好地促进跨境贸易流通,我们必须强化商品和服务贸易。目前菲律宾正在推动相关贸易规则和体系改革,在贸易过程当中,支付体系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引擎。

现在已经进入了支付的数字化时代,因此数字化的革命将会改变贸易的本质。数字化进程影响着贸易、制造业以及电商、银行等其他领域。菲律宾非常关注国内支付体系,因为其发展进步可以推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

展,还有可以为政治领域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和非银行间的电子支付体系,要对其实现更好的管理和监督,促进他们的相互学习和自我学习,并不断提升支付体系的标准,我们还要积极为电子支付体系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遇。

近期,菲律宾对国内的电子支付标准进行了统一化,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支付体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将有助于信用卡的支付。从菲律宾到全球各个区域,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支付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在欧盟,欧元作为统一支付货币,促进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流通。

东南亚联盟(东盟)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积极推动贸易政策框架的建立。菲律宾不断改善自己的支付体系,新加坡也是如此。中央银行必须加强支付体系建设,推动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支付体系的完善离不开私营企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合作,当下的一些安排和合作能够加强银行间的效率,提升支付的安全性。

贸易和支付体系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未来前景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因为新兴科技正在飞速发展,而且很多技术没有受到国界的影响,它们能够有力推动支付体系发展,促进公司之间的合作。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新兴技术为银行和私营企业提供更多有利的商业环境,助力它们实现效率和安全目标。

总而言之,支付体系的运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障碍,而应该成为国家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助力。

## 改革世界贸易规则和体系 势在必行

■ 周汉民 / IFF 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2020 年即将到来,展望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可以用一个词——更不确定性来概括。有人把 2019 年和 2020 年的经济增长作为相关的衡量指标,对此我表示赞同。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数据应当加上,就是在 2008 年以前的 10 到 20 年间,世界贸易增长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贸易增长倍于经济增长。但 2008 年以后,这一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 2020 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的预测为 3.0%,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预测为 2.7%,但更加重要的一个数据是:2019 年世界贸易增长只有 1.25%。尤其是从 2008 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增长、弥漫低迷情绪,两个“低”,而世界贸易的增长值还不到世界经济增长值的一半,这就是竞争的现象。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认识世界贸易我们不仅要关注进出口导向,关注进出口平衡,更要关注各个国家应当在提升经济的同时,提升进口。中国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2018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 4.6 万亿美元。2018 年以来,中国以国家的名义去吸引进口,这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过的事情。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吸引了 172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 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6 天时间内在 30 万平方米的国家展览中心达成了 573 亿美元的交易额。

2019 年,在同一时段——11 月 5 日至 10 日,依然是 6 天时间,中国再次举行进口博览会,吸引了 181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展示面积从 2018 年的 30 万平方米扩大到 36 万平方米,迎来的客商从 2018 年的 3600 家增加到 3800 家,参与洽谈的采购商从 2018 年的 40 万人增加到 50 万人,交易额为 711.3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 23%。特别需要提到的是 2019 年这一届进口博览会真正实现了三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结合,其中首次面向市场的商品和技术有 391 项。我花了半天的时间去调研这一届进博会,感悟极深,全世界千商云集,在经济低速增长低迷情绪之际,真正体现了贸易的作用。

第二个结合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合,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商品和展示有上下产业链和上下供应链,产业链如何和供应链相结合尤其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相结合,这一次的进口博览会做了全新的展示。

第三个结合是进口和出口的结合。尽管这是一个进口商品交易会,但是我们非常强调以进口促进出口的发展,实现进口和出口的完美结合。这样的进博会要年年办,要越办越好。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全球贸易制度改革趋势,后半部分是货币支付体系竞争,两者不可或缺。因为前者是本质,后者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正如中国成语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讨论的题目实际是讲皮和毛的问题,就此我提三个建议。

第一,改革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二战结束后,1948 年 1 月 1 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美国不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六个创始国之一,而且是关贸总协定基本规则的主要起草方。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诞生,全面继承关贸总协定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关贸总协定的后续



组织，到今天已经 24 年了。

当下的世界贸易组织最需要关注什么问题？首先是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今 24 年，有一轮谈判一直没有结束，这轮谈判叫多哈回合，没有结束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些国家对世界贸易的多边主义不感兴趣，希望用单边主义的手段处理贸易纠纷。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首先就应该把这一轮谈判好好谈下去并谈出成果。

第二，贸易政策的审议和尊重核心价值。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关键在于 164 个成员的贸易政策，有些成员贸易政策的审议是每年一度，有些成员贸易政策的审议两年一度，审议的目的是为了让成员国的贸易政策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是成员国经过协商共同认同的，是大家自主决定的。因此应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予以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是人类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我认为这一核心价值是国与国平等和友好相处的基础。

第三，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功能在于争议的解决。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件中，作过被告也作过原告；输过一些案子，也赢过一些案子。中国从未因为输了一些案子而对世界贸易组织心怀不满，更未因此有过退出 WTO 的考虑。所以，尊重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解决机制的权威性，是加入 WTO 的基本前提之一。

有的国家特别还是制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2019 年采取“饥饿疗法”，就是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审核法官得以补充，致使至少需要三个法官才能审理案件的上诉机构，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官，不能再审理案件。

我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应该发出声音，让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得以恢复运作。在贸易摩擦来临之际，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继续加大开放的决心，进博会就是鲜明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是需要改革的，既包括改革它的谈判进程，也包括改革它的审议机制，以及它的争端解决机制，三者缺一不可，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 打造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

■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二战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希望打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因此在一起开会商讨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以期共同规划战后的金融、贸易和投资活动，避免因经济贸易争端再次陷入战争或经济危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在此背景下诞生了。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 1947 年提议，1948 年 1 月日正式生效，促进了全球贸易与服务流通，并推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达到约 7%。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有力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但是在其生效一段时期后，它的作用开始逐步消减。为此，当时的主要世界经济体经过协商决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简称世贸组织) 替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 (WTO) 是一个综合性、多层面、多国家、多区域的多边贸易体系经济组织。WTO 提倡自由贸易对反对者给予制裁，它倡导公平竞争、对不同国家一视同仁，因此在当时全球化成为了一个大趋势。

WTO 对很多国家的贸易都起到了积极促进和引领作用，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时期，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政府想给它们提供金融支持和帮助，但是那个时候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货币政策效率不高作用不大。在此危急时刻，G20 参与进来加强经济运行，避免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

世贸组织 (WTO) 在其成立之初，是促进区域贸易、加强国家之间联系的一个平台，但在此期间却产生了赢者和输者。在贸易中能达成双赢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双赢的情况并不存在，因此现在的 WTO 规则并不能百分之百奏效，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有点落后了。我们希望看到政府出台更多的政策来支持贸易，能够制定出更多合适的监管规则，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世界一些最主要经济体之间商讨的自由贸易，主要指的是双边自由贸易，他们可以从享受到贸易的红利。WTO 的碎片化主要影响的是多边贸易与合作，另外跨境销售也会变得困难重重。总而言之，世贸组织的碎片化将使国际贸易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会减少竞争力、减少效率。一个碎片化的世贸组织，可能导致在一些成员国和地区产生一个垄断货币，这个货币会主导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一个共同的支付和结算体系在这些成员国和区域当中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由于现在的支付体系存在一些要求方面的歧视性，所以会限制一些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我们看到区域监管机构开始开发自有的支付体系，且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让该区域的投资和贸易变得更加顺利。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打造一个新的区域性支付和结算体系，要求所有的成员国中央银行达成一致，同时也要统一标准，努力创造一个开放性的体系。

这样，中央银行能够提供区域的货币支付体系 (我讨论的是小额支付，如 Facebook 提供的服务，电信公司提供的一些小额货币支付等)，这一清算支付体系会带来很多大额支付，还能造福于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他们制定标准，而且参与了全球标准和规则的制定。

区域支付清算体系还需要一个执法机构，让不同的成员国之间能够打造一个制裁的体系，这种奖惩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以此保障支付体系的安全和高效运行。

## 解决跨境支付和结算的难点

■ 姚前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姚前

现在提供跨境支付、跨境汇款、跨境清算服务的主要机构是 SWIFT，而且目前它基本是一个垄断性机构。从业务开展来说，SWIFT 提供的大部分跨境服务都是依托于银行；而银行要开展业务，又须对接 SWIFT 系统。比如中国家长想给在美国留学的孩子汇钱，中国的开户行必须是对接 SWIFT 系统的银行，而且接收汇款的美国银行也必须是对接 SWIFT 系统的银行。如果接收汇款的美国银行不是孩子在美国的开户行，那么接收汇款的美国银行还要与孩子在美国的开户行走一个程序。整个流程节点很多，而结点越多，“过路费”收得就越多，所以收费比较高，效率却不高。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问题的排除不一定是透明的，所以有人诟病 SWIFT 体系。当然，SWIFT 也在努力改善其整个支付结算体系。

这里面有几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基于商业银行为中心的层层账户之间转接的清算方式，是否可以整个迁移到区块链的体系架构之下，以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达到一种点对点支付。这种技术已经出现，但效率还不是很。这是 SWIFT 本身的改进，以及是否将它的体系架构迁移到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架构之下。

第二种思路，有的学者提出，跨境支付的难点不一定在技术方面，各国中央银行联合行动，把各个国家的大额支付体系对接起来，不就解决了吗？比如把美国、英国、欧盟的大额支付体系，跟中国的大额支付系统对接起来，这个思路是沿着账户体系不断层层嫁接的思路。确实，跨境支付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涉及资金跨境流动监管问题。

近十几年来，加密货币及其背后区块链技术的成长，使很多人对基于账户体系即从一个子账户到另一个子账户，层层转接的支付方式，提出了重大质疑。这个体系完全脱离了现有的清算支付体系，实行点对点的资金交易，就像发送一封邮件一样，从一端发到另外一端，不必通过层层转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的货币支付体系的方向就很清晰。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加密货币必须要基于区块链，但我个人觉得未必，因为从加密货币 40 年发展来说，有基于区块链的，也有不基于区块链的。

**近十几年来，加密货币及其背后区块链技术的成长，使很多人对基于账户体系即从一个子账户到另一个子账户，层层转接的支付方式，提出了重大质疑。这个体系完全脱离了现有的清算支付体系，实行点对点的资金交易，就像发送一封邮件一样，从一端发到另外一端，不必通过层层转接。**

## 提升全球跨境贸易和支付结算效率

■ 吉冈成充 / 三井住友银行常务执行委员兼东亚本部部长



吉冈成充

区块链技术将成为未来的支付体系，全球贸易体系在其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中国的支付技术发展非常快，中国人因而受益很大。现在跨境贸易的传统支付方式，其整个流程就是由出口到入口再到进口的过程。出口方会有银行参与，然后有运输、保险等参与，最后到进口方的海关通关进口。整个流程非常长，期间需要大量公文并需要耗费很多人力。因为流程长，参与的机构和人员多，就会涉及效率以及人为失误等问题，一些商业机会也可能因此而错失。

我们的“马可波罗”计划，可以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帮助大家在全球金融机构间能够更方便、顺畅

地对接。“马可波罗”计划目前已有欧美、欧洲以及大洋洲的很多银行参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马可波罗”计划这个系统主要在出口和进口方之间起到中间商服务的作用，比如把购买单进行上传，连带发票的传输。在出口和进口方各有一个支撑银行，我们给这两个银行提供 IPU 的形式保障支付的安全、便捷、可靠。在“马可波罗”计划当中所有的信息、信件都是数字化的、加密的，即传统支付方式中的人为录入，都以更加高效的数字化方法完成，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能避免一些人为的错误。

“马可波罗”计划旨在将不同平台、不同的组织方连接起来，形成全球跨境贸易体系和全球支付结算体系中的重要平台，为大家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都能加入“马可波罗”计划，成为我们的一员，一起携手促进区域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提高全球贸易效率，让全球贸易更便捷。

**在“马可波罗”计划当中所有的信息、信件都是数字化的、加密的，即传统支付方式中的人为录入，都以更加高效的数字化方法完成，这样既能提高效率，又能避免一些人为的错误。**  
**“马可波罗”计划旨在将不同平台、不同的组织方连接起来，形成全球跨境贸易体系和全球支付结算体系中的重要平台，为大家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 科技与金融、支付体系与存储体系之间的冲突问题

■ 朱宁 /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

结合今天的主题——全球贸易秩序变革趋势与货币支付体系竞争,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科技与金融、支付体系与存储体系之间的冲突问题。

第一,科技进步对金融,尤其是在全球支付体系 SWIFT 下对金融的贡献。SWIFT 体系诞生至今已有近 50 年的历史,过去 10 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支付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但对 SWIFT 体系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而且 SWIFT 体系也受益于科技进步尤其是电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不同的支付体系在安全、效率以及标准化、自动化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我们通常认为在这些方面 SWIFT 体系都具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在过去 10 年得以不断巩固。我们要利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全球支付体系的发展。

第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冲突。一些国家的货币比如美元、英镑、日元等可以成为主流货币,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长期贸易顺差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许多利益,使其货币信用和资源得以积累。但是,这需要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黄金标准。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因贸

易顺差和拥有较多资源,所以其货币在全球主导权更强。

第二个假设是我们的货币体系与黄金体系相连。货币的价值是由黄金储备来衡量的,但是现在这种假设受到了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我们不再依靠贵金属衡量货币的价值,比如美元是全球头号储备货币,但它与黄金价值没有任何关联。在贸易方面,原有的支付理论已经无法再适用未来。

第三,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体系的矛盾。储备货币体系不仅存在于金融行业,它在整个发展战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体系并没有同步发展。支付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之内和区域之内进行的,而这些支付的大部分会受到国家和区域政策影响。

所以,SWIFT 体系可能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工具,而且在全球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可信任的全球支付体系。

第四,商业利益和政府战略方面的矛盾。可以说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经贸方面的事,它同时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同时也是外交的一部分。每一个国家对于把哪一种货币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都有自己的考量和选择,但是支付体系在很多情况下是受到商业活动影响的。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公司,在贸易支付过程中都会考虑货币是否具有世界主导权。而且现在我们面临的新技术飞速发展,也会带来支付体系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支付体系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我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新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这些新技术将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变革的重要引擎。

## IFF 政策对话 (4)

- 绿色智能和可持续性本轮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 56  
潘教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 新一轮技术变革,机遇挑战并存 57  
马名杰,国务院发展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
- 在工业革命 4.0 时代乌拉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59  
里卡多·帕斯卡尔,乌拉圭央行前行长
- 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应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60  
陈永正,随锐科技联席董事长、微软大中华区原首席执行官
- 区块链重塑保险行业的商业模式 62  
吴保军,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绿色智能和可持续性是本轮科技革命的基本特征

■ 潘教峰 /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

目前全球科技正在面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引发的产业革命正在兴起，这一轮科技革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它会转变我们的观念、提升我们的能力甚至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总体上来看，这一轮科技革命总的特征就是人工智能和可持续性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一个大趋势，可持续性发展也成为其重要特征，人类的发展现在遇到很多挑战，科技治理致力于应对这些重大挑战。这一轮科技革命会为生产力发展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会促进生产力跨越式提升，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未来的科技革命首先是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比如在一些重大的、基本认知问题上的突破，包括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以及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第一，科技革命会改变人类的观念，深化对宇宙的认识。其实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过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意味着经典力学世界观的诞

生；第二次是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提出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观。时间、物质、能量之间是有联系的，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谓能量的问题，按我们现有的理论和认知，只能解释这个世界的 10%，剩下 90% 我们解释不了。

第二，科技革命会提升人类的能力。从人文主义来看，人类整个科技发展的历史，就是三个能力外化的历史：第一是机械力；第二是工业革命；第三是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智力外化的过程，也就是程序化，人工智能仍然是这个过程的延续。

第三，科技革命还可能会带来新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这样一些新的技术，正在促进数字经济的兴起和数字社会的形成。另外，新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干细胞和再生力学生发展而来的精准医疗免疫治疗等，都是一场新的革命带来性的影响。

第四，科技革命可以改变社会结构，未来可能会出现人、机、物三个融合的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特别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把人、机器世界、物理空间三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人、机、物融合的社会形态。

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会成为一个中心节点，人类的创新创造将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活动。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把人、机器世界、物理空间三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人、机、物融合的社会形态。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会成为一个中心节点，人类的创新创造将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活动。**

## 新一轮技术变革，机遇挑战并存

■ 马名杰 / 国务院发展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



马名杰

新一轮技术变革或新工业革命，不管如何界定它、称呼它，也不管到底是第几次、第几轮，它确实已经开始对经济、社会乃至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侧重讲一讲“挑战”。回顾过去几年，以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在中国的发展及影响来看，现在主要有四对矛盾关系日益受到关注。

### 第一是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一方面，新一轮技术变革发展速度快、前景广，但是技术变革最终要实现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所以任何一个新技术，一定要变得可盈利，寻找一种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这几年，从数字技术最初进入服务业，特别对消费者服务开始产生影响，到现在为止，这种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找到。近两年，数字技术又开始影响到了制造业，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工业 4.0、工业互联网等，其在制造业领域中的可盈利商业模式，目前也还在探索之中。

要让数字技术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经济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就必须找到一个可盈利的商业模式，而这仍然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我们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当然，这个问题主要通过企业在市场当中的试错去解决。

### 第二是效率和就业的关系。

这些年在中国已经大规模出现了机器替代人工，大量高度自动化、数字化的生产设备开始进入工厂，所以有了智能制造，甚至有一些企业已经出现了无人车间。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一线生产工人的替代，目前来看这种就业的替代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并且规模也不大。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大量的由于技术进步、机器替代人工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由于服务业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新就业人口，包括从制造业中释放出来的一部分就业人口。但是，随着这种大规模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技术在服务业等各行业领域的更深度的应用，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对于就业的替代现象，恐怕我们还要保持高度关注。效率和就业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恐怕未来对劳动市场乃至教育政策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们要有所应对。

### 第三是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世界各国一方面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个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具体像滴滴出行这样的共享平台经济产生的新型劳动雇佣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产生，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劳动者的保护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和挑战。我认为一个核心就是利益再平衡的问题，如何平衡雇主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关系，关系背后取向是不一样的，体现了国家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价值观，各国都面临这方面的技术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目前实行宽容审慎监管，但是发展和保护的问题确实摆在我们面前。



#### 第四是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新一轮的技术进步,让世界变得更扁平化,数据、人才跨越国境的流动变得更加便捷迅速,推动了全球化发展。然而,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一般具有很强的通用性,会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高度敏感问题。在当今的国际格局和国际规则下,平衡处理好数字经济跨国发展、国际合作,与维护各国主权安全、增进互信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

开放和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国家间的信任机制,也就是需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国家间新的信任机制。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深入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其范围涵盖了产业、经济、社会、政府治理乃至国际关系各个方面,而且发展十分迅速,所以导致政策、法律和国际关系在内的一系列的原有的规则变得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在过去的几年愈演愈烈。

最后总结一下,前面讲的四对矛盾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有的一些关系面临新的再平衡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新规则、新治理。从国际层面上来看,需要各国在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影响下,把负的外部性内部化,真正基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促进各国经济

和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如何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竞争,实现宽容审慎监管让市场充分试错,政府如何更好处理和市场的关系,在新技术变革、新工业革命当中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

## 在工业革命 4.0 时代乌拉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 里卡多·帕斯卡尔 / 乌拉圭央行前行长



里卡多·帕斯卡尔

拉美国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想着重讲的是乌拉圭面对的几个重要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地应对。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技术方面。要有一系列的强大技术产品和产业发展出来,能够更好地塑造现在的经济,并且能够促进长期的发展。这些技术包括量化生产的改革,还有一些全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方面。在今天,知识是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来源,它比劳动力和资本更加重要。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来讲,如何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发展。

第三个挑战是发展中的差距。从 2011 年购买力平价和 GDP 的表现趋势来看,乌拉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这种差距对乌拉圭未来发展和政策调整至关重要。如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现在远超乌拉圭,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发展差距是越拉越大。

第四个挑战是全新技术如何影响经济、企业和人民的生活。现在的工业革命 4.0 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可以从大数据看到其在企业和经济上影响。德国出口

518 个产品,这些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很大优势,展现了德国在经济上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其在全球出口方面占据了较大比重,这是德国发展的优势。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算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发展,有效应对包括 AI 人工智能、云计算、先进制造业、机器人企业、可再生能源、3D 打印等问题,这些新技术会对全球经济、企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麦肯锡做过一个调研,指出了会对社会、企业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颠覆性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

第五个挑战是变革给人们带来的长期心理压力,包括劳动力老化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这对拉丁美洲应对政策会有影响,对于人类发展会有影响,人类发展的速度会不断加快。对于未来社会来讲,人们需要更多的是“软技能”而不再是“硬技能”,因此在学校、社会当中要着重培养软技能,比如创新能力、说服能力、协同能力以及时间管理能力等,所谓“硬技能”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分析、用户界面设计等技能。

对于乌拉圭来讲,应当借助新的知识型经济技能,转化为可社会化的技能和知识。在以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中,乌拉圭都没有抓住机会,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进行全面投资,投资标准化产品,还有应对金融危机和科技变革带来的内部冲击。知识和创新会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乌拉圭以前主要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应该通过科技创新,把乌拉圭转型为低劳动密集型的国家。

# 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应 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 陈永正 / 随锐科技联席董事长、微软大中华区原首席执行官



陈永正

当前技术的进步速度是远远超出过去几百年几千年的。比如说大家每天都在使用的移动电话, 30 年前我们使用的“大哥大”只能接打电话没有其他任何功能, 后来通讯技术不断发展 2G、3G、4G, 直到今天的 5G。过去 30 年, 每七八年传输速度就增加 10 倍, 从 100 多 K 到 1G、10G、100G 再到现在的千兆网络, 可见科技发展进步的速度之快堪称“飞速”。

4G 通信技术的普及, 使每个人都能使用智能手机, 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智能小电脑, 网速也达到了 10 兆。随着云计算、电子商务的到来,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完全改变了, 大家可以不再携带现金却可以随时随地付款, 还可以随时随地叫车。总的来说, 过去十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未来十年, 随着 5G 通信技术带来的万物互联, 每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个 ID, 每一个东西都可以互相沟通。还有量子计算, 过去计算机要跑 30 年才能计算的问题, 未来一两分钟就可以解决。还有人工智能, 虽然现在刚刚起步, 围棋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就已经能打败人类的围棋冠军。人工智能已有视觉判别功能, 现在到处都安装了摄像头, 配合人工智能形成大数据。5G 技术的

发展推动了边缘计算的快速落地, 像我们每一栋楼里都会有个边缘计算的服务器, 这个楼里的活动因而可以进行更快的计算。科技的飞速发展还体现在生物化学方面, 比如基因改造, 用干细胞可以制造人的器官。生物医学方面, 癌症已经被逐步攻破, 大概还有五六年老年痴呆症就可以被攻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寿命普遍达到 100 岁甚至 120 岁,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到来, 会改变传统的交易。

未来二三十年, 对于企业来说, 是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时期。说最黑暗的时期, 是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很多工作岗位将会被取代; 说最光明的时期, 是因为未来每一个人的寿命都将延长, 精力也更充沛。

在技术快速变革的大环境下, 各行各业都将面临技术转型、商业模式转型, 这其中有几个跟粤港澳大湾区密切相关。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的制造中心, 是世界工厂, 也是中国的“硅谷”, 广州和深圳的技术创新领先中国很多城市。现在富士康工厂的工人每三年就会换一遍, 因为愿意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越来越少, 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这倒逼工厂向智能化、自动化、工业互联网转型。每一个行业都将面临转型, 但如何转、怎么转, 在复杂的环境下该怎么做, 政府怎么支持、怎么引导、怎么扶持、怎么布局, 这些都是关键课题。

第一, 创新中最重要的还是人, 硅谷当初能发展起来, 主要就是靠斯坦福的一群人加上 VC 基金和资本市场。所以, 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政府应该着重考虑怎么培养人才, 或者吸引人才到湾区来。

第二, 创新还要考虑产业布局。由于各种资源的限制, 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引入新技术, 应当考虑技术在产业链的布局问题。大湾区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还有深圳、广州、珠海等九个广东城市, 如何进行科技分工, 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不能让每个城市都专注物联网或区块链而忽视技术研发。

第三, 创新需要引进一些新兴的明星企业或龙头企业。2019 年科创板正式开板, 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独角兽企业的培养时间大约需要



8 ~ 12 年,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平均五年就能发展起来。

中国的市场、创意, 再加上科创板的助力, 可以很快产生独角兽企业。大湾区政府应当抓住机遇, 着重考虑怎么引进、培植明星和独角兽企业, 因为独角兽企业可能会引领一个新的产业发展。

第四, 创新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政府财政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补助和支持创新企业的发展, 可以通过精准分析和规划, 考虑选择一次性补助, 或是从长远发展出发, 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产业链财政补助体系。

**其他国家独角兽企业的培养时间大约需要 8 ~ 12 年,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平均五年就能发展起来。中国的市场、创意, 再加上科创板的助力, 可以很快产生独角兽企业。大湾区政府应当抓住机遇, 着重考虑怎么引进、培植明星和独角兽企业, 因为独角兽企业可能会引领一个新的产业发展。**

# 区块链重塑保险行业的 商业模式

■ 吴保军 /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保军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国政府的前瞻判断让区块链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金融资本、实体经济和社会舆论的共同关注点。结合保险行业来看，保险的本质是风险的交易，现实中通过保险实现风险转移和分散的事例，涵盖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保险具有天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

区块链在保险领域有广泛的创新应用，例如英国的保险公司应用区块链技术，帮助确认钻石、艺术品等有价值物的流转历史和真伪识别；欧洲保险公司尝试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结合，通过利用智能合约投保的客户自动理赔。区块链技术的市场价值在 2025 年将达到 1760 亿美元规模，到 2030 年将达到 3.1 万亿美元规模。区块链技术也被其列为未来五到十年带来变革性影响的科技。

在区块链技术的驱动下，保险行业的商业模式、产品形态、服务形式、运营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保险科技也将重塑保险业的竞争生态。跨界、融合、生态、场景等将创造出无限的竞争和想象空间。

区块链作为新型交易媒介，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点，使区块链在交易模式上，相对传统的模式有着

颠覆性的革新，包括对征信体系构建的革新，更加凸显了区块链的变革，塑造商业模式和形态的战略的意义。

社会性也是保险和区块链共有的特征，两者具有基因方面的相似性，这是保险和区块链实现融合创新的逻辑基础。除了社会性以外，保险和区块链的唯一性、时间性、效率性也有着不解之缘，这些都是保险与区块链实现融合创新的逻辑基础。因此，保险是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典型场景，区块链是保险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

区块链的社会性是由技术特征所决定的，是其赖以生存的，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前提是全网的共识，即所有参与者的集体共识。同时不再依赖有形的中心，而是通过分布式技术，实现自我和平等的管理。同时结合利用加密技术，区块链能够构建起一个基于计算的信任体系，即算法信任、刚性信任，这种信任更加客观、更加独立、更加可信，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高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险业创新发展可分为两个视角，一是对于传统保险的再造，即针对传统保险的难点和痛点，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二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展保险的创新，特别是个性化、碎片化、场景化这几个方面，从原有保险公司服务客户的模式转变成以区块链技术为平台，基于客户之间的信任、交易信息共享的客户互助共赢的一种模式，充分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不可篡改的特性。我们对传统的保险经营模式进行转变思考，构思出基于客户间信任的互助型的保险商业模式，推动传统的保险公司向科技型保险公司进行转型，这个也是众诚保险致力于发展的方向。

总的来说，区块链对保险商业模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品创新。当前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同质化非常严重，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行业对区块链的理解和思考的加深，未来会出现大量的基于区块链技术，以共享互助为特点的产品和服务，允许客户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自主地定制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保险服务。

第二，服务创新。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组合 5G 和互联网技术，可以让客户自助投保和理赔，不需要



保险公司中间环节。区块链根据设定好的条件自动触发和执行相关服务，无需人工干预，提升服务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保险公司目前居高不下的运营成本。

第三，信任成本的降低。基于区块链不可篡改、分布式的技术特性，保险公司可以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将关键的数据上链，在行业内外共享数据、链条的参与将大幅降低为判断客户诚信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为优质的客户提供更直接和更加优惠的服务，降低信用成本，实质上降低客户的用车和投保成本。

区块链的快速发展，孕育了内在的矛盾，再矛盾中发展的区块链技术也会进一步改善和变形，更加凸显区块链多方参与和创造信任的内在颠覆性的价值。区块链的社会属性和保险业天然吻合，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逐步成熟，将加速跨界的融合，场景和技术的融合，进而推进保险新生态的重塑和变革。

未来，所有的金融企业都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企业，区块链的代码、信用将颠覆金融，尤其是保险领域的很多方面，众诚保险也希望在这个领域能作出自己的贡献。

# 从帮助中国更好联接世界的角度 看粤港澳大湾区

■ 韩升洙 / IFF 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韩升洙

广州、釜山，然后经过白令海峡到圣彼得堡，甚至去到更多的城市，连接到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我希望中国能够认真考虑使用海路连接这些东边的国家，我相信这些国家将会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发展契机。当然，韩国也希望有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通过朝鲜就可以跟中国连接。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在积极推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这些地区也得到了发展。这些地区的蓬勃发展、技术进步又推动了世界的发展。现在，制造业已经成为了这些地区发展进步的重要环节，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发展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中心，未来将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中国重大国家战略，对内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带动全球经济联通增长。我相信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我很开心看到大湾区取得这么多的成果，我相信国际金融论坛（IFF）将会进一步推动大湾区走向世界，并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开始，然后延伸到欧洲，但是并没有向东连接。然而，东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国家——韩国和日本。韩国、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通过海洋可以连接很多城市，像

*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开始，然后延伸到欧洲，但是并没有向东连接。然而，东边有两个很重要的国家——韩国和日本。我希望中国能够认真考虑使用海路连接这些东边的国家，我相信这些国家将会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发展契机。*



## IFF 圆桌会议 (1)

从帮助中国更好联接世界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	65
韩升洙，IFF 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开发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66
刘 勇，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互联互通	68
叶桂平，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做更好的规则对接	71
王振民，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	
南沙区如何落实粤港澳全面合作	73
蔡朝林，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更好协调三地优质科创资源的建议	74
李善民，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	
促进大湾区的绿色发展	75
戈登·鲍尔，大地资本集团首席投资官兼创始人	
如何“吸引”、“培养”高科技企业	76
郭 凯，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	

# 开发性金融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

■ 刘勇 /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刘勇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19 年 2 月 19 号和 8 月 18 号，先后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11 月 5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以及在巴西利亚金砖会议上，都提出了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讲这几个时间点是想说一个概念，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四个大湾区，美国有两个，一个是东海岸的纽约湾区，一个是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另外就是日本的东京湾区和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 7000 万，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其他三个湾区之和。

第二个概念是经济密度，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创造的 GDP 总额。经济密度最大的是纽约湾区，每平方公里创造的 GDP 是 7731 万美元。第二是旧金山湾区，GDP 是 4556 万美元。第三个是东京湾区，GDP 是 3723 美元。粤港澳大湾区的 GDP 是 3221 美元。另外，就是第三产业产值占比。2018 年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 66%，其他三个湾区第三产业占比都在 80% 以上。再有从人均 GDP 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 GDP 约为 2 万美元，而纽约湾区的人均 GDP 大致是 11 万美元。

可见，中国大湾区互联互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也就是把大湾区作为中国高水平开放体制的一个先行区和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来看待和理解大湾区的互联互通，包括：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 加强互联互通的远联通。国家开发银行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当时做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今天的京九铁路，到 2019 年 10 月底，开发银行总资产一共是 16.4 万亿人民币（2.4 万亿美元），资产总额在中国银行中排名第五，国家开发银行在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 500 强中，名列第 76 位。

2019 年 7 月，开发银行配合中央提出的大湾区发展规划，出台了专门的融资支持政策，即在大湾区设立专项融资，重点支持大湾区的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是干基础设施起家的，例如国开行为支持中国铁路发展，为铁路建设融资达 1.6 万亿人民币，另外还设立 2000 多亿专项基金支持铁路发展。高铁是国开行的重点支持对象，另外还包括轨道、交通、机场和系统性交通体系，水资源安全等等。此外，国家开发银行还专门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发行了债券。国家开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设有 5 个机构、3 家分行（广东分行、深圳分行和香港分行），还有国银租赁和证券公司。我们要求各分行都要有自己的定位。比如，广东分行侧重于基础设施；深圳分行重点是产业支持、科技金融；香港分行主要利用香港市场离岸和对接国际市场的方式，以及租赁和证券公司。

因此，在推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勇于改革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建立大湾区先行示范区要有当年深圳的速度、深圳的效率、深圳的精神。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关税，三种货币，其发展建设既有难度也有优势，更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国家开发银行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设立了特色分行并很注重远联通，希望在大湾区当中建立智库联盟。国家开发银行不仅是



送融资，更主要的是送一种机制，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软联通问题。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内地国家认可的唯一金融企业高端智库，我们已经发出倡议，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并积极通过顶层设计，在货币流通和机制创新等方面为企业、为社会、为政府提供支持。国开行也希望在金融科技、数字货币以及 5G 应用和物联网等方面发挥作用。

2019 年广东预计全年增长 6.4%，我个人估计中国 2019 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 6.2% 左右。第二，广东已迈进 10 万亿，2019 年 1-10 月份，广东省引进外资 1300 亿，而且有 1.2 万个外资企业在广东落户。国家开发银行想从开发性金融角度，在促进硬联通、软联通方面，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湾区、中国故事的大湾区、中国模式的大湾区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 粤港澳大湾区的 科技创新、互联互通

■ 叶桂平 /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



叶桂平

围绕大湾区科技创新，如何推动互联互通，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分三部分：

第一，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规划不可缺少，大湾区的发展应该担当什么任务？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面临规则衔接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第三，结合这些衔接所面临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首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意义。科技创新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大湾区的发展，能不能获得动力、维持竞争力、增加吸引力、提高凝聚力，科技创新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而且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还能促进创新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增

加粤港澳三地协同，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最终向外产生一些溢出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以及国际分工协作的地区，也具备了激励创新创业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已经具备了雄厚的产业经济基础，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一个区域，而且无论是内地九个城市，还是香港、澳门，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分工优势。而且这种分工优势还具有很强的互补倾向，比如大湾区广东九个城市中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还不足10%，所以急需在源头给予技术支持。而香港、澳门无论是高校的研发能力，还是高校的世界排名，都可以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互补。

另外，从世界著名湾区的演化历程来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应该有集聚创新资源的能力，其次还应该有引领新兴产业的能力，以及营造吸引力、创造环境的能力和支配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

第二部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和发展，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规则衔接问题。

第一，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政府架构有着显著差异。广东九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在政府架构方面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也因此造成了一些衔接的障碍。另外，科技主管部门的联席机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顶层已经有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领导小组，中层也有原先的粤港联席会议和粤澳联席会议，但是大湾区的九个城市和科技主管部门至今还没有建立联席机制，无法及时交流对接，这很不利于具体事务的落实。另外，在内地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方面，具有政府主导特征，而港澳历来都是强调市场主体的自主运营，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与内地是截然不同的。港澳的市场体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缺乏权力和能力扶持科技创新活动，也不能

很好地促进产业升级和应对全球的竞争。

另外，政府的科技资源投向也是不一样的，港澳政府财政科研经费是比较难以投向产业研发的，只能较多地投入高等院校、偏向于基础研究。这个是港澳的特点。

第二，在财政科研经费方面，粤港澳三地经济发展环境也不相同。财政的科研经费作为一种特殊的资金类型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所以在管理的主体、会计准则、资金使用凭证、货币类型、跨境管理方面都存在差异，对粤港澳的财政，科研经费的跨境使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在科技人才方面的问题。现在出入境及通关手续繁琐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内地技术、科研人员要到港澳，仍然会存在签证办理过程长等问题。港澳的科研人员要来内地发展，又面临着回乡证与居民身份证不同的问题，在生活上也会遇到一些障碍。

第四，在人才竞争方面。大湾区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同构，这导致各地对人才的需求都较为僵持，造成抢人大战不断出现。粤港澳三地的人才需求结构的同构系统如果没有解决好，恐怕还会更加严重，因为在科技发展和人才发展的双轨道竞争不可避免。

第五，在所得税方面，内地相比港澳税率偏高，除了最高税率之外的其他税率差距也很大。港澳人员在内地停留累计超过183天，就须按照内地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来征税，这也可能会对创新活动造成一些影响。另外，港澳地区一般都没有关税和增值税，内地企业所得税偏高也限制了港澳人士创业的热情。

第六，资格认证的问题。港澳跟广东省的行业准入标准、技术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在知识产权方面，大湾区三地由于历史原因，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保护期限，以及权利的取得方式都有很大的区别。

第七，科研设备、生物样品和信息的出入境方面的问题。港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要将放在港澳的科研设备，运送到内地分支机构使用的时候，往往按照二手仪器设备入境的手续办理，需征收30%的关税，这也是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到内地做科研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生物样品的出入境方面，内地对人体组织、血液等科研样本，以及实验室试剂、微生物标本和遗传资源的监管、出入境是相当严格的，这些材料要离开内地到港澳特区也是非常困难的。尽管现在香港和广东已经设立了一些绿色通道，允许两地的生物科研样

品过关，但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在信息的获取上，港澳的科研人员如果来到内地，出于科研习惯或搜集信息的惯例，想使用像谷歌、FaceBook这样的网站还是比较困难的。

第八，科研金融。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信贷业务仍然以商业银行的科技支行为主要载体，缺乏机构跟风投资和紧密合作，服务于高新科技企业的专业科技银行比较少。另外，按照风投创投的资本来看，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在美国的一份iMediaResearch研究报告里，大湾区唯一上榜的是深圳，只占0.8%，而且排名第20位，相距北京、上海是比较远的。

最后，我再简单谈谈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既然发现了科技创新在制度衔接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在推动科技政策的协调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构建多层次协调机制方面，顶层有了，中层也有了，现在怎么把底层机制建立起来？粤港、粤澳联席会议能不能把科技的对接列到文件当中，在完善产业分工方面，能不能通过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处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关系。

每个城市都要明确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充分整合各方资源，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产业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布。这样才能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才能真正解决人才的同构问题，避免资源被大量的浪费。

第二，强化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首先要建设全球顶尖的科技基础设施，大湾区应该着手建设世界级的科学设施集群，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要支持跨国公司来大湾区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大区域的研发中心和开放式的创新平台，支持有实力的外资、研发机构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研项目。

第三，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办学。大湾区在办学方面应该要注重吸引世界著名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独立或者合作在湾区创办分校、分院和新型的大学。因为大湾区的发展，人才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且大湾区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职业培训相当薄弱，除了白领以外，大湾区也很需要蓝领。建设国际化创新产业的孵化平台，大湾区应该重点吸引聚集国际知名孵化器、创业投资机构和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第四，促进创新要素的便捷流动。大湾区应尽量推出一些便利措施，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人才。出入境手续尽可能无纸化、无证化，努力做到刷脸通关，随到随走。



第五, 推动科技成果的跨区域转化。由于产业基础的原因, 港澳在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环节还没有相应跟上, 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能不能通过发展“飞地经济”模式, 有针对性地筛选和引进港澳的科研成果及项目。像澳门与葡萄牙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科研成果, 能不能投入澳门平台并把它引到大湾区? 然后把它的研发成果落地转化。

第六, 在促进科研设备等转移及信息的获取方面。大湾区能不能参考上海科创中心海关的做法, 设立大湾区的科创海关, 面向科创中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创新个性化的监管,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重点为二手科研设备、生物样品提供专门的指导。

第七, 增强科技资本的流动。针对财政科研经费存在的衔接问题, 粤港澳三地应该从差异出发, 进一步探索搭建各环节的有机流动。首先, 可以推动三地会计做账方法的互通互融, 异地相关经费的支出可以按照项目执行机构所在地的会计准则来做账。其次, 推动三地资金可以使用凭证的互通互融, 因为内地很流行发票, 但是港澳不流行发票, 只是拿一张单, 手写一写就完了。再次, 推动三地货币的互通互融, 能不能为汇兑损益预留一定的空间? 不然, 拿了一笔人民币经费打到大学的账上就少了一大截。

第八, 促进科技金融合作。以金融科技为驱动, 鼓励互联网、银行、移动支付平台这些金融新业态, 在移动支付、金融安全、跨境人民币业务应用等方面加快探索、试点互认, 尽可能使金融市场能够优先互

联互通, 也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驱动型金融产业链。

最后, 大湾区应该支持设立科技支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支持科技企业发行债券, 能不能研究实行投贷联动, 来推动设立科技贷款风险担保的资金池或者科技风投的引导基金。

虽然会面临很多困难, 但是只要国家有决心, 粤港澳三地有信心, 粤港澳大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做更好的规则对接

■ 王振民 /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



王振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中国第一个“跨境”合作项目, 但这个“跨境”不是国境, 也不是我们内地省与省之间的边境, 而是一国之内, 内地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边境。所以, 这个合作就面临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的关税区、三个独立的货币区、三种独立的出入境, 还有三种不同的司法制度, 三个独立的经济实体, 也因此需面临规则对接的问题。这些年粤港澳之间的合作遇到很多制度体制上的障碍, 特别是三种法律制度带来的不便。我想谈谈规则对接问题。

港澳回归 20 多年, 在规则对接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 有成功的案例, 也有不成功的案例。最成功的案例就是 2006 年深圳湾西部通道实行“一地两检”, 还有 2017 年在高铁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 这两

个“一地两检”是非常成功的规则对接案例。当然, 也有不成功的案例,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港珠澳大桥, 最初是“三地一检”, 最后搞成“三地三检”, 非常不方便。

总结过去 20 多年港澳跟内地合作的经验, 我觉得在规则对接方面首先有一个原则要坚持: 大湾区建设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大湾区建设不是要把港澳内地化, 不是要用内地的规则取代港澳的规则, 而是会按照基本法办事, 会继续保持“一国两制”, 也不会取消港澳和内地之间的物理边界, 这是规则对接的一个大前提和基本原则。我们知道美国、英国有 **United**, 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没有 **Unified**, 它们也没有追求 **Unified**。现在大湾区的规则对接也是一样的, 是 **United**, 在一些领域可能会 **Unified**。我有以下几个具体想法:

第一, 规则的对接需要三地建立合作机制。首先在规划纲要里面列出的每一个领域, 都应该有一个合作机制, 特别是法律领域。比方说, 三地共同打击犯罪, 特别是金融领域, 金融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敏感的。在这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还没有形成有效机制。比如, 判决书、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包括取证的合作等。一个人在香港宣布个人破产, 他在

香港可能没有资产, 但是在大湾区可能有资产, 但是现在没有合作调查的机制。我觉得三个地方的有关部门需要对接。

第二, 在有些领域, 我们需要学习借鉴欧盟。欧盟 27 个成员国的很多经济贸易法律已经一体化了,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体化方面也可以进行探索。也就是建立一个大湾区共同规则, 共同规则建设上应该“就高不就低”, 即哪个地方的规则更

**总结过去 20 多年港澳跟内地合作的经验, 我觉得在规则对接方面首先有一个原则要坚持: 大湾区建设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内。大湾区建设不是要把港澳内地化, 不是要用内地的规则取代港澳的规则, 而是会按照基本法办事, 会继续保持“一国两制”, 也不会取消港澳和内地之间的物理边界, 这是规则对接的一个大前提和基本原则。**

符合国际标准, 就采用哪个规则。比方说, 港珠澳大



桥的建设,内地大桥的寿命是 100 年,香港是 120 年,所以大桥设计寿命就应该是 120 年,这就是“就高不就低”。

第三,一些规则冲突可以通过高科技克服。比方说,采取湾区一卡通,即手拿一张卡,三个地方就可以自由行走。也就是在出入境的证件方面,可以通过采取一些高科技的办法,弥补规则上的不衔接。

第四,成立一个常设的三地委员会,解决大湾区的规则问题。具体的还需讨论、落实,目前很难泛泛而谈哪些规则要对接,哪些不宜对接。

第五,要提高大湾区整体的法治化程度。要把大湾区打造一个法治高地,建设法治化的大湾区,特别是要加快广东九市的法治建设。我们必须承认在法治建设上,内地跟港澳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需要努力。要实行无罪推定、无错推定,包括“法不溯及既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经济、社会、贸易当中的作用;要努力做到办事找律师,不用找关系,也不用去麻烦领导,就能够把事情办成。我觉得在上述方面,大湾区的广东九市还需要加倍努力。

最后,规则的矛盾、规则的冲突是自然形成的。但

是,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意愿克服这些矛盾、这些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 南沙区如何落实 粤港澳全面合作

■ 蔡朝林 / 广州市常委、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沙片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蔡朝林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已经出台,如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央的顶层设计越来越清晰,三地的共识也逐步形成,就是要促进要素高效便捷地流动,促进互联互通,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够真正地自由流动起来。

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里被定位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就是抓落实,尽快出成果。简单总结:

第一,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交通方面,广深港高铁、南沙大桥在三到五年之内会形成以南沙为中心的半小时经济圈。大湾区唯一的互联网 IPv6 根服务器也落户南沙,这些都为互联互通提供了基础保障。

第二,建设一批重要的合作平台和载体。南沙原来有资讯科技园,香港科技大学在这里建立了霍英东研究院,孵化了一大批企业,比如著名的大疆集团有限公司就发源于南沙,后来因为当初南沙基础条件差,不足以支撑大疆的发展,所以去了深圳,并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现在南沙正在建设一批“粤港深度合作园”、“粤澳合作葡语系国家产业园”、“粤港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平台的建设,让三地的资源、要素能够在南沙集聚,能够为三地服务。

第三,南沙还将建设一批重大的合作项目。大家知道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在南沙落地,9月26号动工,它会建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有别于现在大学形态的创新型大学,以交叉学科来设计,有别于传统的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而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些完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完全面向于市场的学科设计。香港知名的企业,像新鸿基、嘉华、丽星都落户了南沙。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以这些项目来推动三地的互联互通是非常必要的。

南沙出台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和制度,比如两年前就出台了港人港税和澳人澳税的方式,鼓励香港和澳门的年轻人到南沙创业,也鼓励港澳专业人士在这里共建走出去的服务基地,鼓励专业人士到南沙执业。以建筑业为例,在这里完全按照香港的标准建设。

全国首个面向于科技人才和港澳青年的共有产权房政策在南沙向全社会推出,我们希望居者有其屋,希望在南沙业的青年人能够尽快有自己的家。大湾区是一个大命题、大课题,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现在仅仅是初步。我们将建设一批、推动一批、谋划一批,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 更好协调三地 优质科创资源的建议

■ 李善民 / 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



李善民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三地的协调机制不够，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方面协调机制问题，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尤其全球顶尖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当中，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现在主要的好学校、科技创新资源在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的创新氛围和环境较

好但资源匹配度不够；香港的原始创新很好，但科技成果转化不够。另外，广东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还不够。当然，香港有很多资金，但关键是怎么引进到内地。广东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比较少，所以协调机制或者合作机制的建立很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大湾区的广东、香港、澳门三个地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应该有一个协调的机构。

第二点，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深圳、广州、南沙都在积极推动国际先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另外，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也要加快推进。包括南沙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还有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这些都要加快推进。

第三点，要加大金融对大湾区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前期发展是很重要的。可以考虑成立一些大湾区科技计划的专项支持资金。



## 促进大湾区的 绿色发展

■ 戈登·鲍尔 / 大地资本集团首席投资官兼创始人



戈登·鲍尔

人才、技术、资金、机构和远见都是地方发展的关键。包括广东九市和香港、澳门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中国南部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开放举措。大湾区人口比英国还多，是加拿大的 2 倍；大

湾区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 1%，但是贡献了中国 GDP 的 12%；大湾区有三个世界上排名前十的港口。大湾区的基础非常强，现在需要科技的流动、资金的流动，以及人才的流动。这些要通过融合来实现，也肯定会大幅度开放科技的创新和投资。也正是因此，大地资本集团很快要在南沙建立办公室，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大湾区的开发，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广州正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绿色科技和绿色发展理念，因为这与大地资本的理念很贴近。

我和斯蒂文（音译）一起创建了大地资本集团，公司在 226 个投资项目上实现了 28.5% 收益率，在 33 个可持续项目上实现了 45% 收益率，公司管理资产达

16 亿美元，运营遍及北京、新加坡市、内罗毕、伦敦、巴塞罗那、纽约和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公司特别关注跟气候变化有关的资本投资，关注可持续发展。公司在全球都把资本投向知识增长、可持续技术的行业里，覆盖的行业包括农业、清洁工业、发电、资源和能效等等。公司目前在广州，尤其在南沙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我们与南沙金融控股、iGreen Bank（音译）等合作伙伴，建立了科技转让和培育中心和企业孵化器，我们会把绿色金融和“大地红利”（音译）结合起来，这个“大地红利”是我们所开创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专门的评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工具。

我们跟合作伙伴建立绿色科技发展基金，助力一些先进技术商业化。我们通过大地资本集团的平台把全球科技公司、专家和资本联系起来，让他们在大湾区生根，支持中国市场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

**人才、技术、资金、机构和远见都是地方发展的关键。包括广东九市和香港、澳门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中国南部近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开放举措。**

建设。这样的模式结合了产业界科技、资本、政府、产业园和其他元素，这是一种新的商业形式，这样能够让需求方更加紧密地合作，这样我们才能把最好的资源带到大湾区来。

# 如何“吸引”、“培养” 高科技企业

■ 郭凯 / 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



郭凯

首先，我们一定要从未来的角度来看高科技。因为科技行业发展变化太快了。比如，10年前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想象做大数据，如果当时一个AI公司想在深圳落户，坦诚地说能不能进去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一个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AI公司，每个地区都会抢着要。所以，科技行业一定是基于未来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要“吸引”高科技企业，更要关注“培养”高科技企业。现在，全球市值在4000亿美元以上的高科技企业，中国占了两家——阿里和腾讯；如果看全球前20大高科技企业（其中有很多未上市公司），中国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些公司都是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今天，高科技行业或者产业的格局，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要把腾讯迁移到大湾区，这个挑战比较大。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三五年，大湾区可以“培养”出来像腾讯一样的企业。所以，相较于“吸引”，我们可能更应关注于“培养”。

无论是“吸引”还是“培养”，很关键的一点是了解高科技企业是怎么想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项目，为80%以上的全球500强的客户提供过服务，我们认为“吸引”和“培养”高科技企业主要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要有全球视野的人才举措。科技是以人为本的，短期内一些问题可能解决不了。那么，能不能把视野放宽一点，人才可以是实地的，也可以是虚拟的。比如，我们可以让旧金山湾区或者东京湾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在虚拟大湾区做一个虚拟实验室。所以，人才的“吸引”不是一定要在大湾区落户，搬家确实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是我从国内到东京湾区，再到纽约湾区，这么多年的切身感触。所以从人才吸引上来说，可以更科技化一些，可以更没边界一些。

第二，高科技其实是一个特别烧钱的行业，很多高估值的公司其实都不怎么赚钱，但是还有资金在不停投入。所以，是否能在大湾区建立全链条、全生态、全连接的、从一端到另一端的资本市场很重要。目前，我们还需要花点时间去培育这样的市场。对很多基金来讲，投高科技企业最关注的一点就是退出。大湾区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三五年，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科技行业的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所有的钱就可以在这儿进，在这儿出。所以，高科技行业离人才和资金近是很重要的两点。

第三，用科技消费升级吸引高科技企业落户大湾区。现在大湾区差不多有8000万人口，与德国总人口基本相当。可以想象一下，整个德国在消费升级，而且就在大湾区。那么，未来在消费、文化、金融等等领域，以科技为本、以科技赋能，进行更高层次、更高段位、更高档次的大升级，这个市场不是8000万人每人花100元的问题，这个市场空间将非常巨大。

所以，打开边界去看人才，用科技手段来赋能连接，给资本市场的资金在大湾区找到比较合适的退出通道，进行8000万人的消费大升级，是我们“吸引”和“培养”高科技企业的三个重点。

## IFF 圆桌会议 (2)

<b>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b> 陆克文, IFF 联合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78
<b>打造有创造力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繁荣发展</b> 珍妮·希普利,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80
<b>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的机遇和挑战并存</b> 马丁·谢克, 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CEO	82
<b>提升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水平</b> 汪民生, 瑞信方正证券总经理	84
<b>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势不可挡</b>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85
<b>开放人民币市场 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b> 周诚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	86
<b>法治保障有益于巩固改革开放成果</b> 张毅,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88

# 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得益于 改革开放

■ 陆克文 / IFF 联合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在中国总体改革框架中处于什么地位，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金融市场的效率取决于市场本身在政策当中的认可度，只有在中国政策中得到认可，金融市场才能够进一步开放。所以，中国的金融市场并不仅仅是金融市场，也是中国总体政策框架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令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士感叹不已，在这个国家处处能够看到改革开放的奇迹。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 GDP 占全球 GDP 的 2%，2019 年在全球 GDP 的占比达到了 16%。我第一次来中国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短短几十年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9 年世界银行称，中国有 8500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全球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引擎。这是如何做到的？是因为几代人中国领导人都把市场经济改革放在中国改革的核心位置，不管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金融市场都是如此。

这样一个进程并不仅仅是中国政府领导人跟国企员工和体制内人员说，下海吧，你们应该走出国企员工的舒适区，你们应该走出政府的办公室，建立你自己的企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在国营企业长大的人来说，听到这样政策他们所受到的震动。一些体制内的人下海了，亲手创造自己的企业，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就。

中国不仅鼓励在国内创业，还鼓励走出国门，到世界其他国家做同样的工作。20 年、25 年前一些年轻的中国企业家，有些曾在体制内工作，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毅然下海，离开了安全、温暖、稳定政府机构或国企环境，进入私有的市场环境，按照市场原则办事，通过竞争定输赢。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自 1949 年之后实行的一直是计划经济。到底是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中国就此辩论了很长时间，后来邓小平提出了“黑猫白猫论”，中国政府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

今天要讲市场的地位，以及在这个大市场当中金融市场的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在过去 35 年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是基于对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在逐步降低，尤其在越来越市场经济的环境当中，而私有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低薪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渐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概在 2013 年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 35 周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擘画者发现中国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于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决议明确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且进一步拥抱市场，在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有 66 项不同的改革，其中有一项涉及金融市场的改革。它真的令人非常惊叹，因为中国经济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并通过变化来满足未来的需求。显然中国面对着很多国内的挑战，包括 2015 年金融市场的稳定，这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在这一年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改革的步子变得慢起来了，大多数国际分析机构也看到了中国改革的放缓，并且仔细观察在这段时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发展是不平衡的，具体来说，过去一两年



金融领域的改革有非常明显的进步。2018 年、2019 年外资的上限被放松了，2020 年会有更多领域对外资开放。我们知道重大的变革正在开始。中国经济当中资本的配置，它的效率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认为需要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改革，需要引入更多的外资？而且几乎在所有金融服务业都要引入更多的外资。

在金融服务业当中的数字金融领域，中国是全球领军国家，以阿里巴巴为代表，很多平台，不管国内还是国际中国企业领军的力量越来越凸显，然而中国改革的进程仍然比较缓慢。

总体而言，在过去一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风险放缓了，原因之一就是增长的动力受到下行的压力。国家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有所减少，过去两年下降了 20% 左右。中国有一些基础设施已经投入过多，所以这个减少也是合理的。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新的增长推动力是消费，消费也确实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速不足以抵消投资的减少。

另外，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支出也在减缓，这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私营部门、民营企业会对投资保持这种谨慎的态度呢？是因为很多私营部门的决策者们不确定国家的经济规划、国家资本的配置与民营部门的投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未来这个关系的定位如何。所以很多私营部门，包括一些非常雄心勃勃的、非常果断的民营企业现在普遍保持比较谨慎的观望态度，不再在国内外做积极的投资。

当然中美贸易摩擦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的市场，尤其是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国都将面临一些挑战和机遇。中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都在观望，中国的经济模式在市场当中会扮演什么角色。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继续国际化步伐。中国的创新绝大部分是来自民营企业，未来五年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 打造有创造力的政策环境 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 珍妮·希普利 /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很多人都重视货币、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中国受益良多，新西兰也从中受益匪浅。我认为，改革开放的势能，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持续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声音质疑开放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国际资本市场的历史，金融危机之后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在最理想的地位吗？还是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地位？我估计是后者。全球经济还面临很多坎坷，其中有贸易战，有零利率，通胀基本上没有任何贡献，未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应该怎么走？

我们都很期待 2020 年 1 月 1 日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部分人的期望很高，中国总理呼吁要有耐心、有信心。我特别希望这部新的法律会达到我们的期望，也希望它会巩固外国人对中国的信心。

我认为改革不是由发表的演讲或发表的文件决定成败，而是需要落实，需要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很多国家、很多经济体，会付出很多时间和努力去学习和新标准和新规则。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也要了解中国对其的期望和要求。

有些人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没有达到世贸组织那个层面，但我认为 RCEP 是很有意义的协议，它惠及人口最多、经济最快的经济体，希望这些经济体之间加强协调和合作，这不但将有助于 RCEP 国家发展，也有助于世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RCEP 也配合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金融论坛 (IFF) 这个平台上，我们会考虑这些区域自贸协议需要哪些配套机制，比如有世界银行、亚投行等，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商业银行能够参与进来，不仅贸易有更多的便利，也要有更多的融资和投资的便利，引领民营和私营的商业银行进入到 RCEP 和该地区去。要想让中国过去 20 余年的快速发展延伸到未来几十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落实、执行 RCEP 协议。

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但这种情况不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毫无疑问，中国能够找到保持经济增长的路径并为未来长期增长奠定基础。比如积极发展金融科技和 5G，5G 不仅惠及大城市，也会惠及农村。中国一方面帮助乡村脱贫，另一方面为未来的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像 20 多年前，中国用村村通路、村村通电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大量的长期好处，5G 的普及也会增强中国的竞争力。5G 技术已势不可当，我们不能让保护主义阻碍这些技术的研发和部署，因为它会给我们未来 20 年的增长提供动力和燃料。

对于新西兰来说，养老服务是我们很看好的一个领域，最近这个领域向外资企业开放。1993 年我任新西兰卫生部长，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西兰养老部门非常小、非常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已大大提高。现在顾客有更多的选择，没有人会被落在进步的身后。中国的人口规模要比新西兰大得多，如果在养老服务方面能够开放竞争的话，将会有更多合作、吸引更多投资、引入更多服务技术，从而使这个领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也一定会从中受益。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多数经济体，在 1980 年至 1990 年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尽管各个经济体遇到的问题有所区别，我们仍然希望对总



的改革框架加以注意。我并不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知道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与时俱进，能够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自己，成功的几率往往比较高。

如果政府能够学习私企的创新和变革，能够学习创新的举措和资本配置的话，会有很大好处。不知道中国会不会这样，需要拭目以待。新西兰以及很多开放的经济体，在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方面都非常慎重。新西兰以前也是高债务国家，现在已经降到 GDP 的 25%，现在谨慎支出，每一年预算都有盈余，两党都是这个态度。当然，这样一种财政平衡，要花很多年才能达成，也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加有创造力的公共政策环境。此前，我们没有现在这样的开放，所以那时候的选择也少得多。

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经济增长放缓的阶段，中国现在可能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资本市场是循序渐进发展的过程。但是，能够看到一个总的方向，中国很善于进行这方面的规划，并且可以按部就班执行这些规划，这会使人们的信心增强，而不是减弱。在有信心的环境之下，经济体会更加容易繁荣。

#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的 机遇和挑战并存

■ 马丁·谢克 / 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CEO



马丁·谢克

我来自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这个机构当中有中介机构、有一级市场，也有二级市场投资者，还有签发行。在整个债务市场，各个领域的机构都会参与到协会中。今天主要讲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CIBM) 开放的重要性。

**第一个观点，关于平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成熟的市场，通常来说资本市场的融资与银行的融资相比是相对较低的，目前仍然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但美国例外，美国可以说是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最为成熟的国家，其 70% 的产业都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来支持的，在欧洲这个比例大概是 30%。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更好的配置，这个观点我们是非常支持的。这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政策方向，在许多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比如在欧盟，资本市场联合政策，希望提升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比率。我们如果希望看到跨境资本的流动，要去促进这种资本的流动，这个政策的方向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二个观点，我完全赞同开放并不可能走一条直**

**线，开放过程中有一些徘徊、有一些弯路、有一些改革的方案被其他方案取代等等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认为，事实上中国在前行的方向上一直是非常坚定的，这一点在外国人看来是非常感叹的，它的方向始终是非常坚定的。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领导讲话，其中有一个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在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当时习近平主席讲到，我们不应该抛弃全球化，全球化仍然有多边机制之下的意义。

为什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一直跟中国基础设施提供商进行合作？为什么我们过去一直跟中国主要银行进行很深的合作，帮助推进其国际化进程呢？因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已经是市场上第二大规模的债券市场，它的规模太大了。在这个市场中，外资引入比例低于 3%，我们看到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我们知道，要想发展潜力必须允许更多的国际投资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银行间的债券市场。最近看到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比如有一些配额取消了等等。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改变起来也是非常快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发现投资基数比较低，这个市场此前完全没有开放给外资，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件事。现在这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仍然需要更好地了解，需要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才能进入这个市场当中。

从投资角度来看，同时也要注意进入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签发行如何利用中国市场存在的资金，他们主要是通过熊猫债的途径进入中国。发债行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确定性，需要很大的清晰度，他们不希望政策本身是不透明的，也不希望规则、时间线是不确定的。他们希望所有的这些需要做的事情，都是非常清晰地排列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做什么工作就能进入这个市场。

另外，发债行的会员中有很多全世界非常大的投资机构，也有小规模的投资行。他们的结构非常合理，能



分析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如何更好理解这个市场中的特色，他们的员工很多都会讲普通话等等。他们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我们想让这种参与变成主流的话，必须使这个投资环境变得更加便利。在每个层次都有便利化的举措，使海外的投资者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够理解如何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市场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他们前期的筹备应该变得更加方便和简单，这是现在中国市场吸引外资需要重视的一部分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债券通、QFII、RQFII 机制。但是我们发现，进入这个市场当中将面对什么情况，这对很多投资者来说是一团迷雾，不能清晰地看到进入市场之后必要的步骤。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他们并不知道进入中国之后这个市场机制是怎样的？有多少是政府债券？有多少是政策性银行发的债？在信贷市场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信用评级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国际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但这对于我们全球的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破产、重组方面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当然这也不是仅仅中国存在的问题，欧洲也是一样的。

在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其法律法规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破产法并没有能够统一，这在统一的投资市场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流动性有些什么样的动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有很多不同方式可以做这些工作。举例来说，可以有更多的路演，

可以开更多的会议，包括中国证券业年会以及其他针对投资者的大型会议。比如在美国、欧洲的投资者中心，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介绍，让人们更好地熟悉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

从发债行角度出发，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对监管体制有更好的了解，包括对熊猫债的监管体制的了解，我们现在听到的反馈一直是它的范围还不够广。另外政府也需要澄清更多信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里面的机制，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发债行进入中国债券市场中。

## 提升中国证券业 对外开放水平

■ 汪民生 / 瑞信方正证券总经理



汪民生

讲到中国改革开放面对的机会和问题，作为证券从业者，作为一个合资证券公司的总经理，我主要谈谈在中国证券业开放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中国证券业的开放，应该说十二三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瑞银集团 (UBS)，已经在中国设立合资证券公司。但是截至 2018 年底，所有证券公司的外方持股比例只有 33%，其他都是中方控股的，中方控股比例是比较大的。这个局面到 2019 年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现在第一家持股比例 51% 的外资证券公司 UBS 已经获得了批准，另外还有两家合资的证券公司拿到了新设的批文，大摩和瑞信都在申请 51% 的过程中。尤其是 2019 年的 7 月 20 日，国务院金融委发布新的 11 条金融开放规定，把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的时间提前到了 2020 年 12 月 1 日。也就是说，从 2020 年的 12 月 1 日开始，中国的证券业应该说就完全开放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提到一个原则，就是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从所有这些全球大行积极申请牌照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市场对国际资本是有非常大吸引力的。我们一直在讲增长的故事，上市公司在与投资人讲增长或未来业绩增长的时候，基本上讲增长就得讲亚洲，讲亚洲必须讲

中国，如果这些大行不进入中国的话，基本上投资故事都没法讲了，基本是到了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积极踊跃的，基本上所有的大行都会进来。

前些年合资证券公司进来之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发展速度并不尽如人意，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刚才提到的股比本身有限制，股比的限制造成了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二是牌照的限制，外资投行刚进来的时候只给一两个牌照，比如说只能做投行，很多其他的业务都做不了，现在很多的业务都会放开。

我觉得外资投行进来之后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比如说跨境业务、海外上市、全球结构化融资，还有全球的资产配置等等这些方面，肯定是有国内券商比不了的优势。在管理经验上，在新产品的创设这些方面，肯定都有他们的优势。这些优势进来之后，对中国整个证券业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中国证券业的风控和合规体系，很多都是跟合资证券公司学的，证监会制定的很多政策规定都是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这些对中国证券业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证券业本身的集中度也越来越高，国内内资证券公司的集中度已经非常高了。现在整个证券行业有 131 家证券公司，前十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可能占到 60%~70% 的规模。我认为，未来中国证券业的基本格局大概就是国内的前 20 家证券公司以及合资、外资投行的前十家左右的证券公司，会让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重新洗牌。所以，从机构角度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从资本本身角度来说，A 股的结构主要是以内资为主，以散户为主。而现在国际成熟的市场上，大概有 15% 左右的外资，但中国现在还不到 5%，债券的交易中外资仅占 3% 左右，所以这些外资投行的进入对中国资本还是有非常大的正面作用。

总而言之，外资的开放对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都有非常大的正面作用。

##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势不可挡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中最早被选中的外国人。我在巴西政府担任过不同职务，曾经担任贸易部长，负责过巴西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国改革中出现过很多问题和挑战，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克服所有这些挑战，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上能够设计、落实并调整、修正改革政策措施的少数国家之一。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做到，我认为至少拉美或者巴西做不到。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行经济改革，毫无疑问困难重重，但是中国取得了丰硕的改革成果，比如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改革不仅是在大都市，在小城镇甚至在农村，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政府曾邀请我走访中国贫困地区，我也曾去过巴西贫困的地方，中国的转变、中国的脱贫工程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2017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我听到习近平主席说：“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中国有信心和决心进行开放，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另外一个领袖论坛上，习主席提出，中国要加强创新。巴西经济一直

以来主要是靠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推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靠山”，巴西没有投入力量提升创新能力，导致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南美现在社会问题很大，但近期没有解决的措施。

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也有不少新举措，比如新的外商投资法的制定，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新的《土地管理法》，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包括粮食安全，而且根据新的《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使用土地也适用该法。还有金融部门的开放，解除了金融投资领域的很多限制；中国在专利法的改革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设立了杭州互联网法院，这是中国第一家集中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法院。这些都是非常前沿的法治改革。

我的国家巴西，20 年来一直想推进专利法改革。政府推动，法院也提出了修订意见，但一直未能取得进展。现在巴西还有约 7000 个专利没有审批，一直在等待改革。中国的改革实践向我们证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可以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它们之间不是零和游戏。这是一个重要发展策略，因为没有私营资本的加入，不可能真正实现创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势不可挡，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开放，全世界应该予以理解和尊重，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开放的节奏。

# 开放人民币市场 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 周诚君 /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



周诚君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于 2019 年 5 月份成立，它承袭了原来所有货币政策、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货币合作相关的职责。宏观审慎管理局一方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的政策框架；另一方面与社会共同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所有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

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步开放，依然有需要进一步推进、深化、完善、优化的领域，要承认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不足。

我们确实采取了很多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的举措。但是，从一个国际投资者角度来说，他进入这个市场，来到这个国家，确实还面临着很多困难。

第一，一些国际投资者不认识中文。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法律法规、透明度、预期等等，要承认我们跟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多的不足。

人民币加入 SDR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最基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是通过加入 SDR，推动中国金融、金融市场、人民币跟国际标准的接轨，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更好地让国际投资者，

让每一个市场上的参与者接受中国。

关于人民币汇率，我们的目标是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为什么要保持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是全世界第一大商品和货物贸易进出口国家，是全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出现大的超调，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接受，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要非常坚定。

第二，新一轮改革开放和机会。从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基本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什么呢？就是中美贸易争端问题。

下一步在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会考虑应对可能产生的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最近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可以说是大规模建成制的对外产业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的产业因为成本提高，竞争力不再，需要向周边一些国家，如向越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转移。

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过程。这也跟中国近年来产业升级、优化结构息息相关，只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要客观理性对待它。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它可能会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但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必须有的一个过程，它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这就是重新寻找竞争优势，寻找比较优势的过程。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如何来防止其中的风险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货币，日元和德国马克，从 1985 年到 1999 年，两种货币分别升值了多少呢？基本上都是三倍。

从上升的幅度来看，德国马克与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幅度几乎是一样的，但它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今天德国仍然是贸易盈余最多的国家，德国仍然是在产业领域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但是日本完全不一样。

中国目前也面临这个挑战，产业在对外转移。随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相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不会贬值，哪怕暂时有贬值的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是一个升值货币。这从国债收益率可以得到证明。

目前，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 1.77%，日本、德国、法国的十年期国债回报率基本是在零附近，德国是负的，最近偶尔在零上下波动。中国呢？最新的十年期国债回报率是 3.197%，这意味着十年期的无风险回报，且回报率是美国的近两倍。伴随着中国产业的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世界的投资者可以进入中国的市场，随着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跟中国人一道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资产回报率比较高的好处，故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一定是升值的。

在日本和德国的比较当中，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向德国人学习。为什么在德国马克跟日本的日元同样升值那么多的情况下，德国仍然能保持竞争力呢？有很多很多因素，宏观的、微观的，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德国是当时欧共体国家最大的投资贸易伙伴，相当多的欧洲国家货币盯的不是美元，而是德国马克。换句话说，当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了三倍的时候，几乎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也跟着升值了。但日元不一样，日元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也就是说德国马克在升值过程当中，它产生的成本和产生的外部冲击，不仅有德国人在承担，而且是所有的欧共体国家在与德国一起承担。

这给中国什么样的启发呢？所有的跟中国发生最密切投资贸易往来的国家，可以一道共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我们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最大的在白俄罗斯，92 平方公里的中白工业园区。如果我们到周边国家去看一看，十几平方公里的中国产业园区非常多，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办的，不是国有企业办的。但是 90% 以上的对外投资以及相关的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能用本币来结算，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第一，用了本币结算，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和避免用第三方货币导致的货币错配、汇兑成本、汇率风险。第二，中国的金融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债券市场 96 万亿，跟中国的 GDP 规模差不多，境外投资者占 2.3%。我们的股票市场 55 万亿，境外投资者持有 1.77 万亿，占的比例为 3.2%。全球外汇储备 11.6 万亿美元，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 2189 亿，占的比例只有 1.97%。如果这三个比例能够达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一般水平，我们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让境外投资者持有的比例达到 10%~15%，所有

IMF 成员国持有的官方储备里面有跟人民币在 SDR 当中份额一样的比例即 10.92%，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

如果中国对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国家在贸易和投资当中，用本币来结算，让对方国家持有更多的人民币，中国的金融市场将非常非常大。在对方国家的市场主体持有更多的人民币以后，中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境外投资者可以持有中国高回报的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开放的好处，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头寸、人民币资产会越来越多。

当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境外投资者对这部分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进行流动性管理和外汇交易对冲，就会在中国在岸产生广泛的人民币交易需求，就会推动产生发展有深度的、有市场需求的、交易活跃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这个市场一定是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同时发展。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这个市场最后的结果将是离岸市场大于在岸市场。

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越来越发达，特别是在周边国家发展起来以后，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是一个反映了市场供求的、均衡合理的公允价格，是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共同预期、共同参与交易形成的，这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这就是周边国家各种货币跟人民币的汇率。

中国几乎是所有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最大的投资贸易和伙伴，我们的货币“捆绑”在一起，对于稳定投资者的预期，对于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是有好处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地去共同承担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的不确定性。

# 法治保障有益于 巩固改革开放成果

■ 张毅 / 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委会主席



张毅

中国改革开放相关的法治问题，与我的专业有关，也与国家大的方向要求有关，这就是法治中国、依法治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外商、外国投资者能够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确定的，消除他们的顾虑，这个确定性的保障就来自法律的保障。这两年世界银行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评级变成很重要的问题。我从 1996 年开始接到世界银行的问卷，世界银行发了很多问卷，对营商环境有很多评估指标。

过去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排名顺序与中国大国地位明显不相称，近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才有所上升。2017 年是 70 多名，2018 年第 46 名，2019 年上升到第 31 名。怎样通过法治的保障，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从而使得对外开放的成果能够固化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国外有一句话，“所有魔鬼都隐藏在细节里面”。所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也都要通过法律细则的制定，通过法律的落实，最后变成固化的结果，这很重要。例如，世界银行问卷涉及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一般人都不会关注。问卷提到，在非上市企业里面，有没有根本性的机制能够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回答一般都是没有。为什

么呢？大家都觉得这是可以通过合同方式解决的问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里讲，如果双方对于这种问题有争议的话，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自己达成协议，且这个一致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都是可以认可的。

世界银行不认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它认为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最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要不要做一个司法解释？如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产生争议，要有一个强制的调解程序。但是，强制调解程序也没有用，如果调解不出来，小股东还是没保护。做小股东有时比较痛苦，信息知情权可不可以有？投票权有没有？中国公司法规定，一般的情况下股东过半数决定重大事件，特殊情况下需 2/3 股东决定。如果你的股票比较少的话，就没有投票决定权，民间讲法叫“出钱陪太子读书”。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否引入一个机制，发生这种情况，经过适当的评估机制，大股东必须把小股东股份买走。如果说有这个确定性机制的话，世界银行给你 1 分，没有的话是 0 分。这 1 分多重要？比如，在世行问卷里，中国小股东保护从 2018 年的 48.33 分提高到现在的 72 分。每一分都很重要，1 分就可能决定整个小股东保护板块的排名，小股东保护的排名又决定营商环境的排名。这只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证明营商环境的改善在整个对外开放中多么重要。

制定法律法规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落实。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国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们比较困惑的是什么呢？是有太多的部门规章。部门规章以外，还可能有窗口指导意见。窗口指导意见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固化下来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解释权。这个解释权对于确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近，上海市政府发布市级政府部门制定部门规章指引，规定哪些政府可以制定部门规章，要求部门规章必须统一编号、统一发布、统一成文而且可查询。这就是法律的确定性、法律的透明度。



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法治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法治化就在下大力气落实已经制定的法规之中。法治保障的力度以及在落实的过程中的确定性，其实是固化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非常重要的。

近两年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应对的政策工具箱里面有三大工具：财政工具、货币工具、监管政策。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可以宽松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千万不能在监管政策上也宽松。这个时候是不是能放松管理？降低一点标准？不行。因为这对营商环境、对确定性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认为，在经济面临下滑的形势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宽松，但监管政策应该始终保持一定的水平，这样人们对于确定性就有把握。

# 加强中东与中国经贸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 土耳其前副总理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家签订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在中东地区生活着 100 多万中国人民，随着双方贸易文化往来不断加大，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地增加。中国人遍布埃及、伊朗、伊拉克等国家。

此外，中国也是中东国家最大的原油输入国。中国每年石油进口额约为 462 亿吨，其中一半的数字来自中东国家，这些原油贸易进口量占比 80% 以上。还有一些中东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方面是有更多更深层次的要求，比如说伊朗、土耳其，他们强烈地表示希望能够扩大本币相互结算，中东国家表示出更进一步的金融合作需求。

中东各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差异较大，中东地区各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差异性导致难以步调统一地推进区域金融合作。石油生产国和石油稀缺国之间的要求不同，所以我们要考虑通过多种渠道构建金融体系及金融合作路径。

首先，中国的崛起已经让中国的人民币变成储备货币的一种选择，大约占 IMF 一揽子货币储备当中的 10.9%，这也说明人民币成为继美元之后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很多中东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希望能够持有人民币储备的。要发展多层面的金融合作，促进金融的稳定性，中国在全球已经建立 36 个双方结算系统，各国合作伙伴能够通过这种体系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其次，未来我们将面临长期的去美元化，全球趋势就是去美元化和去全球化。从长远来说，以区块链为主的支付体系很有可能会推动一个多层体系的发展，中国和中东国家可以通过本地的货币和人民币来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很多中东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的方式，他们尝试扩大本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的使用。

金砖五国开始打造新的支付体系来调整以美元为主的 SWIFT 体系。近期俄罗斯表示，过去几年，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大幅下滑，未来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当中可能会再上升 3% 到 4%。金砖国家同时也在商讨新的加密货币。所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

中国与中东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与金融合作。近年来，随着双方经贸合作步伐不断加快，双方在金融合作方面有了良好的基础，双方不断地推动合作向前发展，但中国和中东地区开展金融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相比欧洲，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更加包容和开放的，中国并不把中东看成是危险的地区，相反中国认为这个地区是可以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的地区，双方之间需要金融合作。

首先，中国和中东地区在贸易结构上互补，中国已成为中东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数据显示，中国是 11 个中东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这个区域与 20 多个国家开展贸易来往。在 2018 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 2000 多亿美元，与伊朗等地区的合作金额大约为 720 亿美元。如果把北非也算上的话，这个数字会更大。

其次，中国已经是中东国家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同时也是项目投资的主要来源国。2016 年，中国已经成为中东最大的 FDI 来源国。2017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签署了 330 亿美元的项目，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持续升温。在 2019 年的时候，中国与中东 21 个国

## IFF 圆桌会议 (3)

加强中东与中国经贸合作，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91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土耳其前副总理	
稳步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93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中国葛洲坝集团进一步加强对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94
林晓丹，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95
阿卜杜勒·贾巴尔·沙耶赫，Alsayegh 集团主席、Noor 资本主席	
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跨境支付业务中的作用	96
郝鹏宇，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副总经理	
推动中国与阿联酋石油产业合作	98
拉希德·赛义夫·苏瓦迪，Horizon Energy, L.L.C. 主席	
未来美国石油需求对中国及中东地区的影响	99
刘朝全，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开创中国与埃及合作新局面	101
安雅山，IFF 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埃及规划部前常务副部长、ENInvestment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算在未来有非常大的潜力。在一些贸易赤字比较严重的国家，我们很难去保证这些货币的稳定性。

最后，中国和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需要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中国证券市场也是我们另外的合作点，中国发布的产品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提高贸易便利度。

我想这对于存在贸易赤字的国家来说都是福音。任何一种合作的成功，尤其是金融合作的成功，都是福音。中东国家和中国的合作很大程度上依靠相互之间的政策对话，也许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对话机制。国际货币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将走向多货币的格局，其中人民币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中国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金融市场建设，要更加开放，进一步提高资本化。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做出强有力的承诺，金融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没有一个中东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威胁，双方应重视发展战略对接、促进金融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推动中东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和中东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目前的目的是要抵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应对挑战中，中国不断地成长为一个新的经济力量，这对世界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中东国家也需要中国，需要推进多样化。很多国际机构在预测未来的报告中指出，未来石油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而中东地区在过去 25 年以来一直是依靠石油。

所以，中国与中东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中东有很多的机会需要中国的投资以及融资，当然中国的投资也能促进自身的发展。未来我们要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构建并不断深化互利共赢的关系。

## 稳步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 IFF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行长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中国是很久之前就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合作交往的国家之一。当时阿拉伯的航海人首先来到印度洋，然后到达了印尼，之后到达了东亚来到了中国。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穆罕默德在他的统治期间派遣了海军出征东亚。可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交流和访问活动延续至今，长期友好的交往为中阿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8 年，习近平主席曾到阿联酋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访问。2019 年年初的时候，阿联酋副总理以及其他政府领导和很多商业领袖，也与中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2019 年的夏天，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和阿方企业家访问中国，双方进行了友好对话并且在经贸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协议。2010 年中国出口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 800 亿，阿联酋占 44%，并且中国的进口额达到了 940 亿，近一半都是 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2007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额是 120 亿。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口额是 1140 亿，41% 来自于其他国

家。这些数据显示，中阿双方始终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积极开展互利合作，经贸保持着良好势头。

近年来，中阿经贸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双方之间举办了非常多的展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开始在阿拉伯国家开设分支机构进行投资。此外，现在阿拉伯很多个国家都有中国社区，很多的中国人选择定居在阿拉伯国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从 2004 年的 367 亿美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2512 亿美元，10 年间增长了近 9 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推动双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对外贸易、支付结算等领域签订了多项协议，阿联酋的 250 万中国华侨，也体现了阿联酋和中国的直接经济往来。中阿双方应以现有成果为基础，继续稳步推进双方合作。在未来，阿联酋将作为中国通往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桥梁，我们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从短期或中期来看，阿中关系将呈现更加积极的发展势头。我觉得阿拉伯世界的地理环境给了我们一个优势，我们会成为

**在未来，阿联酋将作为中国通往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桥梁，我们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一个重要的接口，而且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和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

## 中国葛洲坝集团进一步加强 对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林晓丹 / 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晓丹

我结合葛洲坝集团在中东市场基础设施业务的开展情况，围绕助力中东和中国合作实现新的发展谈几点看法。

中国葛洲坝集团在 1970 年承建了著名的葛洲坝水利枢纽，集团因为这个项目而得名，后来又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承包商而闻名于世。经过 50 年发展，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集建筑与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我们的海外业务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

集团在海外大概有 99 个分支机构，覆盖了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目前海外工程承包签约累计总额大约是 1000 亿美元。我们的海外投资业务启动相对较晚，到目前 2019 年大概只有 3 年时间，正在实施的有 50 亿美元的项目。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中东市场看作集团的重要市场之一。目前，我们在中东地区有 7 个分支机构，覆盖了 13 个国家，前期完工的和在建的项目大概有 10 个，总金额是 30 亿美元。近期公司在中东地区又承接了两个大型项目，一个是阿联酋的海水淡化项目，日处理海水 68 万吨，这个项目也是目前国际市场上第五大的海水淡化项目。我们还承接了沙特 1000MW 的光伏项目。

最近新签的四个项目加起来大概有 21 亿美元，但工

程承包在公司 1000 亿美元的签约总额中只占到 1/20。我们的海外投资部虽然对中东地区有浓厚的兴趣，但目前还没有项目落地。我们认为不管是工程承包，还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对中东市场都充满了期望，希望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东地区国家众多，大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基础设施水平差异较大。有的国家相对比较发达和完善，有的国家还有很大的需求和空间。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项目建设规模比较大，投资回收期比较长，回报率又比较低。这样的特点抑制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中东项目参与的积极性。

阿拉伯有句谚语，独行快，众行远，这句话也曾被习近平主席引用。如果中东项目可以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联合投标，用共同投融资、总分包等模式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则可多方共赢。

葛洲坝集团实施的多个项目中都有欧美的技术机构、技术企业、咨询企业参与。“语言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我们集团将继续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与中外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持续加大在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市场的开发力度，推动中国与中东合作不断地开花结果。

## 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 阿卜杜勒·贾巴尔·沙耶赫 / Alsayegh集团主席、Noor资本主席



阿卜杜勒·贾巴尔·沙耶赫

2019 年 7 月，我很荣幸出席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阿联酋建交 35 周年的招待会。会议主题是加强阿联酋与中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希望不断推进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强包括金融合作在内的全面合作，此次会议为两国双边合作建立了良好基础。阿联酋作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的枢纽，亟需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双边政治和经贸合作关系。

阿联酋是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国，2017 年石油出口额大约是 500 亿美元，其中 8.5% 是机械油，阿联酋的目标是 2030 年石油出口额达到 2000 亿美元。

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周围有 30 亿的居民，分别属于亚欧、中东国家和非洲地区，是阿联酋经济发展的广阔市场。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机构）和政府只要采纳新的合作框架，尤其是建立合资企业，阿联酋都可以在制造业、航运、工业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其加强合作。

中阿友好关系得到了我们陛下的大力支持，并写入了阿联酋（UAE）宪章当中，我们还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现在阿联酋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专业课程，这样在

未来 15 年，阿联酋很多大学生都能够流利地掌握英语和汉语，这也显示出了中国和阿联酋之间深厚的友谊。

中阿合作比较多的领域是石油产业，石油资源造福中东地区，但是我们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鼓励中国物流公司来阿联酋开设分部和办事处，比如说欢迎阿里巴巴的物流公司或其他的物流公司来开展业务。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贸易往来对象基本上遍及世界一半人口，所以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阿联酋有 7 个国际机场，与中东、欧洲、非洲、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有非常密切的交通往来。阿布贾到伦敦每天直飞超过 25 次，从早上 8 点到凌晨三四点，机场一直都有飞机起降。这种交通的便利性吸引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很多投资者。

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其对华出口占中东地区的 27%。中国进口的很多原油都来自阿联酋。阿联酋与中国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都有合作，中国目前已成为阿联酋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阿联酋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致力于在各个领域深化同中国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衷心希望中国的朋友能够来阿联酋，加强双方的友谊与合作。阿联酋与中国的合作不仅能够造福两国，也必将为世界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 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 在跨境支付业务中的作用

■ 郝鹏宇 /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副总经理



郝鹏宇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是阿联酋地区的人民币业务结算行。我针对双边支付结算体系的联通和建立，提出一些建议。中阿双边支付体系建立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对其创建动力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支付是产生于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包括资金转移而形成的一种资金的流动支付。双边支付体系的建立最终目的就是在两国贸易投资往来过程当中，进行双边本币的货币支付，而不是用第三国的货币去进行结算。

从中国的政策背景来看，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和周边国家发展边贸地区贸易，使用双边的本币或者人民币进行结算，允许商业银行互设本币账户。2009 年以后，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试点工作，人民币不但在边贸结算中进行使用，对所有的一般贸易，包括投资，从政策来讲也是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的。

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也是允许银行之间互开代理账户，通过两国在海关口岸的备案，可以允许两国货币进行现钞的调运。从发展历史来看，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和周边 9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的结算协定，和 38 个国家的央行和货币监管当局签订了双边本地贷款协议，总金额达到 3.67 万亿人民币。

从阿联酋的监管政策来看，阿联酋本地是允许任何币种进行跨境支付的，即不限制币种的支付，包括人民币的使用，从政策来讲是允许的。双边支付结算体系其实最终的源头，是来自于双边的贸易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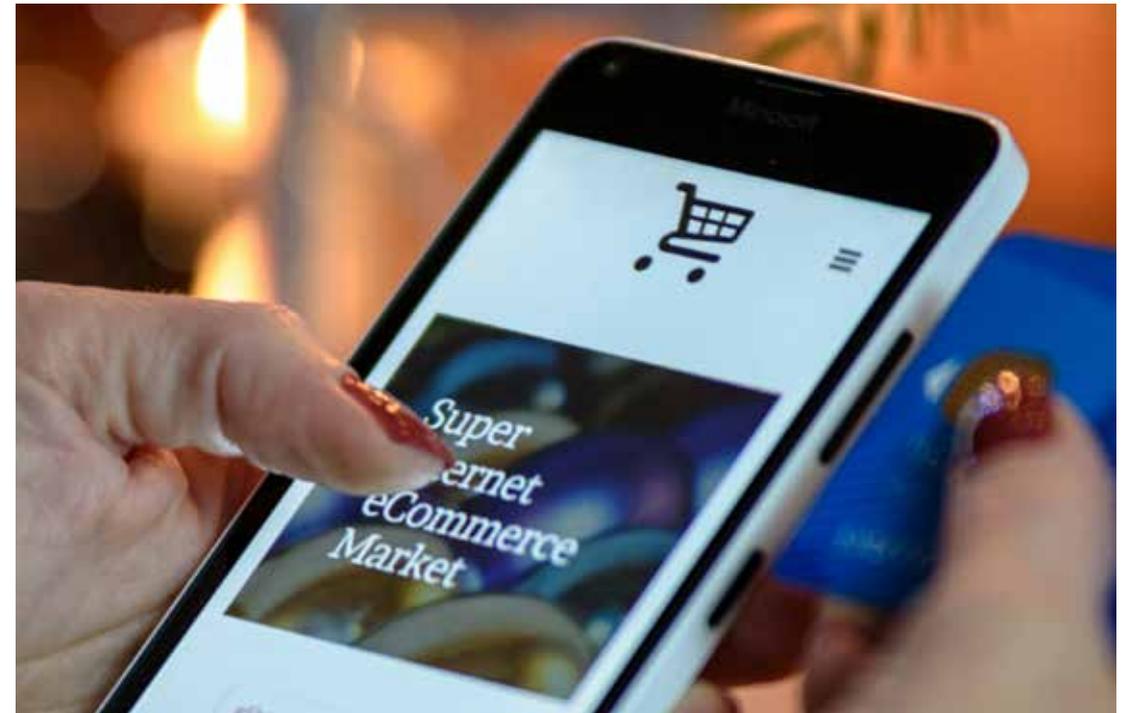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和阿联酋的经贸往来发展迅速。2018 年中国和阿联酋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达到了 243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加了 28%。在阿联酋签订的新承包合同是 35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9%。在投资领域方面，中国对阿联酋国家的投资达到了 12 亿美元。这些数据是支撑双边支付体系的基础和动力。

中国和阿联酋之间的交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两国领导人互访之后，我们看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成为阿联酋最好的贸易合作伙伴，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459.2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2.1%，这是 2018 年的数据。2019 年上半年，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22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阿联酋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阿联酋整体进出口总额的近 8%，从投资来看，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我们认为双边支付结算存在着坚实的贸易往来基础。

第二方面就是双边支付体系的优势在哪里？首先主要是提高结算的便利性。便利性就是通过央行或者商业银行之间的账户往来能够直接进行资金的往来清算，可以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其次可以规避第三方汇率的风险。双边的货币直接支付就没有因第三方货币兑换造成的汇率波动而产生影响的风险，这是它的优势。

双边支付体系的联通和建立究竟以什么为基础？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考虑，要以两国目前现有的支付体系为基础。如果是人民币支付体系的话，中国境内有自己的系统，以及银行内部和金融市场的清算系统，还有支持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支付系统，这是中国人民银行 2015 年推出的系统。

2018 年 5 月二期系统投入使用，增加了夜场跨境收付模式，人民币清算可以达到 5 × 24 小时 +4 的运营，覆盖了六大洲。通过直参行、间参行的形式支持人民币



跨境的支付。从阿联酋本币支付系统看，阿联酋央行也有自身本币的清算系统，是通过商业银行开在央行的账户进行本币的支付。无论两国的货币怎么样流动，最终要回到母国的清算系统当中去，所以两国之间的支付体系联通是源于自身的支付体系基础上。

关于两国双边的支付体系建立过程，从央行层面来看，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货币体系的自由联通。但是中东海湾六国推出区域内的清算系统，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等六国的央行建立了清算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各国的商业银行通过直接联通进行区域性的清算。

央行层面建立支付体系是很好的设想，系统也正在开发当中。央行在支付体系的建立达到联通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商业银行层面功能上的实践。

以农业银行迪拜清算行为例，我们是在 2017 年 5 月 10 日在迪拜成立的，拥有阿联酋中央银行颁发的银行牌照和中国人民银行授予的人民币清算行的功能。在当地，也是人民币的存款、交易、清算、贸易、融资产品全覆盖的。从目前来看，如果利用商业银行的功能实现两国之间货币的清算，从功能上是可以达到的。

从迪拜清算行来看，我们和阿联酋之间首先存在一个挂牌机制的问题，两国汇率的兑换机制问题。从中国看，我们对中东地区的阿联酋迪拉姆、土耳其里拉

等是有汇率牌照的。对阿联酋央行来讲，从汇率方面解决了两国之间货币兑换问题。

其次是关于人民币流动性的问题。如果使用人民币，必须在这个市场当中给人民币提供流动性。从商业银行来讲，是可以通过阿联酋地区的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去提供支持，也可以通过汇兑去支持当地企业的人民币需求，从流动性来讲是可以达到的。

再次是关于货币的清算，通过商业银行这个体系是可以连接阿联酋中央银行本地的币种清算体系，同时又连接境内的中国银行推出的系统，能够达到双币种的清算，功能上是可以实现的。

最后，因为清算行有自己功能的优势，可以进入中国境内银行兼外汇市场，进入拆借市场以及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入这三大市场的同时，也是以会员身份接入到系统当中去。从迪拜分行清算的报文格式来讲，是通过 SWIFT 的报文直接换成这个格式进到银行间人民币清算系统去进行清算的，从系统来讲也是能够达到直通处理的模式。

所以，我认为双边的支付体系建立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在央行层面需要政策机制的支持，包括两国签署的货币协议和货币使用安排，但是在发展的初期，应该可以发挥商业银行代理账户的模式去实现功能上的支付体系联通。

## 推动中国与阿联酋 石油产业合作

■ 拉希德·赛义夫·苏瓦迪 / Horizon Energy, L.L.C. 主席



拉希德·赛义夫·苏瓦迪

阿联酋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的窗口。中国和阿联酋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目前，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阿联酋是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中国最有吸引力的贸易

伙伴之一。近些年来，作为中国出口中东北非的门户，在阿联酋境内已经约有 4000 家中国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且有超过 30 万中国人在此工作生活。另外，有多家中国商业银行在阿联酋建立了分支机构。现在每周往返阿联酋和中国的航线有 100 多条。2019 年 7 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以及商贸团访问北京，达成了很多共识并签署相关协议。

阿联酋油气资源丰富，中阿双方在原油领域有广大合作空间。原油是阿联酋重要的经济支柱，目前阿联酋探明的原油总储量达到 1050 亿桶。因此，油气合作是中阿两国合作的基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商业合作机会。

阿联酋在石油天然气方面的产业链较为完善，例如新的钻井和维修技术以及运输、存储等服务。在阿联酋油气生产链中分布着很多行业，每个行业里又有很多企业，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企业。除油气领域外，中国和阿联酋在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合作机会，例如航空航天、制造业、新能源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和国防建设领域。

因为阿联酋位于欧亚非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为自身和邻国（比如利比亚、南苏丹等）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都带来很多机遇。阿联酋与邻国（例如利比亚）有很多共同合作项目，但内战、政局动荡影响了合作，在动荡时期，很多油田、设备被废弃，很多生产线被迫终止，我相信在未来 1-2 年这种状况会很快结束。动荡结束，对于技术和金融合作都是机遇，可以共同合作打造项目。利比亚政府可能不会直接投资于此，但是会投资到基础设施，造福于自己的民众。

**阿联酋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进入阿拉伯国家市场的窗口。中国和阿联酋已经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目前，阿联酋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我们希望和鼓励中国企业与阿联酋公司合作，因为合作不但能够继续深化双方的友谊，不断增强互信，而且造福中国和阿联酋的同时也会惠及阿联酋周边国家。

## 未来美国石油需求 对中国及中东地区的影响

■ 刘朝全 /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刘朝全

与中国开展油气合作的国家，中东有 15 个国家，其中包括非洲的埃及，在这 15 个中东国家里面，6 个是欧佩克的重要成员国，包括沙特、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这六个欧佩克成员国全部集中在波斯湾地区，另外非欧佩克成员里面还有埃及、阿曼、叙利亚、巴林、也门生产原油，实际上以色列也开始生产天然气。

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基本上不生产油气的只剩下三个比较小的国家：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其他 12 个中东国家都生产油气。中东的油气资源非常丰富，因此中东在世界能源市场尤其是在石油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方面，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为基础的石油美元体系。作为目前被世界各国在国际石油贸易中所接受的货币体系，在美元黄金体系崩塌之后支撑了石油美元，构成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方面，中国与中东的油气合作的发展现状。中国在中东的合作有很多种方式，有中国与中东资源国政府的直接合作，包括和资源国一起成立公司，也有中国公司和国际公司一起在中东国家联合开发石油。具体的方式比如像投资型的，其中，第一是伊拉克，第二是阿

联酋，在伊朗、阿曼和叙利亚也都有投资型的公司。

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的油气，目前基本上不对其它国家公司开放，所以中国公司无法进入。除投资类型以外，对于中国没有进入合作的国家，我们是以提供服务为主，比如说提供钻井，还有地面建设、场所管道建设等方式，或者通过提供工程、技术、服务之类与中东国家合作。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贸易型。2018 年中国进口原油 4.3 亿吨，其中接近一半是从中东国家进口的，整个的贸易额接近 1000 亿美元。

第三方面，中国在中东的金融合作情况。中国的四大行以及其它银行，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在海外有大量的分支机构，在中东也有不少。其中最多的是在阿联酋和迪拜，因为它们是中东的金融中心。除阿联酋以外，在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也有，当然数量远远比不过阿联酋的数量。

中国在中东的投资、贸易和服务所使用的金融机构，其实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国家做投资服务贸易是一样的。首先是用中东国家自己的银行，第二个是用国际上的商业银行，第三个用中国在中东开的银行分支机构，这三类银行支撑起中国在中东的投资、服务和贸易业务。

目前中国在中东油气和金融业务上主要有以下行业特点。首先是货币互换开始了，这是以国家信用为前提的，而中国的油气企业已经直接渗入到金融、保险、银行等领域，信托和租赁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开展业务的主要方式。

在一部分中东国家，由于美国的制裁，SWIFT 系统不能使用，部分石油企业自己的银行已经开发了能够兼容 SWIFT 的系统，使用人民币或者是欧元来支撑一些项目。

第四方面，是其他地区使用比较普遍的石油换贷款，比较出名的叫法是贷款换石油，这种方式在中东基本没有使用。

第五方面，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已经深度参与到中东



的交易所。前不久，阿布扎比成立了油气交易中心，中国公司和其它西方公司，比如说 BP、壳牌、道达尔和日本的公司一起参与到这个交易所。目前中国也已经有几家油气交易所。从历史上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曾经搞过 36 个油气交易所，到目前为止还在有效运营的剩下 24 个。

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油气消费量，如果说美国有 24 个油气交易所的话，中国建立十几个，甚至接近二十个交易所，数量上是支撑得住的。但是中国目前已经参与的油气交易所的数量和预期的数量，还不到美国的 1/3，所以交易所这一块的合作和建设，还有很大空间。这不光是涉及油气的交易，还涉及大量的货币来结算、清算之类的问题。如果说美元不方便使用，可以用人民币、欧元或者其他有竞争性的货币来进行结算。

在中东还有几件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还是存在悬念。

第一个，目前全球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 的上市，目前它仅在沙特境内上市，今后是否能与中国合作，中国能有多大力度上的参与，这是一个悬念。

第二个，说到油气，始终离不开美国，美国对中东的油气一直关注。对产油国中国有一种担心，因为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进行制裁，委内瑞拉由于自己的原因经济上已经破产。俄罗斯也在受制裁。美国在大量进口石油的情况下，试图控制产油国。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的油气基本实现独立。在这种量变产生质变的情况下，美国今后的油气出口会和中东的产油国形成竞争。所以，沙特等其它国家会不会受到美国

某种程度上的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不能仓促做结论，但是作为研究油气问题需关注这个趋势。

第三个担心，当美国的油气实现出口的时候，会不会把石油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武器。目前美国基本上石油对外依存度从 60% 降到了不到 2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 IEA 的预计，两三年以后美国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原油净出口国。因此其他的产油国和油气进口国都需要引起高度的警觉，而在这方面中国和中东国家利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值得中国和中东国家引起高度的警觉。

## 开创中国与埃及合作新局面

■ 安雅山 / IFF 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埃及规划部前常务副部长、ENInvestment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安雅山

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在过去的 10 年间发生了很多改变。导致这些改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一，中国的能源需求。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决定了中国对于油气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增长的。

第二，中国对于中东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视，而且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目前仍有部分中东国家存在政局不稳定的问题，例如 2011 年中国从叙利亚撤离了 4000 名中国公民。

第三，中国、美国和中东三方关系。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动作，然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而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导致了需求端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往，在中东地区创造了很多新的领域，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习近平主席曾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开展更多交流活动、进行更多经济往来。因此，双方高层之间的往来，以及经济层面、公司层面的往来都越来越多。2019 年双方高层互访比较频繁，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迈上了新台阶。2016 年，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对沙特、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了高层之间的互访和交流。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关系，也由于这些高层的互访和经济代表团之间的交流而日益密切。现在在中国的引领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其中既包括高层互访，也包括政府间以及私人领域的一些来往，双方合作关系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埃及总统对中国进行过四次访问，他对中国非常重视。中国现在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投资国，为这一地区提供了很多金融服务，包括贷款和货币兑换等。积极推动中国 - 埃及双边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将为埃及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对埃及非常有吸引力，甚至超过了 G7 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是金融机制的吸引力。2018 年，中国对埃及的贷款达到了 200 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额。

中国很多私营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实际上埃及名列前 10% 的电子商务公司都来自中国，其创造的利润在 2021 年有可能达到 500 亿。中国公司的发展和给当地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惊人的。另外，来到埃及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推动了埃及旅游业的发展，为埃及带来了许多的投资机会。

相信未来会看到更多中国与埃及的合作项目，双方投资也会进一步增长，埃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会因此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像智慧迪拜以及阿里巴巴智慧城市等项目，很快就会在阿拉伯国家落地。很多中国的公司也越来越重视这个地区，并且愿意在这里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相信双方未来的发展和合作将会更加紧密。

# 对话是发展中欧关系的 唯一途径

■ 赫尔曼·范龙佩 / IFF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赫尔曼·范龙佩

盟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最近欧盟分别与日本和南非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都是很好的证明。中国现在也在积极推动一项与东盟 10 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欧亚在 2018 年的互联互通战略中，概括了其互联互通的总体方针，这个方针依赖于开放市场的规则，涵盖欧盟及国际的准则，以及提供非常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所有参与互联互通战略的相关国家带来利益。我们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多边主义同时，进一步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也希望进一步加深各国的团结。

在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或是与美国的谈判中，欧盟和中国达成了一定共识，这点在伊朗问题上也有体现。现在 27 个欧盟成员国都非常支持欧盟，英国离开欧盟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欧盟成员国的相互支持，目前已经达到了 2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9 年 5 月欧洲的选民也创下历史纪录。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英国脱欧后会怎样。目前全球各国决策者之间有点不太信任，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间深深的不信任。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中国和欧盟兑现全部承诺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来参加本次峰会的重要原因。

在 2019 年的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愿意维护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多边贸易体系，确保中欧关系更加平衡互惠，同时承诺解决工业补贴的问题。

此外，中欧要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每一个全球的行动者，在内部和外部都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也要维护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平、繁荣、幸福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尽管各国之间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相同，但是有一些价值观确实是双方共同拥有的，比如说可持续发展等等，这需要我们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这方面中国和欧盟都负有重大的责任。对欧盟来讲，中国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时候，欧盟会把中国当成公共

中欧关系必须从全球和世界的角度来考虑，总体来讲二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其他方面。中欧这两个经济实体近年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盟在照顾自身利益方面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中国则扮演更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角色。无论如何发展，多边对话仍然是发展中欧关系、解决金融争端的唯一有效途径。

欧盟和中国都希望能够保持多边交流框架，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还要在行动上开展交流。欧盟和中国都致力于人类最重要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下面我将更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和欧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中欧关系日趋成熟复杂，而且有高度的多样化。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前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现在是东盟）。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2018 年中欧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平均每天都要超过 17 亿美元。而中美贸易战，从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影响了中欧的关系，它导致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增长机制放缓。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很容易被解释为地缘政治，同时也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欧

## IFF 领袖对话会

对话是发展中欧关系的唯一途径	103
赫尔曼·范龙佩，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中欧关系发展历程回顾	105
周小川，IFF 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欧需在金融环保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106
朱光耀，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中欧关系在贸易投资领域可进一步发展	107
何建雄，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 IMF 原执行董事	
相互开放市场、深化中欧合作	108
余元堂，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	
地缘政治和不确定性：影响中欧关系的两大动因	109
玛莎·万德博格，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全球化加剧贸易复杂性	110
宋敏，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目标的合作伙伴，包括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问题等；有的时候欧盟把中国当成谈判伙伴，比如说投资协定、移民签证便利化等。而在技术和科技研究方面，欧盟同中国是存在经济竞争关系的对手，比如在快速发展的高科技行业，人工智能、电动汽车等等领域。但总体来说，欧盟希望与中国携手努力，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共同利益！

## 中欧关系发展历程 回顾

■ 周小川 / 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小川

对中国和欧盟来讲，双边之间的合作很重要。回顾中国和欧盟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和欧盟有非常多的共识，双方之间的沟通和协作都是相当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我也相信，中国和欧盟能够有更多的机遇开展合作，从容应对当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跟欧盟在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在巴黎气候协定当中，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也很积极地支持巴黎气候大会的成果，这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机构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重要的节点当中，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是很有作为的。还有欧洲的难民问题，中国跟欧盟有很深入的探讨和合作，欧盟面临紧张局势时，中国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中国政府，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和温家宝前总理，都认为欧盟是很好的很强大的伙伴，他们也希望欧洲更加强大。

欧洲银行体系很重要，欧洲央行可以进一步提出相关的举措，支持欧洲现行的经济。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与发展。比如在欧洲经济面临危机时购买欧盟的债券，能增强欧洲

人民应对危机的信心。当时中国买了 3500 亿债券和相关的经济等价物，这也意味着中国一直以来将欧盟当作很重要的战略伙伴和朋友。

范龙佩首相谈到了欧盟的发展银行，而中国也有国开行，中国会不断投资 EIB 债券，中国是欧洲投资银行债券发行最大的购买方，据我所知现在在中国购买的债券量达到几百亿规模，今后还会持续地购买。除此之外，中欧在非洲投资发展问题、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问题、国际税收制度问题等领域，都有丰富的合作经历和广阔的深化合作前景。

我还想提几点重要事件。第一个是希腊，2011 年欧债危机起源于希腊，那时候有一些人质疑欧盟，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当时欧盟采取了一些及时策略，欧债危机慢慢减缓了，最后帮助这些国家走出欧债危机。

第二个是解决金融危机，麦德龙对贷款体系进行了重新的改革，这是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的举措。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是意大利，现在意大利在经济复苏当中做得不太好，但是意大利是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对欧盟及欧洲地区都相当重要。中国会对意大利提供强有力地支持，包括购买意大利的政府债券，不断促进意大利产品的出口。

对于国有企业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并购欧洲的企业，在技术转移和市场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常明晰自己的责任，中国将会有更多开放性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中，第一个许可证永远是给欧洲企业的。

## 中欧需在金融环保等领域 进一步加强合作

■ 朱光耀 / IFF 副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



朱光耀

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很深层次的关系，比如非歧视互惠都很重要，那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两者间的关系，是我们来讨论的。

对于中国来讲，欧盟是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和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关系是全球关系的一部分，这两个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对全球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朗问题和数字经济等方面开展了许多合作。进一步加深中欧双方在数字货币、数字税、5G 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欧关系在很多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加深，比如与中东欧国家“17+1”的区域合作倡议，虽然目前“17+1”这样的倡议不能够取代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合作，这种合作和沟通能够拥有更加有效的对话机制。

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合作呢？首先是和数字经济相关的网络安全，中国和欧盟要有更加高层次、专业级的对话，以促进和提高网络安全。其次是在金融领域，在这方面中国也需要与欧盟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合作。中国在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会变得更加开放，可以将金融市场开放给欧洲，同

时中国需要更好地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可以跟欧洲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市场管理。

在环境保护方面，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和欧盟已经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但中国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成立更多的环境保护项目，制定保护环境的合作标准等。虽然经济上中欧双方互相有竞争，但是透明性、开放性、合作性是基本前提。中欧双边的合作对全世界都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我相信未来中欧双边贸易将会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两边的国家领导人也会有更加紧密的合作，2020 年的多边贸易协议、双方的合作将会变得更加成功，会有更加丰富的成果。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和欧盟，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对全世界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全球战略性贸易伙伴的关系，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如果能在贸易方面紧密合作的话，对欧洲人民来讲，对中国人民来讲都是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协定现在得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在全球复杂的局势下，WTO 在多边贸易中一定要做更多的工作，促进更多地区之间的贸易合作和互惠互利。

## 中欧关系在贸易投资领域 可进一步发展

■ 何建雄 /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 IMF 原执行董事



何建雄

对中国来讲，中国跟欧洲的经济、贸易关系很重要。因为中欧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双边贸易已经达到 70 亿欧元的规模，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中欧之间还有很多的工作可做，包括贸易、投资等可以进一步发展。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谈谈中欧贸易投资方面的好处。首先，我们了解，政治上的变化肯定会对 GDP 和就业市场产生影响，也会对融资产生影响。所以从这点来说，看贸易投资，尤其是跨国界的贸易投资时，一定要看政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其本身的内需消费就很大，但仍需要发展贸易投资并建立竞争优势。

我们回头看中国过往的政策，可以看出在欧盟、FDI、境外直接投资等方面都有政策变化。对外开放的政策现在是有了多方面的变化，用中国的术语来讲就是“平等互利”，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来进行互惠的交换，有的时候这种互惠互惠不是那么有效率。政策有的时候要大量进口，有的时候要大量出口，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灵活的举措。中国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劳动力非常便宜，有的时候买进，

有的时候卖出，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进出口贸易。这些政策对于贸易两国的利益都会有影响，尤其是投资政策。如果我们引进外资，让资金流动起来，就要采用一些新的投资工具，肯定要基于科技的手段，有科技方面的技能作为支撑，才能更好引进外资。

对政府来说，政府要进行政策刺激，刺激企业进行治理。之前有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问我，你们的出口是不是像特朗普总统说的那样富有野心，我的回答是：看一下这些数据吧，跟越南和马来西亚相比，经济体量是差不多的。这个美国决策者又问我，这个出口额是不是对美国造成了威胁。我当时讲，中国在出口方面是无歧视的，我们设定的出口框架是保护性的。很多人在说这个框架中有很多限制，我说并不是限制，而是你没有看到全局，对投资商来讲，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投资有很大的风险的话，他就不会开始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些政策会影响到贸易的方方面面，因为境外直接投资、境内直接投资一旦发生了影响，产品不进来、技术不进来，也会给中间的关系带来影响。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要有一个平台、一个框架，我们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融资平台，还要有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合作。国际货币体系方面还有待提高，WTO 的改革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很多方面的谈判机制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更高的平台，在这些方面达到更好的贸易合作。

发展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需要面向未来去看这两大经济体。欧盟和中国的经济体量都很大，很多投资、贸易以及各个地区间的往来，会使经济潜力变得巨大，而且这也涉及到整个亚洲和欧盟间的合作。

## 相互开放市场、 深化中欧合作

■ 余元堂 / 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



余元堂

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很长的合作历史。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还是增加了 3%。进一步的合作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中国在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而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中国企业会更多地走出去。WTO 是很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我们深化改革，所以一定要利用好 WTO 的平台。

中欧已经设立了部长级的合作，部长级及各种层面的会谈为双方达成合作建立了桥梁。中欧双方一定要促进多边主义，使贸易体制更加透明化，同时要保护各国的主权完整和贸易平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BIT) 的谈判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比预想的进展更大，中国希望通过积极的谈判与欧盟达成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国未来也会有更多的 FTA，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给中欧人民和

企业带来更大的福祉，同时也会签署谅解备忘录，举办多种多样的论坛。

中欧应该在商务、文化、投资等领域相互开放市场。欧洲的市场对中国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也会向欧洲和全球更加开放，在共同信任的基础上，中国同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应该是互利互惠的。中国会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与各方进行官方或非官方的对话会谈。中国对欧洲做出了承诺，这些承诺一定会兑现成坚定的行动。

李克强总理已经访问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希望与欧洲进一步加强合作，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和欧盟应该连接起来，形成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双赢局面，给中欧两个地区的人民带来福音。

**中欧已经设立了部长级的合作，部长级及各种层面的会谈为双方达成合作建立了桥梁。中欧双方一定要促进多边主义，使贸易体制更加透明化，同时要保护各国的主权完整和贸易平等。**

## 地缘政治和不确定性： 影响中欧关系的两大动因

■ 玛莎·万德博格 / IFF 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玛莎·万德博格

如何加深中国和欧盟经济、金融方面的合作？影响中欧关系主要有两大动因。

第一个是地缘性政治。近期《中国日报》上的两个新闻引起了我的兴趣，是关于如何加深欧中关系及欧中合作的建议，提到要关注共同的技术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德国之间共同的技术利益，还有贸易合作，比如国家和地区商务部之间的高端对话。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是反映了一大步。

现在世界不再是以美国为中心，已经从单极化转为多极化。但美国仍对全球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白宫和特朗普的决策带来的影响给全世界都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对华盛顿来讲，特朗普总统讲到跟中国的关系时，他要在多领域开展战略竞争，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是不断发展的，而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将会在世界领域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和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北京来讲，必须要采取行动应对中间的问题。美国提出了一个观点，要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其实如果不开放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强大。在今天，中国和美国已经编织了非常重要的全球化的网络，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也包含了国际供应链的发展。美国

目前处于战略性的恐慌当中，他们认为美国的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美国现在也是比较分化的，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也面临着很多的分化和挑战，但是对于今天来讲，解决冲突最重要的是要增加对话。

第二个是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个高度不确定性被美国贸易战紧张的局势加深了。不确定性已经给贸易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应对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多边会谈而不是单边主义。中美两大经济体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双方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应该努力加强沟通，如果双方不能达成满意的结果，对其他地区的人民、经济也会有影响。

这个不确定性也包含了欧洲的问题，英国脱欧是个漫长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些未确定的情况，给全球局势带来了相应的挑战，这也改变了企业、金融业、投资领域、贸易领域，希望通过更多的努力，更好地促进跨太平洋国家的合作。

还有一点是市场，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已经把当前的市场形势命名为“最令人焦虑的时代”，全球经济都在放缓增速，但是亚洲能够带来更多动态式的增长和发展。对于德国这样重要的经济体来讲，虽然面临着经济衰退的情况，也面临着贸易战紧张局势的升级等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但是还希望美国能够有所作为，也希望欧盟要有更多的作为。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对全世界都大有好处，中国和欧盟一定要加强合作，真正达到和平、繁荣和稳定。关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气候方面的合作，在将来可以通过增加对话来推进。

# 全球化 加剧贸易复杂性

■ 宋敏 /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宋敏

对于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我有几个观点。

第一，全球化使贸易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贸易战中坚挺这么久？几十年前，美国和日本之间也有过一场贸易战，但是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贸易战中保持如此坚定的立场呢？2018 年贸易战开始时，很多人觉得它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中国进口是很依靠美国的。但是在加征关税以后，面对美国“关税大棒”的凌厉攻势，中国竟然挺了这么久。

主要原因是国际局势已经变化了，国际贸易不是当年的老样子，现在是多极化的世界，不再是单极化的世界，彼此要互相交流合作。全球化使得中国和美国已经血肉相连，对美国来讲，他非常难以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打击，因为扯着骨头连着肉，中美现在已经成为一张网了。中国和欧盟和其他国家也成为了一张网，对于一张网来讲，美国想要打击是很困难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处在全球化网络中的中国，展开贸易战是很难的。从制造业来看，美国不可能一下子把想要的工厂挪回美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长期的积累，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实现。

第二，欧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欧盟正在壮大，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整个贸易网络

中坚挺的一部分，欧盟和中国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盟的技术是中国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节点，贸易的动荡需要我们彼此紧密合作，就像做工业设计，很复杂，这需要双方进行分工和合作。

第三，坚持多边化，多边化要考虑到文化、经济、政策等因素，包括美国的决策，欧盟的价值和对其自身的影响。

怎么样能够让 WTO 更好地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下进行服务，如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团队想要解决的问题，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继续倡导多边化。

需要把“多边化”这个词一遍遍强调，WTO 是多边化的，我们需要格外尊重 WTO 成员方自己的发展模式。认为只有一个发展方式其实是不对的，中国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应当尊重各个国家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第二是创新。

创新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同的企业一定要采取各种不同的发展方式，不能独立发展，孤军奋战，不能只发展国企或央企，应当鼓励企业创新，各有各的贡献，可以把创新的内容交给市场检验，由市场来淘汰。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创新等方面，国企的做法跟私企做法会有点不同，这涉及到企业所有权和公司治理问题。

第三是出口电子商务。

中国在电子商务上，尤其是电子支付上走得很远，起到了先锋作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算是世界领先的。怎么样才能够把数字经济、数字出口在全世界进行推广，这方面中国确实有些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进行借鉴和学习。

第四是合作比竞争更重要。

欧洲也有很多国企，都是国家注资的，国企也要有活力，要注重与私企的合作。欧洲的国企跟中国的不太一样，中国可以向欧洲的国企学习，借鉴欧洲国企的经验。多边化贸易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中欧双方未来的共同目标。

## IFF 峰会 (1)

- |   |     |
|---|-----|
| <b>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br>张慎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 112 |
| <b>提升“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及问责机制，为全球新发展模式提供理念支撑</b><br>穆罕默德·希姆谢克，土耳其前副总理               | 114 |
| <b>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b><br>祝 宪，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 | 115 |
| <b>中国葛洲坝集团坚持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b><br>陈晓华，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117 |
| <b>“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机会及建议</b><br>亚历山德罗·特谢拉，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 119 |
| <b>推动“一带一路”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b><br>史育龙，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 120 |
| <b>中巴经济走廊带来双赢 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大</b><br>阿什法克·哈桑·汗，IFF 学术委员、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 122 |

#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张慎峰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张慎峰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过去的两年,是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程度最高的时期之一,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呈现以下明显特点:

一是经济全球化放缓,国际贸易占全球 GDP 比重从 2007 年的 28.1% 下降至 2017 年的 22.5%,国际贸易增速由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速转为基本持平。

二是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速,2019 年到 3%,这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 6 个月低于荣枯线,世贸组织也将 2019 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预测下调至 1.2%,为过去三年来的新低。

三是国际经贸摩擦博弈增多。近两年,中美经贸摩擦形势日益严峻,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反补贴调查明显增多。近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的经济贸易争议案件数量同比增长 30%。

四是去中心化态势明显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系遭遇空前挑战,世贸组织改什么,怎么改,主要成员各方分歧较大,主要经济体加速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去中心化态势更加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以“新格局、

新发展”为主题,本届会议以“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增长为主题,探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制度化,研究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及保障各国经济和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六年来,中国与 139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95 份合作文件,大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打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直接提升了有关国家、地区的投资贸易增长,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数据显示,2013 年至今,中国对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7.47 万亿美元,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000 亿美元。2019 年 1-10 月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9.4%,是增长最快的地区,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29.1%。《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将使参与国际贸易增长 2.8% ~ 9.7%,全球贸易增长 1.7% ~ 6.2%,全球收入增长为 0.7% ~ 2.9%。

如何继往开来、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造福国际社会和更多人民,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在这里提几点建议和大家商讨:

1. 要更加完整准确,融会贯通,始终坚持“三共五通”原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都做过精辟阐述,“三共五通”是其中核心内容,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不单方面输出,不单方面依赖,大家各使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三方、多边合作,一起动手实现互利共赢。持续加强政策沟通,强化政府间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硬件,是最容易取得可视化成果的。通商易货是初始,是发端,是历史最悠久、最直接的,也是最基本的联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量,有支撑。民心相通是开放、理解和包容的源泉,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五通”的内容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 强化政策沟通。持续推进机制和平台建设,共建“一

带一路”,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与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的具体发展战略对接,要充分用好 20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中东欧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坚持“多拉手、少松手,多拆墙,少筑墙”。习近平主席亲自搭平台、建机制,提出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进博会的创举,并亲自推动实施,两个国际性盛会越办越好。丝绸之路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国际合作平台也都在提质增效,各方应把握机遇,通过政府间的促进活动凝聚更多共识,搭建更多平台,推进深化合作。

近期,中国贸促会正在与全国工商联、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筹办全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及跨国投资大会,为“一带一路”投资主体打造经验交流互鉴、政策宣传解读、贸易投资项目对接的国际化平台。

3. 把设施联通作为当前一个时期优先加强的领域。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合作发展的基础,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仍然存在很大提升空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属于优先领域,目前看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绝大多数投资也是较多地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为基础的框架基本形成,我国目前已开行了中欧班列,累计近 2 万列,通行境外 16 个国家,53 个城市,有效地激发了亚欧大陆物流和贸易通道潜能,正在改变沿线生产、贸易的格局。

4. 强化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贸易安排,是近年来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我们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坚持照顾大多数成员,并关切收窄发展鸿沟。同时,在已商签 17 个自贸协定基础上,积极同更多的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大力推动企业提高自贸协定使用效率,使优惠政策发挥更大促进作用。

我们期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签署生效,尽快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期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更多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5.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用,努力提升金融通效能。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项目合作、跨境结算等各类金融服务的需求与日俱

增。不仅需要发挥国际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等的迁移、撬动作用,还要调动商业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拓宽资金来源。通过在开发金融、产业金融、贸易金融、跨境金融和网络金融等领域打造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确保商业和财政金融的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提高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水平,创新金融工具,开发普适性的保险产品 and 金融衍生品,满足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和征信合作,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

6. 优化宣传,解疑释惑,更好实现民心相通。数据显示,六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几十个境外合作经贸园区,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30 多万个,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 27 亿美元,众多企业开展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流交往、社会慈善事业等不胜枚举,有力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民生等的大幅改善,完全顺应了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但也有个别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质疑和负面评价,甚至有人指责“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工具和债务陷阱。“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须增进相互了解,我们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多用老百姓身边的事例和生动的语言讲述“一带一路”带来的积极变化,用成绩和事实粉碎别有用心者的无端指责,优化舆论环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

7. 进一步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软联通建设。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市场状况、商业规则、文化习俗千差万别,要做好信息收集,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向企业提供风险评估报告和法律服务指南等类似信息,要大力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和商业文化,自觉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要开展专业培训,帮助企业建立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等风险管控机制,要调动专业服务机构力量,在法律咨询、资信调查、仲裁调解、专利商标代理、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索赔等方面提供多样化服务。同时,要大力呼吁推动海关、税收、认证等领域全面落实已有协定,避免出现重复检验、重复征税、重复认证的问题。

通过不断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执法等方面,推进软联通建设,中国贸促会愿与国际金融论坛在内的各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各国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一道,建立更多机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优服务,支持中外企业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 提升“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及问责机制，为全球新发展模式提供理念支撑

■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 土耳其前副总理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贸易战、地缘政治斗争，甚至投资战，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

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很受鼓舞的是，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讨论怎么来建立和加强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通，同时更好地促进服务和货物的流通。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贸易连通，它也是一种举措，建立新发展模式是提高全球在监管透明度、项目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这都是关键的因素，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首先，这并不需要重新发明，可以从全球的最佳实践当中汲取经验，避免声誉上的风险，提高认可度，提高项目透明度，这也是所有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伙伴，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保证项目建设运营的透明度和有效的问责机制，这是新发展模式当中的要素。

有很多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批评这些项目。所以说，一定要避免声誉风险。要避免造成债务陷阱，一定要提

升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此外，亚投行的目标是希望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世界银行和亚开行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来管理项目，所以在欠发达的国家进行项目投资中，需特别注意能力建设，要帮助东道国建立高效的制度，高水平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首先要关注基础建设，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土耳其有一句话说“道路就是文明”。

从长期来看，人均 GDP 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结构，是劳动力的参与度等等。还有一些是软因素，比如生产效率。我们说发展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教育，21 世纪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科学技术也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很难让教育发挥作用，很难建立一个机制来提升产业链水平。所以要有好的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能够为全球提供稳定的发展。我对中国表示赞赏，他们很好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连通。

如何为每个沿线国家提供融资呢？这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资本市场、银行体系都不一样。一些项目可能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还要考虑利用市场，因为公共资本是不够的。现在有一个估算，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 2016 年到 2040 年之间是 94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要投入 3.7 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数目。但大家不用悲观，公共部门资金不够，市场上还是有很多钱。现在全球年度储蓄有 20 万亿美元，2019 年预计是 21 万亿美元。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当时各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其实有很多低成本的资金，投入到产出不高的项目里面，都是在追求回报。但是现在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已经有负利率了，2019 年负利率的债券总额已经达到 17 万亿美元了。为什么我们不去避免这种债务的泡沫，而把私营部门的资金吸引进来？如果投资项目有政府的支持，私营部门的资金会更有信心。项目就能够获得融资，能够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如果能够解决监管方面的问题，比如提高透明度、构建问责机制，加强体制建设，将有利于投资。

## 更好地发挥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祝宪 /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道德官



祝宪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涉及到全球各个领域，涉及到全球各个区域。对于“一带一路”的解读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把“一带一路”仅仅局限于互联互通加上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种认识有一点片面。

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潜力在于，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机会和平台，使其更多、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深入地进入全球产业链。“一带一路”致力于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为其注入新的动力，也应该视为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平台。所以说“一带一路”的潜力不仅仅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在于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或者说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要真正坚持规则导向，开放包容，既注重与有关国家既有的经济发展规划的协调和衔接，又要采取高标准建设及国际规则标准，真正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为构建公平合理的新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沿线国家硬件和软件互联互通的过程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能力建设，

发挥挖掘各自的优势，特别是为低收入国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潜力，融入全球价值链，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落实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沿线区域的情况，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情况。目前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资金供给来看，许多国家因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投入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有些国家财政收入受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过大，难于保证持续、稳定投入。从市场投资的角度讲，市场上的私人部门资金量是很大的，但是许多交通建设、能源开发，特别是跟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融资期限长，未来收益不够确定等特点，所以民营资本投资先期介入的意愿比较低，民间存量资本大规模进入这些领域还不完全具备条件。所以在坚持规则导向的前提下，如何在金融产品和工具上开展创新，既能扩大资金有效供给，又能有效管控债务风险，同时能充分发挥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企业的主动能动性，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的重中之重。

在这方面，主权信用风险担保、PPP 等方式应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间可以发挥作用。要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需要行之有效的融资机制和平台，在明晰政府责权利的边界前提下，动员民营部门的资金积极参与。多边和国别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也能够提供相对长期和优惠的资金，从而对民营资本起到引导示范作用，是在这方面发挥具体作用的一个合适平台。

发展中国家关注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传统的开发金融体系中，对于发达国家组成的捐款集团与受助国之间形成的一种相当程度上的不平等地位关系，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诉求往往得不到落实。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非常严重的瓶颈，但包括多边金融机构和民营资本的资金支持不足，



使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得不到根本满足。

上述问题一方面限制了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中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相关国家从这些机构中获得资金的积极性。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将国际开发机构好的经验与自身发展的理念和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为补齐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短板，促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弥补全球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资金融资的缺口，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先后应运而生，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发起建立的一家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其使命就是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缓解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融资瓶颈制约，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为全球经济加速复苏提供新的动力。目前新开发银行的成员仅限于金砖五国，在可期望的将来也欢迎新的成员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加入新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基础设施和软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 中国葛洲坝集团坚持互利共赢原则，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深走实

■ 陈晓华 /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华

我作为为数不多的企业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主要基于这么几点原因。

第一，金融服务于实体企业。葛洲坝集团作为实体企业更多参与到国际金融论坛和丝路国际联盟活动，这一点将是丝路国际联盟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二，葛洲坝集团是中国“走出去”的 4000 多家企业其中的一个领军企业，我们在全球 142 个国家有业务，在全球 99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同订单排名中，2018 年排在全国第四位，营业收入排在全国的第八位，是名副其实的践行“一带一路”的领军企业之一。

第三，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将落户广州南沙，中国葛洲坝集团将在广州南沙投资建设运营国际金融岛，永久会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将由中国葛洲坝集团和国际金融论坛，还有广州地方企业共同打造。

所以，作为一家实体企业代表参与国际金融论坛和丝路国际联盟，应该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我有以下思考。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们得到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

经过六年的夯基垒台，立梁架柱，“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做深做实的新阶段。本人作为中国对外承包商会的副会长，担任这一职务已经有七年时间，中国对外承包商会是中国“走出去”的实体企业中最大的商会，有 2000 多家会员代表，182 个理事单位。我想就“一带一路”建设提三点建议。

一是要积极探索国际金融资本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共五通”中，其中“一通”就是基础设施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刚性需求巨大。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的预测，每年基建投资的增长额将有两万亿美元，包括港口、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缺口将近八千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需求给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

然而，全球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参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金融规则的不兼容，风险分担机制的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法律制度的缺失等因素，给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巨大，国际金融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应该说比较富足，一边是干旱，一边是堰塞湖，怎么把它打通？需要积极探索融合的路径、融合的方法，以及融合的机制。期待丝路国际联盟研究院今后能够就这个课题进行深度的研究。

葛洲坝集团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前不久习主席访问希腊的时候，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我们进行了一个项目的签约，这是一个三亿美元的光热发电项目。这个项目的投资方是英国的洛尔能源公司，融资方面是中国的工商银行和希腊的国民银行、黑海银行，信保担保机构是英国的公司，它的总承包商是中国葛洲坝集团。金融机构，包括信用保险机构、商业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打通以后，就可以为“一带一路”项目或者民生项目提供服务和支撑。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机会及建议

■ 亚力山德罗·特谢拉 / 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力山德罗·特谢拉

拉美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问题很重要。拉美有 30 多个国家，有多个千亿资金的项目，拉美参与“一带一路”比较晚，现在有 13 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还没有完全参与进来。

“一带一路”的概念很重要，它从最初的建设物流网络，成为一种发展模式，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引入一个新的模式。但是，在拉美一些国家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首先觉得这是中国的项目，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印象。怎么来改变呢？就是要改善“一带一路”治理系统。

在很多拉丁美洲的政府里面，他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一带一路”？如果中国来投资，我们要做什么呢？而我的观点是“一带一路”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它包含很多深层次的含义。要改变拉丁美洲国家的观念，就要提高在拉美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质量。一些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接受度不高，是因为个别海外投资企业不好的形象。所以，需要塑造中国企业海外良好的形象，积极的形象，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宣传工作。在非洲和其它地方也是，除了钱、知识以外，还有技术转移，要更多地让当地的民间组织参与进来，提高身份认同感。或许应该把“一带一路”的理事会扩展出去，不要让人觉得这是一

个政府的机构，要吸引私营资本参与。如果私营企业不参与，私营资本也不可能参与进来，这对拉美来说很重要。

还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我觉得 IFF 应该做一些学术研究，就是债务陷阱的问题。如何来管理好债务？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偿债能力差、经济发展不足等很多问题。因此，项目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要提升治理能力，要让东道国认为这些项目不只是中国项目，得让各方参与进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关于融资。不仅给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拉丁美洲每年需 1000 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现在只有 200 多亿，如果说只是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话，肯定不能成功。其次，要更加包容。在吸引企业方面，要让全球理解这是一个发展项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发展，为全球共同发展创造新机遇，因此，要证明这些项目是可持续的，还要请私人企业参加。再次，去政治化。虽然有很多阻力，但美国认为“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些项目、融资，我们需要让美国认识到这是一个国际化发展的项目，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因此，我们需要让美国参与进来，要说服他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仅六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我觉得要提升治理能力，提升透明度，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已经是出国旅游和入境旅游的第一大国，中国人去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旅游，当地获得很多旅游收入。怎么让他们充分利用这一点呢？应帮他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也是一件大事情，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创新。怎样扩大、拓宽这一含义？比如数字丝路的概念，可以让很多中国的企业参与进来，需要更加务实。要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理解、观察、思考应该怎么办，而不光是从投资母国的角度来看问题。

未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都可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这样整个拉丁美洲就都参与进来了。但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充分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让民众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让各国民众普遍收益的国际合作平台，让它成为真正的国际倡议，能够覆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二是要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融资、施工建造、运营维护的全产业链上开展多边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习主席多次讲过，“一带一路”绝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我们觉得，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在贸易方面，还是在其他的合作方面，每个业务的产业链应该是融合世界各国优势的技术、产品、金融来共同进行合作共赢的。

近些年，葛洲坝集团高度重视多方合作项目。目前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有 17 个项目采用的是多边、双边、多方、第三方合作的模式。比如，在非洲安哥拉，目前一个最大的水电项目，总投资是 45.32 亿美元。这个项目我们用的是德国的发电机组技术，中国的融资，葛洲坝集团作为 EBC 的总承包商，成功实现了多边合作。

最近，刚刚得到波黑政府批准的一个火电项目，用的是美国 GE 的设备，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总承包商是中国葛洲坝集团。我们整合了各方的技术和产品，最近在迪拜投资了六亿多美元，做一个海水淡化项目，运用的是法国的技术，中国的产品和土建施工，投资方是沙特的 ACWA Power 电力公司。这是国际资本、国际技术、中国企业建筑优势的一种大集成，形成了一个多方的、共赢的合作。我想这就是我们积极倡导的方式，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

三是要更加注重“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项目的价值创造，按照投资项目和融资来源的不同，设立不同的控制原则，保证“一带一路”投融资的可持续性。分以下三个方面。

1. 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可能需要依靠外来的融资进行建设。融资建设当中，期望它能够不脱离所在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盲目铺摊子，更不能盲目追求高大上的规模。追求未来 20 年、30 年不落后这么一种规模，这容易推高当地债务负担。

2. 对于债务性融资，有一些项目有比较好的现金流收入，用东道国的主权信用进行担保，或者用其开发性金融进行投资，用国际的资本进行融资。这种情况下，首先得保证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的可行性。从而让这个项目的投资能够风险可控，投资、融资、EPC 承包商，就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

3. 纯商业性的、社会资本进入的一些领域，包括 PPP、BOT 等等各种各样的模式。对这类项目，需要各国政府改善其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为外资准入而完善其法律机制，让外资的投资、国际的融资

能够放心，能够有合理的回报。目前，要打通这个堰塞湖的现象，一方面是资本在全球寻找好的项目，一方面是有许多项目缺乏资本的介入。这里面政府的角色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应该提供良好完善的法律支持，应该让投资者投得放心，让融资者融得放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融资工作风险可控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

中国葛洲坝集团作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央企集团，将积极深度参与丝路国际联盟高端平台的打造，共同为联盟的发展壮大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葛洲坝集团承担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一体化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深感荣幸。葛洲坝集团将调集优质高端资源，精心组织，科学管理，高效实施，全力将国际金融论坛 (IFF) 永久会址打造成为广州的新地标，将南沙国际金融岛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们还将秉承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葛洲坝集团在工程承包、投融资、管理咨询、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领先优势，与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战略合作，共拓全球化发展新路径，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新机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梦想而共同努力。

# 推动“一带一路”新型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

■ 史育龙 /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史育龙

关于“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增长的话题。在此，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2019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六年，这六年与沿线国家签署的国际合作项目，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投资超过了 900 亿美元，而 2019 年 1 到 9 月份超过了 100 亿美元，加在一起现在超过了 1000 亿美元的投资金额。以巴基斯坦为例，过去六年来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完成的能源项目占到现在巴基斯坦发电总量的 30%，为解决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瓜达尔自由区，现在投资额已经超过了 6 亿美元，有 20 多家企业入驻。过去六年来，巴基斯坦的营商环境、全球竞争力的排名都有显著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的认可。2019 年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对“一带一路”在促进全球反贫困斗争，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和贸易的增长方面都有一系列有利的数据。

第二个观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要更加切合沿线国家需求。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 2019 年 4 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一带一路”要坚持向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把双边为主的项目变成三方合作，甚至变成多边合作项目，这些都应该是下一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的方向。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来说，要更多地关注沿线国家目前发展阶段以及它们的现实需求。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合作过程中，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占了相当大比重，这是巴基斯坦现在最紧缺的项目。

同样，2014 年中国一家民营企业——隆盛钢铁，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一个钢铁项目。在欧美很多的专家看来这是钢铁工业，中国现在 10 亿吨的产能，钢铁的产能规模是世界第一的，被认为是严重过剩的产业。而且钢铁消耗大量的资源，环境负荷很重，普遍认为钢铁项目应该是受到控制的项目。但大家如果把目光放在马来西亚以及整个东南亚来看，数据显示，2016 年，马来西亚的钢产量是 276 万吨，在东盟国家里面排第四，当年排第一的越南产量是 781 万吨，但是在这一年越南和马来西亚的钢材进口量分别是 1696 万吨和 765 万吨。这意味着什么？以马来西亚为例，它 2016 年钢材的实际产量只能满足国内需求量的三分之一，缺口在 500 万吨以上。东盟人口规模巨大，而且这些年来发展速度很快。对于钢材这种原材料基础产品有着大量的需求。2016 年，越南加上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这些东南亚比较大的经济体，六个国家的钢材进口量超过了 6000 万吨。中国这家民营企业投资了年产 350 万吨的项目，用了四年的时间，解决了马来西亚钢材缺口的 70%。

评价“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不能一味单纯拿欧美标准、欧美眼光来看，它要切实符合当地的需求，要

能够显著地促进和带动当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现在缺钢材，你要让它做环保，它现在需要把原材料转化为深加工的产品，需要电，你现在让它更多关注生物多样性，这些原则都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个方面取代另外一方面。我们高度认同要关注环保，关注生物多样性，但是不能因此忽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能源原材料产品的严重缺口。

第三个观点，实现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它需要一定的机制来作为保障。没有机制保障很难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如果说要讨论机制的话，我们应关注“一带一路”现在在哪些领域、有哪些类型的项目合作。我发现在共建“一带一路”里面，现在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资源开发、加工制造业、农业、贸易物流、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我把金融合作作为支持这些领域合作的支持工具来说明。在这些领域的合作，目前采取的方式有：第一，企业的对外投资，包括跨国并购。第二，作为工程承包企业，如葛洲坝集团在境外承包大量的工程。第三，第三方市场开发以及三方合作开发，如中法合作开发非洲市场，在英国开发核电站，和日本合作开发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第四，是贸易促进，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第五是多边开发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支持，像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泛美银行等。当然一些重要的基金也在参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大量存在的私人资本如何进入。最后一种类型包括政府间的发展合作援助资金，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沿线国家、众多领域及多样化投融资方式，如何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一些什么规则呢？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构建多种金融方式，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多边机构的资金、私人资本，以协同方式推动项目建设，跟这个相关的就需要金融全链条的协作规则，比如说信用评级。按照现行的很多评级方式，很多项目显然不具备可投资性。

在信用评级完成以后，投融资、信用保险、再保险等等一系列协作规则需要建立一套完整体系。与此同时，这两年来我们很关注债务可持续的问题，在第二届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一带一路”的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跟融资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是需要大家共同探讨构建一个新的符合投资国和沿线国家合作模式的债务可持续规则。当然还需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如何评估风险？遇到风险的时候如何防范？一旦出现的时候，如何化解风险？均需要一定的

规则。

下一个规则是项目的招投标规则，这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是比较早浮出水面的问题。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匈塞铁路项目中，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一个是正在加入的国家，一个执行的是欧盟规则，一个是非欧盟规则，中国企业在招投标上就遇到了规则的冲突，导致项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然，也应该包括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已经正式发布了“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原则。在这个领域，我们觉得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最后一个规则，是廉洁规则。在 2019 年第二届高峰论坛正式发布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大家都希望未来的“一带一路”是“廉洁丝绸之路”，这样才能保证“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

这些规则如何来建？我觉得要坚持共商的原则，有些原则是现在已有的原则，但是要考虑到各方的适应性，以及各方的接受度。不能直接拿来简单地套用，只说这是现在的国际标准。因为现行的国际标准里头很多的规则是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的。按照现行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很多“一带一路”项目评级都过不去。

2019 年 3 月，欧委会发布了欧中战略前景报告，报告里面提了十点行动建议，其中就包括欧盟要在 2019 年年底发布它的国际采购规则，以及投标规则等内容。这些规则如果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比如说在三方共同合作中间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各方有更深入地探讨和切磋，形成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规则，这样才能确保“一带一路”真正地持续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 中巴经济走廊带来双赢 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大

■ 阿什法克·哈桑·汗 / IFF 学术委员、巴基斯坦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阿什法克·哈桑·汗

“一带一路”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其实是基于中国的哲学——“你的繁荣，基于邻居的繁荣，大家共享繁荣”。“一带一路”倡议有共同发展目标，共同的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真的是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也是我们最崇尚的一种全球化模式。“一带一路”需要考虑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而不仅是实现中国企业“本土化”运营。例如，“中巴经济走廊”是六个走廊之一，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会基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功，它是非常关键的合作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不只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造福中巴及周边区域人民的项目。这对于中巴两国都非常关键，中巴两国在地缘上是邻国，这也是国家安全政策之一。

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第一，有利于帮助巴基斯坦解决能源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缺乏能源和电力。亚投行一项研究表面，每年巴基斯坦因为电力缺失而导致减少 2.5% 经济，“一带一路”解决了巴基斯坦的瓶颈，这使得巴基斯坦第一次出现了能源的盈余。

第二，基础设施的成果。如果你去巴基斯坦，可以看到世界一流的公路系统，这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持才建成的。

第三，加快工业化进程。现在巴基斯坦已经有 9 个经济特区，这是“中巴经济走廊”支持下的 9 个特区。其中 3 个马上就要开放运营了，这是对贸易发展的重大支持。现在已经进入“中巴经济走廊”的第二个阶段。“中巴经济走廊”走过了四年的时间，在许多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农业、工业化、出口、人口、发展，都已经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的重要指标。

回顾第一阶段，巴基斯坦已经受益良多，第二阶段要加强基础设施、工业化还有其他项目的发展，这是中巴之间的双边项目，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只有两个国家参与的项目。在地区连接方面，巴基斯坦也是有责任的，这不只是一种双边的协议，这是一个地区性的协议，很容易向其他国家扩展。像中亚国家有“中亚经济合作联盟”，这个联盟里面，中国、巴基斯坦都是会员，在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中亚国家。

中巴之间有很多连接的方式，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阿富汗，阿富汗是中亚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中巴还有中亚国家都非常关注阿富汗的局势。而且，伊朗也有可能加入其中，构建相应的合作模式。因为我们在瓜达尔港是有合作的。现在中伊之间有 600 亿美元的合作，中巴经济走廊可以成为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过渡，从而加强三边经贸合作。

此外，土耳其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合作有兴趣。比如说 RCD，现在已经成为 ECO 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都参与其中，都是会员国。可以拓展土耳其加入，阿曼也可以加入，因为阿曼和中国也是有战略合作关系的。阿曼的石油有很多出口到中国，港口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中巴经济走廊”有非常多的潜力，可以连接很多国家，成为中亚的门户。与其他地区的伙伴合作时，“中巴经济走廊”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 IFF 峰会 (2)

投资能力是一国金融核心竞争力 方风雷, IFF 理事、厚朴投资董事长	124
强化金融监管协调, 促进资本市场开放发展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原行长	126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创新和新未来的几点看法 聂庆平,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	128
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和变化 马丁·谢克, 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CEO	130
自律引领基金行业发展和对外开放 陈春艳,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	132
全球资本环境与巴基斯坦金融发展 法尔汗·塔利布, 哈比银行公司总裁兼 CEO	134

# 投资能力 是一国金融核心竞争力

■ 方风雷 / IFF 理事、厚朴投资董事长



方风雷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长期低增长、低通胀、高负债的新常态，金融市场上收益率正日益下行。目前，全球将近 30% 的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欧元区负利率债券占 60%，日本更是达到 75%，全球共有 16 万亿负利率的债券。我们处在一个长期低息环境下，要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收益变得越来越困难。各国政府都对国家公共财富如何保值增值分外关切。长期低收益和财政收入减少是目前各个国家，包括保持最高增长的中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也都出现了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能力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在这方面，我认为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学习。它在投资领域的前瞻布局和骄人业绩鲜有国家能出其右。西方媒体称新加坡为 15 世纪精明之城威尼斯的 21 世纪缔造者。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通过设立金融管理局、淡马锡、GIC 三大政府投资主体，对国家财富进行管理。

如今，这三大主体每年上缴投资收益贡献该国 15% ~ 20% 的财政收入，这基本上是一个固定比例。超过公司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成为国家财政单一最

大收入来源。2019 年 1 月，淡马锡总裁何晶说，如果没有三大投资主体每年上交的投资收益，政府很久以前就要调高税率来投入到社会开支中。奠定这套国家财富管理体系的是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的吴庆瑞博士，吴庆瑞也是当年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决定的中国国务院聘请的一位经济顾问，长达 6 年时间。

我认为他所建立的这套体系，最值得称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储备资产管理的收益性。早期储备资产投资理念认为，安全性、流动性至高无上，因而大量购买发达国家国债，甚至直接以现金形式存放，而收益率则往往被忽视。不少新兴国家被这种传统观念束缚，加上自身投资能力薄弱，陷入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新兴国家通过出口引进外资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大量投向低收益的发达国家债券，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吸收这些资金，投资新兴市场高收益领域，可赚取 3 倍以上回报，形成奇特的国际资本循环。

吴庆瑞博士不拘一格，他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看得很清楚。新加坡独立后，他便在财政部专门设立海外投资部，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投资的收益性，开创性地将储备资产分为两类：一类是货币储备，另一类是非货币储备。前者需配置高流动性资产，后者则可开展长期较高收益的投资。对投资收益的高要求也令其投资能力快速精进。20 世纪 80 年代成熟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是他的投资首选；到了 90 年代，投资区域从成熟市场拓展至新兴市场，并将范围延伸至另类资产，包括公司股权、基础设施、私募基金；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过去投资者普遍信奉的所谓黄金配置定律——60% 债券、40% 股票走下神坛，全球机构资金从公开市场流向另类市场这一收益高地。新加坡机构走在前列，常年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淡马锡，将超过 40% 的资产配置另类资产，GIC 与 100 多家投资基金开始合作，2008 年以来趋势特别明显，基本公共财富每年以 9% 的比例转向另类投资。

除新加坡以外，像加拿大的社保基金，比如 CPBIB，它的另类投资占比已经变成了 45%，目标是超



过 50%。这么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流动性神话已经不存在了，购买所谓公开市场流动性产品的都是同质类投资者，行为与周期性产品表现挂钩。一旦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全球谁也跑不出来，其实没有流动性，而这种产品一开始就没有高收益性。

第二，它们设置独立机构专司长期投资，采用市场化的公司治理和投资机制。考虑到流动性管理和长期投资所需的专业能力迥异，吴庆瑞博士于 1981 年创立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这种独立机构模式优点有二：一是与政府保持一臂之距，保持一个距离，最大限度避免短期政治因素对长期投资的干扰。二是独立机构比政府行政机构更市场化，更适合构建传统政府能力半径以外的投资能力，特别适合做另类投资。1974 年建立的淡马锡也是一家独立的投资公司，在治理结构上，淡马锡的日常经营由新加坡财长而非新加坡财政部主导。新加坡财长领导的董事会自主管理淡马锡公司。成立至今 45 年，淡马锡平均年回报率 15%，管理资产规模由最初从财政部接手时的 3.5 亿新元翻了 890 倍，达到 3130 亿新元。

第三，新加坡政府发挥政府集中管理的优越性，以投资撬动经济、产业，包括外交和民生。新加坡政府通过对财政储备、外汇储备、中央公积金、国企上缴利润，四大公共财富的集中管理，将有限资源集中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吸引其他国家基金，形成小国大金融的特殊现象。此外，GIC 除了负责储备资产管理，还肩负中央公积金管理，大量投资本地基础设施，既支持实体经济，也为公积金提供稳定回报。新加坡通过投资也加深与其

他经济体的往来。

例如 1995 年 GIC 作为境外股东之一，与中国建设银行等机构共同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银行——中金公司。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兼 GIC 董事长的李光耀先生对此事十分支持，1995 年 4 月 10 日上午，当时我们陪中金公司高管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当天李光耀先生接见全体董事。他说，我为什么要参加中金公司入股仪式？这是因为新加坡必须要跟一个亚洲最有潜力的大国连在一起，其经济发展才有广阔空间。他们取得非常丰厚的回报。

另外一个现象，1993 年以来，新加坡连续 6 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国。新加坡在投资领域的成功证明了投资能力是一个国家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投资性收入是可以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发挥支柱性和战略性作用的。相信新加坡的经验能给我们人民以启发，其投资实践值得我们观察和学习。

## 强化金融监管协调， 促进资本市场开放发展

■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 IFF 副主席、阿联酋中央银行原行长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资本市场是股票、债券、OTC 等进行交易的场所，如果再加上货币市场的工具，资本市场的概念就会升级为金融市场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

资本市场能发挥非常重要的功能，让实体经济能够获得融资，当然主要是来自本国的资金。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金融服务使所有人，自然人也好、法人也罢，都能够获取全球资本市场中的资金来源。所有主要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只要有有效的支付体系，他们都可以参与并融资，有时通过中介，有时直接参与。

资本市场的开放是非常必要的，有了开放的资本市场才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尤其是中小型经济体。但开放性仍然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尤为如此，这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司法的体系不同以及有没有充分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例如，是否有比较先进的投资银行、中介机构、金融服务顾问，以及更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不同基金的存在。

从资本市场整体来看，它们必须要不断地进化，不断地改进，在每个司法辖区都是如此。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尤其是要给年轻人提

供就业的机会。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企业无法发展，经济无法增长，也就没有办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同时，资本市场必须要更加开放以及更加包容，并鼓励不同的融资者在市场中共存，尤其是那些小的初创企业。他们会非常需要我们格外去关照，提供给他们不同的资金来源。例如风险投资和共同基金等。

对于小经济体而言，资本市场的创新性没那么重要，但它必须要有效，尤其在执行规则时要非常严格的。这容易理解，公平环境和透明度对于小企业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政府的角色在资本市场上也非常重要。在资本市场上，企业当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发债和发股的企业必须要得到充分的重视，也需要独立的中介机构。他们需要在行业内拥有非常好的声誉，并且坚持和遵循很高的严格标准；但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资本市场也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个支持就是在存在违法违规的时候，必须要有严格的惩罚机制。

此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有一个独立的债券市场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债券市场会提供一股新的推动力，促进发债，尤其是那些符合资质的公司的发债。与此同时，债券市场还能够为政府所用，政府的机构可以利用这种市场来支持政府提出的一些商业举措和创意，这对于创造就业机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债券市场能够带来一些机会，给个人和小型的企业一个投资的机会，使得他们盈余的资金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并且在危机时形成新的力量，使得我们的经济体的韧性进一步增强。这一点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未来的全球资本市场，我认为全球化的融资对于跨国大企业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对于主权基金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现在人们不一定对这些风险很大的创新举措有那么大的兴趣，投资者并不



希望看到 2008 年的危机重演。我们当然欢迎金融市场的创新，但前提条件是这些创新必须是能够达成某一种经济上的目的和宗旨，并且监管机构要对于它们非常了解，高层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金融机构的高管要对它非常熟悉。创新如果风险太高，那是不会被接受的。比如说 2008 年上半年的一些所谓的创新举措就是这样。

进一步来讲，当前资本市场的互通性其实很强，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跨市场上市、上市企业之间互相持股、跨国投资经营等现象。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挑战。举例来说，风险随着全球化也可能从一个市场传递到另外一个市场，再扩散到其他市场，进而影响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的金融市场如果互相之间高度依存，那相应的金融传染就更为显著。

但是所有的金融市场风险都能够减弱，而这要通过监管机构之间更好的协调才能做到。在全球和地区层面都是如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上市企业及私营企业都要遵循严格而公平的监管和监督的机制。除此之外，报告机制、透明度也是我们应该在规章制度当中明文规定并且非常严格遵循的。

#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创新和新未来的 几点看法

■ 聂庆平 /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



聂庆平

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已经进入到全面开放的格局，中国有一句比较形象的话——“狼来了”。过去都说资本市场开放有可能是狼来了。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狼真的要来了。现在的开放是全面开放，是一个“双开放”的格局。第一是在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业，比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甚至包括私募基金公司和投资顾问公司，将会 100% 对外资开放。按照证监会颁布的通知，2019 年外资持股可以超过 51%。2020 年就可能不止 51%，甚至可以到 100%，这是股权比例完全放开。第二，资本流动方面也基本上完全开放。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2012 年实行的 QFII，还有 RQFII（人民币境外合资投资者），后来又开了沪港通、深港通，还有沪股通，中日之间的 ETF，通过基金互认方式。将来国际资本流动进入境内资本市场的开放也可以预期。现在是全开放的格局，这是和以前不同的。

我们国家开放的路径和国外不一样，按照我的经验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1989 年以后，1990 年初，我们是允许中国企业到海外去上市，吸引外国资本。但是这个时候

的国际资本流动是有一条三八线的，只是从境外上市，让外国人投资可以获取国际资本。第二个阶段，2012 年以后，我们放开了 QFII 的制度，外资可以有管理地进入到国内，因为 QFII 有额度控制，外管局要进行审批，进行相应的管理。第三个阶段是现在，开放的力度更大，持股比例和进入渠道放开的幅度会越来越大、限制会越来越小。比如 QFII 的额度有可能很快取消。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包括其他地区实行 QFII 制度，基本上二三年以内全部取消了，所以说狼是真的来了。

在开放的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未来会不会有不稳定的因素？或者说它的趋势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其实美国金融的脆弱性和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将会是未来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和最不稳定的一个风险因素。我们国内对这个问题可能认识得不是特别清晰。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所积累的有毒资产并没有完全消化。因为美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救市的时候，用的是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购买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手中持有的大量类似 CDO 和 CDS 这一类的有毒资产，大体上是 3.5 万亿美元到 4 万亿美元。这 3.5 万亿到 4 万亿美元还在美国中央银行的手上，所以央行想缩表和退出都做不到，基本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十年了，这块有毒资产如何消化？这是美国金融体系中一个大的窟窿。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股市现在依然是在泡沫状态。因为它是靠人为推高的，特朗普上台之后，更不允许美国股市有一点下滑。有一天下跌 3%，美国总统命令财政部长给美国金融机构打电话，要去支持美国股市。按照我当时的统计，那一天支持美国股市的交易量大概投下去 340 亿美元的订单，所以这是美国股市的泡沫。

衡量股市泡沫的基本指标是市盈率区间和 PB 市净率的区间。美国股市从 2015 年以来到现在，市盈

率还是一路走高的。像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现在的市盈率基本接近 20 倍。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现在的市盈率在 38 倍 -40 倍左右；纳斯达克的 PB 应该在 4 倍左右，而像标普 500 和道琼斯基本上都是在 3 倍左右。从美国历史数据看，无论从市盈率的角度衡量，还是用 PB 来衡量，它都运行在危险的区间，美国自己把它定义为“危险区间”。

第三个是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现在更极端的提法甚至是“中美脱钩”。当然我们也看到，脱钩对全球经济不利，我们中国也不希望脱钩，希望能够合作共赢。如果硬脱钩，或者继续摩擦，我认为对美国经济的损伤可能更大，它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中美经济是互相依赖的，这一互相依赖也反映到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它们对中美的依赖因素就更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看到，美国股市的行业市值分布，信息技术占比 25%，接近 11.3 万亿美元；金融业在美国的市值分布当中，占比 14.46%，市值差不多 6.6 万亿美元；第三大类可选消费，美国的占比是 13.76%，是 6.25 万亿美元；再就是医疗保健占 11.88%，接近 5.4 万亿美元；其实工业能源和其他的占比就很低了。美国股市市值中最大的构成是信息技术，是苹果、微软这些公司，甚至包括亚马逊这些可选消费行业。这些行业对中国的依赖是最大的，美国的信息技术在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一定是中国。有一个统计，苹果手机海外销售量 63% 在中国内地，当然我们不谈其他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芯片技术，中国的消费占比很大。中美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带来美国经济的失速，就是失去目前这个速度。它相应一连串的反应会带来资本市场上的问题。资本市场上的问题又会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甚至有可能出现美国的暴跌。

我觉得未来全球需要关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

对资本市场坚持开放、不断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教训，我们需要关注的两种可能性。大家在谈外资开放的时候，更多谈的是鲶鱼效应，能够推动竞争。其他新兴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历史经验有两个：其一，开放效应更多的不是鲶鱼效应，实际上是鳄鱼效应。金融业、服务业全部开放以后，外资有强大的竞争力，尤其是美国有强大的竞争力，基本上把本土的金融机构打败了。1990 年我在香港搞

H 股时，那时接待我的投资银行都是英资的，BJW、巴克莱银行等等。1992 年中国推出 H 股以后，美国投资银行发现这是一块巨大的市场和肥肉，所以美国的投资银行大肆进入香港。所以你们现在到香港看到的投资银行大多是美国的。日本、韩国更不用说，都是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防止鳄鱼效应的发生。

其二，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也可能带来影响。外国用文明的词讲叫“摘樱桃”现象，就是中国人讲“薅羊毛”的现象，如果用中国 A 股老百姓更通俗的说法叫“割韭菜”现象。国际资本是割韭菜的，投资风格是割韭菜的，在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是有割韭菜效应的。

大概有两个统计数据，第一个数据不太准确，但我从有关报道看到过，2012 年我们实行 QFII 制度，在 2015 年股市发生重大的异常波动之前，从 QFII 陆续进来 1200 亿元人民币，后来在当年就撤出了 A 股市场，拿走了将近 1700 亿元人民币。现在股市这么不好，但是外资却陆陆续续地大量涌入。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到 11 月 15 日，通过沪港通和深港北向资金抄底 A 股的净买入额累计加起来大概 8800 多亿，在持股的市值将近 1.3 万亿，A 股股市不好外资还能赚钱。当然外资成分比较复杂，人家确实是从境外流入境内的，账面资产是这么多。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是提倡价值投资。如果要价值投资，那么第二个现象值得关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割韭菜”“摘樱桃”的问题。

这是我们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的两个风险。

# 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和变化

■ 马丁·谢克 / 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CEO



马丁·谢克

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企业 80% 的融资都来自资本市场，而非银行；欧洲大约处于中间水平；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来自资本市场的资金占比大概是 20%，银行的资金大概占比 80%，是相反的一个状况。所以政府需要尽力去促进来自资本市场的资金，打造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减轻银行业的负担，允许资金在国境内外更加自由方便地流动。

回顾美国与欧洲市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上下浮动程度非常大，它们受到很多新问题的影响，几乎不断地接受来自各个来源的大规模资金，尤其是来自政府各机构的资金。我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驱动这些非常积极的资金流入债券市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三个主要的驱动因素。

第一，宏观经济环境。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就是低通胀、GDP 的增长幅度减缓，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央行货币方面的宽松。同时，也带来了对市场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量化宽松，也就是说央行大量收购债券，然后将现金引入到我们的

经济体当中。对于市场来说，这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终方案——大量购买债券。

第二，银行更重视流动性和安全边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市场，可以说在过去十年来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因素就是，金融危机之后，在巴塞尔公约下，银行都希望能够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资金，并且希望能够承担得住更大的压力，对自己的流动性更加重视。如果再有一轮经济危机的话，希望政府不需要去救市，尤其是不需要去救银行，银行可以通过自己的自有机制来度过这些危机。

从一级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区别来看，我们看到比较大量的相当低利率的资金注入，同时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尤其是对二级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二级市场的交易量在过去十年当中不断地在下降，交易的手续费事实上已经把债券收益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吃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级市场是在增长、二级市场是在衰退的状况。

第三，监管对于资本投资者保护的力度。尤其是那些小的散户需要得到保护，这个保护往往是要保护他们不受自己的愚蠢决定所害。具体地说，我们需要防止散户购买一些不合适的高风险产品，也需要从禁止机构发布和发行高风险产品的角度来着手。

当前，全世界各地都是利率超低的一个情况，欧洲可以说是最极端的案例，日本 20 年来也一直是超低利率的。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日本跟欧洲相比反而是一个高收益率的市场。我们看一下十年政府债券，德国的十年政府债券目前是负 37 点的利率在交易。我们再看一下极端的情况，比如瑞士联邦债券，负 1.25% 的收益率。所以他们都改变了市场当中投资的结构，投资的本质受到了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还改变了收益率或者说是利润，银行业的收益结构也因此受到了影响，银行也就不是那么愿意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投资，这可以说是这个行业遇到的最根本的变化。

目前这些低利率产品对于投资者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投资者现在是在寻找高收益，他们发现想要

用十年前购买的产品得到同样的收益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他们需要扩展范围，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关注更广泛的信贷评级，现在他们会去考虑 BB 级的或者是更低信用评级的产品。人们开始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的市场中会不会有泡沫正在产生呢？

另外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是人们开始沿着利率曲线向右走。投资者做好了准备，放弃流动性，而投资于那些两年到五年到七年期限的产品，这方面的交易量也在增长，有大于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 100 年期限的债券。此前从来没有发行过这么长期的企业债券，主权债券现在开始有了，有很多国家本身只有 70 年的历史，他们如果去发行这样长周期的债券，到底是不是件好事情？我们需要思考。

此外，超低利率降低了投资者的品质，尤其是在高收益率以及跨界的市场当中更加明显。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有金融方面的保护机制？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去看一下需求的深度，以及人们去追求收益率的努力，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供这样一个金融的保护机制？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都需要考虑的市场问题。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对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例如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我们的确看到资本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分裂情况，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市场都应该在同样的规则之下，用同样的方式去运行，但是我们希望市场在全球能够达到相对的一致性，这样资本才能够不断地在市场当中流动。现在资本市场也有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抬头，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是目前全球市场当中一个令人遗憾的趋势，是我们必须要密切观察的。

还有一个会影响到中国趋势的就是全球监管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视治外法权，七八年前我们讨论美国市场的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治外法权情况都是来自欧洲的。我们会发现很多欧洲金融市场当中的规章制度也是有治外法权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的全球市场交易带来了一些额外的阻碍。

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主题投资。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目前 ESG 方面的投资，人们更重视绿色金融，更重视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看到 2007 年开始的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举例来说，世界银行在 2007 年发行了第一批绿色债券。中国在这方面绝对是领军国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有全面规章制度来管理这个领域的国家，尤其是绿色债券市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中国都是非常大的绿色债券发行者和使用者。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市场怎么样发展。在

西方国家当中，主要是由投资者的需求来促进的，有很多投资者会举起手来说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要有越来越多的绿色金融产品。在中国，这个流程相对是有差异的，它主要是由政府的高层从上向下驱动，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想要落实新的产品和新的规章制度是更快也更容易的，因为它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很多新的规则和新的变化在其他的经济体当中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会让人们花多年时间来不断地进行讨论，也不一定能够落实，但在中国可以很快落实。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低估的，这是目前资本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在未来会看到这个趋势进一步变得更为显著。

西方世界，我这里不算美国，因为特朗普并不相信气候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多数西方国家，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政府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在长期来看，气候风险和金融风险被看作是同等的重要，所以很多央行也在越来越多地关注绿色金融产品，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它是一个机会，但同时对于那些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因为在今后，他们再想加入这个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另外一个此前没有涉及的大主题是互联网金融，中国在这方面也是领军的国家。互联网金融并不是我们应该害怕的一件事情，它应该是能够赋权和赋能的机制，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使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加有效果、也有效率。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式去看它，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互联网金融的应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改变资本市场价值链当中的部分环节。举例来说，一级市场其实是有一点落后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当中有很多应用，另外还有很多在抵押市场当中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使用，所以这是一种类型的创新。另外一种创新可能更加有意思，就是应用互联网金融能够完全改变交易过程，改变现有价值链。在未来，投资者、发债行和发股机构，可以使用这样一些应用程序规避现在的市场流程当中由中介带来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不断地密切观察的事情。

# 自律引领基金行业发展和对外开放

■ 陈春艳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



陈春艳

基金行业发展得比较早，2018 年是基金行业成立 20 周年。基金行业从对外开放方面来讲也是排头兵。在 2012 年时，基金行业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到目前为止，基金公司当中有 44 家已成立合资机构，250 家外资私募、创投是 100% 的外资持股比例。总而言之，基金在整个金融市场开放中是排头兵的角色。

具体来说，2016 年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快，很多知名的私募机构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比如瑞银等 22 家私募机构已经登记备案，为资管行业增添了新的色彩。

在开放的路径方面，从 2018 年开始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断在加大。第一，市场准入在快速加大力度，也就是说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就放开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准入。第二，QFII、RQFII 在征求意见稿中把投资范围已经扩大了，包括私募投资都在投资范围之内。另外，互联互通机制也十分踊跃。对外开放政策是不断加快的。目前资本市场非常有活力，对境内、境外机构都是非常吸引力的市场。

第二，在经济转型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创新资

本的形成。目前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提出这样的思考，在制造大国提升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的改革。经济的创新离不开创新资本，传统的融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创新资本的形成。因为很多创新企业，早期风险比较高，投资收益可能还很难显现。按照传统经济融资的方式，很难给它提供融资资本。私募股权会是非常好的渠道，能给它们提供融资。目前来说，从我们一级市场来看，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对境内外股权投资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在低利率时代投资股权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益。

从二级市场来看，在基金业，防范金融风险是我们的攻坚战之一。经过近几年去杠杆、防风险，在资管新规的背景下，很多风险不断释放。投资尤其是股票市场，它的风险已经释放，价值投资理念也在不断显现，二级市场也有很可观的前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上的资金比较踊跃。这是从两个市场来看的分析。

第三，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在建立。2019 年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是科创板的设立，这确实是资本市场的头等大事。科创板也是今后注册制改革的一个试验田。非常荣幸我本人是科创板的上市委员。从私募基金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截止到 11 月 8 日前，有 175 家企业申报科创板，有 51 家已经上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这 51 家上市企业中，48 家前期有私募股权进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做股权投资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财富效应，也为今后投资市场改革，包括新三板的改革，深交所中小板块注册制的改革，对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为私募股权投资打开渠道。

在走出去方面，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我们统计的私募股权基金中，有很多私募股权已经融入到“一带一路”资本市场。但在融入过程中，其实也需要跟当地的资管行业有紧密融合。这是从“一带一路”推进的角度来说的，从境外资本市场或者二级市场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来说，它们的愿望也是非



常强烈。我在协会分管国际业务，其实每年都会带团去相应国家路演。2018 年我们到了美国，2019 年我们去了英国和德国。我自己非常有感触，十年前我带团去，很多境外机构对我们不是很感兴趣。这两年我感觉有变化。参加类似论坛会议之后，很多境外的知名机构都欢迎我们到他们的公司去座谈、交流。我们每天基本跑六七家，从早上跑到晚上。这令我们非常感动，他们非常热情，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是对我们的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开放的。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年轻，只有 30 多年的发展历史，国外的风险管理、投资策略，包括市场研判，包括投资者教育，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 ESG 理念，从 2016 年年底开始，我们在做 ESG 理念。这个理念刚开始时，行业人员不太清楚，通过协会跟国外知名的机构，包括世行、联合国组织联系，开展交流、培训，目前 ESG 理念在我们行业深入人心。当然到具体操作落实中还有一个过程，但这种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又比如从长期投资角度，我们也跟境外的养老金机构联系，给行业做了很多培训。在中国，投资者不成熟，可能很大程度在于长期投资的理念没有树立起来。

总而言之，对外开放是双开放，我们希望境外知名机构走进来，我们也想走出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作为一个自律组织，通过这些自律规则，在我

们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公募机构都更自律。我们通过自律规则引领行业规范性地发展。在对外交流方面，我们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作为对外窗口，希望跟很多的国家和资本市场签订 MOU，发挥桥梁作用，增加双方的交流。

# 全球资本环境与 巴基斯坦金融发展

■ 法尔汗·塔利布 / 哈比银行公司总裁兼CEO



法尔汗·塔利布

在未来几年,我们应该关注影响全球资本环境发展的几个因素。比如说,宏观经济环境。预计 2020 年全球 GDP 增长速度会放缓,将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全球股市已经是连续十年的牛市,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在加大。但货币政策空间的效用可能会越来越小。国家想市场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的话,调节宏观市场时就必须依靠更多的其它工具。另外,新兴资本市场正变得更加成熟,例如上海、孟买等。体量也变得更大,加上新加坡市场,这将会给东南亚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过去四年中翻了一番。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世界第三,企业债券市场是世界第二。中国绿色金融也发展很快,我们非常有幸与马骏博士(清华大学学者)一起合作,在巴基斯坦建立相应的绿色金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绿色金融从零到有发展很快,并很快就完成了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2018 年,中国绿色债券已经超过了 2100 亿元人民币,每年以 3% 的速度增长。巴基斯坦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很大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 QFII 和 RQFII 这些机制在未来

将会更加开放,而类似的开放也会在中国市场的其他领域进行,比如债券市场,很多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都可以进行更加自由的投资,这些趋势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当然,谨慎地开放金融市场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不仅限于中美两国,其他的贸易区域其实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另外,美国和欧盟也有贸易争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抬头,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除了贸易之外,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可能受到这股逆风的影响。

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巴基斯坦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能够给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带来一些启示,我们将会扩大资本市场,更多的融资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从而摆脱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银行信贷的现状。总之,我们跟其他的新兴市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巴基斯坦的银行市场也在不断进步,他们现在配置更多的资金给基础设施项目。一些主要的银行从“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受益良多。差不多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已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入巴基斯坦。我们现在也希望更好地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想在这两方面有所收益。我们希望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能够让巴基斯坦政府发行和中国熊猫债类似的政府债券。

## IFF 峰会 (3)

<b>金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b>	136
李东荣,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b>中国在金融科技变革中起引领性作用</b>	137
安雅山, IFF 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埃及规划部前常务副部长、ENInvestment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b>虚拟货币在社交网络中的运用</b>	138
舍尔明·沃斯米吉尔, 维也纳经济大学加密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b>湖州运用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的探索和实践</b>	139
潘春晖, 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b>区块链技术在碳市场的应用展望</b>	141
葛兴安,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	
<b>将金融科技应用于可持续发展</b>	142
余晓文, 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高级顾问	
<b>全球区块链已进入 3.0 时代</b>	143
朱大卫, DKB 产业基金合伙人	

## 金融科技发展的 新趋势

■ 李东荣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目前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的作用价值和原则等共识已经逐步形成。

在金融科技刚出现的时候，可能全球各国对它的看法还是不太一致的，有的审慎观察，有的不以为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和国际金融组织，对金融科技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9 年 6 月发布了一项基于全球 95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金融科技的潜在价值，并且开始在国家层面实施相关的战略，力求通过金融科技的手段帮助各行各业提升融资创新和应用的能力。有超过 60% 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已经将金融科技纳入国家的普惠金融战略。

第二，金融科技的生态合作和场景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

随着科技的进步，金融业的分工日益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经营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延展。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相对单纯的外包合作关系发展为业务、数据、技术、基础设施等多方面

多类型的关联交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互联互通，这个作用在最近表现得比较突出。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和 BAT 都有相互的合作，是很生动的例子。

第三，金融科技监管的框架、政策、工具和体系，持续完善。

各国在重视和发展金融科技的过程中也注意到，金融科技虽然能带来经济社会的效益，但同时也会带来业务、技术、网络、数据等多重风险。这些风险有叠加效应和扩散效应，所以它对各国的金融监管和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点各国应该越来越清醒认识到，要重视发展监管科技。通过监管科技使金融科技得到更有效的发展。

第四，金融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全球协同治理更加迫切。

目前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议题，各国在金融科技的产业对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经验共享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交流需求，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通过 IFF 把各方对金融科技国际交流与协同治理的需求，更好连接起来，促进金融科技在全球得到有序和有效的发展。

## 中国在金融科技变革中 起引领性作用

■ 安雅山 / IFF 理事、埃及投资部前常务副部长、埃及规划部前常务副部长、ENInvestment 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安雅山

我想讲一下金融科技的应用。现在，一些国家已经将金融的包容性列为发展目标。比如说，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只有不到 20% 的人口是纳入到银行体系当中的，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人没在银行服务体系当中。埃及人民习惯使用现金，想要把他们纳入到银行体系当中，还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在过去的 3 至 5 年当中，阿拉伯国家金融科技的投资越来越多，尤其是在 2015 年之后，有两亿的投资，尤其是在 GCC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国家。金融科技投资的风潮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共存。

比如支付方式、财富管理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挑战，问题是阿拉伯国家的银行和政府，其基础设施和科技应用还不够完善，在引领潮流、应对挑战方面会遭遇很多困难。

中国在金融科技变革当中起着引领性作用，但实际上在银行体系中，仍然可能会出现跟不上时代步伐

或者政策不匹配的情况。对于政府来讲，引领金融科技创新和变革，需要发布和推动实施更多新的政策。

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实际上还是需要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让金融科技发挥更好的作用，需要一些基金或者资金去支持技术创新。但实际上，现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量非常少，而且通常资金只能投入某些领域当中。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带动下，能够共同推出一些框架性的管理办法来帮助不同地区的国家，让金融科技得到更好的应用。否则当你落后的时候，机会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目前看来，金融科技领域还有广泛的合作机会和应用前景。

*中国在金融科技变革当中起着引领性作用，但实际上在银行体系中，仍然可能会出现跟不上时代步伐或者政策不匹配的情况。对于政府来讲，引领金融科技创新和变革，需要发布和推动实施更多新的政策。*

# 虚拟货币 在社交网络中的运用

■ 舍尔明·沃斯米吉尔 / 维也纳经济大学加密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舍尔明·沃斯米吉尔

我想讲区块链，区块链有些时候会被误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回顾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一代网络把所有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靠的是一种网络计算机语言，在当时这是革

命性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人们创造了互联网，但并不知道互联网能够为世界做什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互联网的技术，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它、利用它，现在互联网已经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几十年之后，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平台经济时代，人们开始思考在网络上面到底能够做什么，互联网可以让人们用一套算法、几行密码就创造出区块链和各种虚拟货币，用几行代码就可以创造很多重要的工具。

我们使用几行代码，就可以推出一个新的 TONKEN。什么是 TONKEN？它首先是一种货币

机制，可以用来帮助人们管理资产和日常支付。其次，TONKEN 可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比如说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好的话，我们就会用 TONKEN 来奖励。TONKEN 可以追踪和交易，我们现在有 2500 个 TONKEN。TONKEN 类似于比特币，它其实是一种合作的体系，可以打造和提升这个网络的信任度，也可以用 TONKEN 来加强社交活动。Facebook 的 libra 也可以进入到这一个体系，他们并不仅仅是想要推广 libra 这一支付体系，更多的是他们也发现了这个虚拟货币背后的价值，想要进军这个行业。

在维也纳，我们与维也纳政府共同合作，使用区块链技术和 TONKEN 代币来奖励参加减排计划的维也纳公民，让人们更主动、积极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建立了一个系统，打造了一个 APP，如果人们不使用汽车的话，他就可以赢得这些 TONKEN 并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传统的货币没有办法激励人们，我们可以用 TONKEN 这类虚拟货币，来完成传统货币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时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传统的货币没有办法激励人们，我们可以用 TONKEN 这类虚拟货币，来完成传统货币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 湖州运用金融科技 推动绿色金融的探索和实践

■ 潘春晖 / 湖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潘春晖

我代表湖州市金融办，从政府和基层探索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一下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中的探索实践。湖州是国家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着力于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金融科技计算，探索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湖州推出的绿色金融项目，主要由湖州三个金融管理部门发起，包括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和银保监局，三个部门分别牵头打造了三个绿色融资主体系统：认定评价系统、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绿色银行监管评定系统，分别对应事前绿色认定、事中统计分享、事后绩效评价。

金融工作办公室牵头打造绿色融资主体认定评价系统。精准识别绿和非绿，防止刷绿，洗绿等。为了帮助金融机构提升绿色能力的建设，由湖州市金融办牵头，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编制了全国首个地方信用绿色融资主体认定评价规范，包括绿色融资企业和绿色融资项目，在此基础上开发成一个系统，简称为绿信通。它实现了绿色认定评价的精准化、自动化、可视化。

精准化，就是评价规范设计的 4 个评价维度，30 多项评价指标，100 多个认定依据，全部编入系统，金融机构依托该系统，可以实现傻瓜式的操作。

自动化，就是通过与政府近 20 个部门的信息共享，打通 50% 以上数据，实现自动抓取、自动判断、自动打分。

可视化，以打分卡的形式，直观显示平均数据和预测等级。

绿信通操作比较方便简单，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一、准入层。

从环境表现、亩均效益等级、亩均的产出等多个维度，将列入重大环保处罚、安全生产黑名单的排除在外。根据亩均产出定位，认定绿色企业和项目。

二、目录层。

参照国家有关部委绿色产业、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指导目录，结合地方产业政策，细化绿色指引目录，具体包括 12 个一级目录，111 个二级记录和 560 个三级目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落地性。

三、评分层。

借鉴国家通行 ESG 评分方法，结合地方可持续发展导向，构建 ESG 模型，将融资主体分为深绿、中绿、浅绿，分别给予融资利率 12%、9%、6% 的绿色贷款财政贴息补助。

人民银行牵头打造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可提高绿色信贷数据精准性，也是人民银行总行委托人民银行湖州市支行牵头打造的系统，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实施举措。

系统直接与商业银行、业务管理系统对接，获取绿色信贷数据。

二、逐笔校验。

系统提供每笔贷款的详细信息，包括存贷主体、项目、绿色认定标准、环境效益等信息，监管机构可根据信息进行巡检和驳回。

三、可视化展示。

通过管理驾驶舱和数据大屏，能够直观清晰呈现绿色贷款的规模、地域和行业分布、发展速度和趋势，绿色贷款和项目所产生的环境效益情况等内容。

四、环境效益可计量。



系统可逐笔计量绿色信贷环境效益和信贷余额变动后的环境效益变化情况。

五、统计口径，自动拉平。

这个系统里面有三套绿色金融统计标准，分别对接人民银行、对接银保监会、对接地方标准，自动取数，避免金融机构多重性数据报送。

目前全市 36 家银行机构已经全部接入使用，近期也向人民银行总行有关领导进行汇报，未来可能在全省、长三角，乃至全国进行推广。

湖州银保监分局牵头打造的绿色银行监管评定系统（绿银系统），是全国首个地方性绿色银行体系系统，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标准加弹性评分。

从组织管理、机制管理、流程管理、经营目标等四个维度，设置了 20 多项标准评级指标，详细逐条列明标准，维护评价的统一性，并设置了加分项、减分项及限制项等 11 项弹性指标。

二、定性加定量分析，为避免模糊评级，原则性评级是定量指标，占比达到六成以上。

三、评级加检测的配套，在按年进行绿色等级评定的基础上，还配套设置重点领域，包括重点绿色领域、绿色风险、绿色信贷、绿色运营等 4 套 308 个指标的监测体系，以便了解各家银行机构对重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环境

风险把控程度和绿色经营目标完成程度，及时进行引导和重点督导。

绿色银行评级结果直接与年度考核、现场检查、分支机构开设等金融监管内容进行挂钩，与银行参加政府型公共资源、招投标进行挂钩。

## 区块链技术在全球碳市场的应用展望

■ 葛兴安 /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



葛兴安

中国区块链技术在 2016 年、2017 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从 2018 年开始，中国开始考虑区块链技术在碳市场之中的应用。2018 年，在政府的支持、指导之下，深圳碳排放交易所对区块链在碳市场的发展以及碳市场全球连接中的问题，展开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到 2019 年的时候形成一个初步的研究报告，以下是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些基本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研究报告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认识到全球碳市场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碳市场数据的质量保证问题，涉及到现有的 MRV（碳交易机制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机制的启动导致的利益冲突问题，也涉及到全球范围之内，碳排放的双重计算的问题，碳排放数据的透明度、及时性等等。

（二）全球碳市场的连接问题。从传统的全球碳市场的连接来看，我们主要是通过主权国家或者实体之间的政治谈判来达成法律上的正式协议，来实现不同碳市场之间的连接。但是这种连接的方式，政治谈判的时间非常长，不确定性非常高，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掺杂其中，影响到整个谈判的结果。

所以需要建立全球碳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全球碳

市场，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碳的价格，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减排行动，所以全球碳市场的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三）碳市场的参与问题。刚才舍尔明教授谈到，利用区块链的技术，在维也纳做一些小型的、推动个人参与二氧化碳减排的项目。其实这就涉及到碳市场参与问题，因为传统的碳市场参与者主要是大型的企业和投资机构，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是很难参与进去的。但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其实在整个减排活动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研究报告第二个方面，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和碳市场的结合。

（一）能够保证上链之前的数据质量。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的防篡改、可溯源等特征，可以在数据质量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但是上链之前的数据质量，是大家经常追问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实时检测，通过大数据的对比等信息手段，来进一步保证数据在上链之前的质量。

（二）区块链技术怎么促进全球碳市场，能够以经济的手段连接起来，而不是以传统的政治谈判的方式进行连接。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对不同碳市场的减排效果进行分析对比。在全球范围之内，设定一个统一的基准价值，再反推到减排成本不同的碳市场去。

因为减排效果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是有一个相同的价值。正如二氧化碳的排放，每一吨在全球的任何一个位置的排放，对气候的影响是相同的一样，减排效果在全国范围之内也具有相同的价值，减排效果可以保证全球碳市场能够有效连接。

（三）通过区块链的技术，吸引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全球的碳市场里面来。比如说通过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和整个生态圈层的构建，吸引到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全球的碳市场里面来。

研究报告第三个方面，主要分析一些困难和障碍。比如说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局限性、算力问题、速度问题等等，当然也有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管理方式的争议问题，也有监管方面的挑战等。这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将金融科技 应用于可持续发展

■ 余晓文 / 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高级顾问



余晓文

作为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的发起方，我很荣幸告诉大家，其实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是一个由中国企业——蚂蚁金服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发起的国际性联盟。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企业与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共同发起的国际性倡议。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关注可持续发展与金融科技，或者叫数字经济，就是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更好地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同时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可持续发展领域。

现在全球达成的共识是关于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碳减排、低碳发展等等，其实都属于可持续发展领域。在联合国层面，秘书长本人亲自发起了一个专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利用数字金融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其实这个话题源于绿色金融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包括绿色金融在政策层面、在市场层面、在个人层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金融科技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从三个不同层面来看待。

第一是从政策层面。宏观公共政策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什么，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的现状是什

么。只有从全球、国家、地区层面了解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主要目标和优先事项之后，才能够懂得如何将技术、金融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相结合。

第二是从行业层面。金融科技对整个金融行业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领域，都是有着创新性的巨大影响的。金融科技有正面和负面的作用，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的发展。

第三是从市场层面。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金融服务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是否做好准备，比如基于现在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些实践，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是否准备好或者说足够了解他们在可持续发展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这对可持续性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金融科技可以应用于绿色债券，具体到债券市场或者绿债市场应该怎么样应用区块链技术，确保绿色项目募集资金得到正确使用，投资者能够放心对绿色资产、项目进行更持续地深入投资。绿色金融之所以快速发展和大家广为接受，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数字化方面，包括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服务成本降低，带动了整个债券市场向着更加可持续、低成本的方向去发展。

最后，金融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一方面，金融科技对于服务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带来运营层面的改变，会促使商业模式发生一些改变，包括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另一方面，商业模式的改变，又会促使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变化，比如金融科技本身具备的天然普惠性，可以促使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人群参与金融活动并受益。

## 全球区块链已进入 3.0 时代

■ 朱大卫 / DKB 产业基金合伙人



朱大卫

作为区块链从业者，DKB 产业基金专门做 FinTech 和区块链的投资，在这个产业摸爬滚打了两年，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在区块链投资里，关于供应链项目孵化上的一些看法。

回顾区块链发展的历程，区块链 1.0 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比特币的推出。经过 12 年的发展，可以说经过市场验证比特币是成功的。区块链 2.0 时代是以供应链、特别以太坊、US 这一类的供应链和智能合约的推出为标志性事件的，一些智能合约被应用到这一领域。现在全球区块链已经进入 3.0 时代，主要特征是开放式金融。中国把区块链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从区块链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明智且有远见的决策。

第一，在未来的区块链领域中国肯定有非常巨大的优势，体现在数字支付上，比如阿里支付，依托数字支付等，比其他国家的技术更先进。中国央行改革也非常明智，推出来 DCEP 数字货币，接下来会引导全世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而且中国整个国家货币都呈现数字化的趋势。

第二，整体上来看，全球处于一个金融改革的阶段，

中国开放式的金融格局，正好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

第三，除了区块链在金融方面的落地，更多的是要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促进实体经济和发展民生。

从一个从业者角度来看，整个区块链的发展有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短周期，区块链还是应该从金融产业开始落地，这样比较快一点，特别是可以解决金融领域一些数据共享难、信任程度比较高、交易链条比较长的各种应用场景。比如跨境贸易、跨境结算、外汇，在这些场景中会先取得一些比较大的成绩。

第二个周期，从中长期来看，所有的数字经济体都会被区块链重新改写，底层的数据隐私计算，会和人工智能、5G 技术等结合起来，搭建一个新的数字经济体的底层基础设施。这可能需要 5-10 年的周期来完成。

第三个周期，从 10 年以上的长周期来看，区块链的落地，会产生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包括商业模式、经济体的模式，以及交易模式。目前来说，在一些小的国家，成功案例比较多，比如日本、韩国，在区块链和 TONK 以及加密货币上的配合，整体发展是比较快的。

对于 DKB 产业基金来说，重点在于技术产业的培养和孵化、数据隐私以及隐私计算、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布局。

第一点，DKB 产业基金在应用方面，是和五道口金融学院合作，所以在金融产业的产业链条上有优势。

第二点，在对实体经济的理解上，DKB 产业基金参与者是很多实体经济的负责人，能够着重考虑将区块链和实体经济融合。

第三点，DKB 产业基金在区块链生产、数字资产交易、整体技术产业、监管部门等整个供应链中，在这两年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区块链技术在将来，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会面临几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区块链如何在各个产业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真正实现应用的落地，而不是只存在底层，或者只停留在基础架构和建设层面。

第二个挑战，区块链和整个监管体系的协同，比如



说中国各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监管体系如何去协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目前整个监管体系不太成熟，并且采取主动式监管的国家比较少。

第三个挑战，区块链里面会诞生新的商业模式，但目前真正看得到、得到市场验证的商业模式是比较少的，这就需要很多创业者、产业以及政府部门一起去推动和研究。

*区块链里面会诞生新的商业模式，但目前真正看得到、得到市场验证的商业模式是比较少的，这就需要很多创业者、产业以及政府部门一起去推动和研究。*



## IFF 峰会 (4)

- |                                 |     |
|---------------------------------|-----|
| <b>促进全球更大范围内实现碳定价机制</b>         | 146 |
| 洛朗·法比尤斯,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 |     |
| <b>加快启动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交易</b>           | 147 |
| 姜 洋, IFF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     |
| <b>加强中国碳市场机制建设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b> | 150 |
| 何建坤,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     |

## 促进全球更大范围内 实现碳定价机制

■ 洛朗·法比尤斯 /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



洛朗·法比尤斯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碳定价方面的重点。

首先，我们必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状况，而采取的行动有时候与《巴黎协定》要达到的目标有些冲突，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专家都认为，最佳的减碳方法就是给碳定价，而且这个价格要足够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刺激所有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一些综合的举措，减少排放。各种各样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比如在欧盟、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我所观察到的结果。

第一，碳价格本身。世界银行在 2019 年进行了预估，2020 年碳价格必须要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定价为 40 ~ 50 美元每吨。我们没有达成这个目标的主要原因就是碳价格太低，与《巴黎协定》相比，我们差了好几个百分点，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还有建筑行业、交通行业的原因，10 欧元每吨的价格实在太低了。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一旦讲到价格，问题就会非常复杂。价格会因很多的变量而被影响，要实施“碳地板价”和“碳天花板价”，这些都是由各个授权机构设立的，这也是让碳定价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公共机构在进行碳定价时要有个长期的机制，即二

氧化碳排放值，包含所有的产业和各个方面，我会与大家再分享如何更好地通过价格机制和杠杆调节市场上的碳排放。

第二，竞争力。碳排放定价从零到非常高的价格是不同的，比如乌克兰是每吨 1 美元，瑞士是每吨 120 美元，欧盟是小于 11 美元，2018 年是 11 美元，但是现在增加了，有的已经增加到 25 欧元每吨。所以不同地区碳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就让我们在这方面拥有了更多的竞争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从没有碳价到低碳价格，都希望更好地做碳的跨国税，即把碳排到其他国家可以收税，这个想法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和关注。对于制造业来讲，如果要做跨国税，可能会跟国际法规之间有一些冲突。一些单边主义的声音会带来挑战，也要帮助支持一些国家制定碳定价的工具。

2019 年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讨论了碳定价的管辖区提供技术支持的问题，碳定价的金融支持以及碳企业的转型支持。气候变化是全球都关注的很严峻的问题。2019 年 9 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也进行了一些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和讨论。很多气候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支持碳定价战略，碳定价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对整个国家的收入会有影响，但是对另一些国家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有一些国家不愿意接受甚至拒绝，因为这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收入。

所以，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碳定价的作用，从思想上给他们支持，从技术合作上给予支持，让他们既能实施碳定价，同时又保护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提升他们的收入。例如，在中国西藏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这个农场的项目就实行了低碳排放，农场实现低碳排放一定是根据碳转化的规律。另一个例子是在瑞典，20 世纪时他们有一个自由税，这个自由税有时候缺乏能力和资源的支持，尤其是在欧盟的一些委员会上。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鼓励支持这些国家进行好的转变，对碳定价问题进行集体创新，采取一些行动，缓解气候变化的规模，一定要有更大的雄心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碳定价。

## 加快启动全国统一的 碳市场交易

■ 姜洋 / IFF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



姜洋

根据中国这些年来碳排放的做法，谈谈我的观点。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建立碳市场是推进绿色发展的有效手段。

第一部分，碳市场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从 1995 年开始，从京都议定书到后面的多轮会议到巴黎协定，中国坚定地赞同在这几个协议上达成的共识。

加快实现绿色发展转型，对中国经济本身来说，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不仅是全球需要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污染是非常严重的，这些年努力以后，我们也看到北京蓝天白云增加了，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见效了。

具体来看在哪些方面呢？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绿色发展，第一是单位 GDP 的排放程度比 2018 年下降了 46%，第二是减排的二氧化碳下降到 40% ~ 45% 这个目标已经达到。我经常在中国各地旅行、开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跟十年前相比，空气的清洁程度大大增强了。当然离目标还有距离，但中国的努力，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切身的感受，不仅仅停

留在数据上。

我们还有一些环节需要考虑。碳排放是大气温室效应的重要源头，控制减少碳排放才能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导致化石能源燃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控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促进新能源的产生，能够在这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0 月份我去中国几个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了调研，现在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车占到全球新能源汽车的 50%，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在这方面减少了化石能源的排放。中国企业还在继续努力，但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电池过大、可持续续航能力不足等问题，现在中国有将近 200 多家新能源汽车正在这方面不断探索。控制减少碳排放对节能减排有直接推动作用，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战役，是中国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的集中体现。

碳排放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是外部性引发的，中国有句古诗“一枝红杏出墙来”，红杏是栽在院里的，但是院外的人也能看到，在经济学上讲这就是“外部性”。我们污染的根源在上头，但是受害的是下头，所以要解决污染的问题，就要把社会成本和个人、企业的成本结合起来处理。建立碳排放权市场，就是要解决外部性外溢导致无辜的人受害的问题。用市场的方法、价格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市场和一般的自由市场还有区别，一般的自由市场是卖商品，商品在市场上随行就市，但始终是个既定的物理形状可见的商品。而碳排放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产品，额度设定以后，用额度的分配产生交易。额度分配多少与一个企业的需求多少是相关的，如果要多排放就得买额度，少排放就少买额度，有结余的额度就可以拿出来卖。政府用政策进行配额管理，由法定权力产生的产品和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市场的建立，可能要经历与一般商品市场交易不一样的过程。通过碳市场交易形成碳排放权的价格信号，让高排放的主体付出高排放的成本，激励社会资本向低碳科技和低碳项目倾斜，可以提高减排效率，社会成本比较低，激发减排内生动力，这是比较好的公共政策工具。

建立公共政策工具，与市场之间的相融性有关。欧盟是建立碳市场最早的地区，美国是区域性的，比如加州就有，中国在多年前靠在七个地方搞试点做起来了。国际碳市场建设的情况，比如一些地区像澳大利亚、印度也都有。从 2005 年到 2018 年之间，市场的变化是在 2005-2011 年发展得非常快，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市场的碳交易就突然下降了。金融危机以后，很多金融机构持有的碳配额就降下来了，欧洲、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处于下行状态，对碳的需求减少了，所以市场就逐步往下滑，最明显的就是 2012-2019 年这 7 年缺少流动性，对经济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们在内部进行总结，这个市场发生了变化，再分配额度或者向市场投放过多配额，供过于求，市场上的企业萎缩了，需求又小，供应增加，价格就往下跌，2012-2017 年就出现了低迷时期。2018 年以后，欧盟把控排的范围扩大以后，使更多的企业对减少碳排放权的需求增加，市场又逐步恢复回来。到 2018 年三季度，达到每吨 25 欧元，市场交易又重新回来，市场功能再度发挥作用。

碳市场运行方面最重要的，有三个条件。

第一，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要合理。因为市场是政府政策制订的市场，政策制订预减排目标的宽松程度和划定减排主体的范围，直接确定了碳排放权的稀缺性，直接影响碳价格和市场规模，欧洲市场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市场供应量多，而需求量不足，市场就很难运行。政府或公共机构在把握发行配额时要注意量，过于宽松的话，整个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定价也会产生影响。这样一个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制订的市场配额进行交易的产品，要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整体的法规和稳定性，设定的额度一定要有清晰的法律，要把所有权界定清楚，政策制定要非常合理，因为它影响价格、影响市场的风险。

第二，完善碳排放核定核查方法。有多少额度，最后要到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交易根据登记的内容、数额进行交易。比如股票，我们有个中央登记公司，所有买卖股票的电子数据全部集中在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结算以后具体钱多少都是要对账，期货也是一样，每天的保证金多少，投资多少也是要清楚的。如果建立一个这样的碳市场，得确保每天交易的产品量和登记机构的公信力。每天交易完成后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数据，这是市场成功的关键。

第三，建设登记注册系统，交易必须要有个中央登记结算系统。

有了这三个条件，市场价格的发现、交易才是可信的、

安全的。从全球碳市场来看，欧洲市场把现货和期货结合在一起，交易表现出来的数据是碳期货市场的数据较多，交易更加透明、更具连续性，定价更准，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发现价格会更加准确。提供流动性，让很多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的企业能够进行买进、卖出，实现自己的风险管理。这是期货市场的机制起作用了。一个是 T+0 的机制，每天反复交易，这就会带来大家担心的投机问题，其实后面的监管可以解决。还有杠杆的问题，如果我买现货，我有 100 块钱就买 100 块钱的货，如果是期货的话，我用 5% 的资金买 100% 的货，一个月后交货，但是这个货我到时候肯定是能拿到的，不用在登记系统里增加库存，这样一来效率提高了，成本也降低了。

欧洲的碳交易市场，由于有这套机制才比较活跃，中国 7 个地方试点的是现货交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交易量非常小，我后面会分析它的原因。有了这样一套交易机制，欧盟的碳期货交易量已经占到碳市场总交易量的 90% 以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每天回转交易，二是杠杆交易。但是这就带来投机问题、风险控制问题、市场措施问题，那就需要监管。风险控制和监管是碳市场成功健康发展的关键。欧盟的经验是政策上优化排减目标，增强排放权的稀缺性，提升商品属性。

第二部分是监管机构注重排放权，与排放权的主管部门信息共享，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第三部分是中国碳市场建设发展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中国建设碳市场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2012 年中共十八大就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实行碳排放权交易日试点。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因此，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的。

路径是从试点起步，持续稳定推进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2011 年，发改委印发文件，到 2018 年底，7 个试点城市覆盖了电力、钢铁、水泥近 3000 个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权成交 3 亿吨，成交金额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中国现在商品期货市场一天的交易量上千万亿，这个千万亿不仅是个数字，核心是带来价格发现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期货市场有投机的一面时，还要看到期货市场带来的正效应。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往往是一个方面考虑的多，另一个方面就不考虑，这不是科学考虑问题的方法。所以尽管这些年的试点取得了成效，但是离真正碳排放权排放的目标距离还远，这就需要市场工具来帮助解决问题。所以试点的成效很显著，总量和强度都实现“双降”，试点中的问题在政策制度、市场基础、

交易规则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试点碳价格的差异明显，在防范产品金融化及过度投机等市场风险方面，试点也考虑得相对较少。我们在考虑金融化的方面，把它的风险想得太多，把它放大了，把它正面作用缩小了，有点束缚手脚，以至于前怕狼后怕虎了。

我们做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7 年底，相关的方案已经印发，标志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2018 年 4 月我国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把国务院的碳主管部门级主要机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到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更有力的制度机制保障。全国碳市场在法规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和系统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具体进展。在制度建设方面、在主管部门加强力量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基础设施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

第四部分是对中国碳市场建设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第一，加快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交易。

第二，加快启动广州碳期货市场建设。

第三，研究构建适合碳市场发展的风险防控体系。

有三个方面要注意，一是要懂得借鉴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市场建设过程中，欧洲和美国的建设经验，都是碳期货与碳现货市场同时起步，在美国碳市场统一也很难，因为对《巴黎协定》有不同想法。美国有很多人也想建立市场，美国的一些市场建起来后做不下去，欧洲市场发展得好。我看都有个共同点，一开始就把现货和期货放到一起来建设市场，这样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市场建成后，现货和期货有利于碳价格的形成，同时有利于交易的流通和风险对冲这三个核心功能的发挥。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国情，促进碳现货、期货市场同步建设，及早防范非法期货的产生。把期货和现货一起建

有好处，在风险控制、监管方面把相应的措施配套上，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理整顿，关掉一批，留下来的人，开始承诺说不搞期货就搞现货，然后又死灰复燃搞期货。如果我们的碳交易一开始做现货，会不会走过去 30 年的老路？把期货和现货一起建有好处，在风险控制、监管方面把相应的措施配套上，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用现货，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的话就会出问题，等到问题大了再解决就会出更大的风险。

总之，现货和期货一起出来是个比较好的防范风险的方法，而不能说概念上先把现货推出来，等现货成熟后再搞期货。杠杆可以用风险控制制度来解决，操控市场可以用监管来解决。

最后，我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加快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交易。启动以减排政策法规制度、排放核定核查方法、登记注册系统平台三方面统一为标志的全国碳市场交易。解决各试点城市排放权总量确定及分配、排放核定核查方法、交易制度规则等方面的不统一造成的碳交易价格差异，从而导致价格发现功能失真状况。

建议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积极推动人大相关立法。注重碳排放权稀缺性，完善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将更多行业企业纳入。加强碳排放权证核查机构、人员培育选拔，不断提升市场能力建设。

第二，加快启动广州碳期货市场建设。2019 年《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以建立碳排放权为首个品种的创新期货交易所。

第三，建立碳期货市场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中国有 30 年商品期货市场的经验，可以为碳市场建立一整套风险控制和监管的经验。我们当初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时是摸着石头过河，学习欧洲、美国的经验。在这

个过程中发现市场交易不起来，因为基础不是市场共建的，而是计划经济的基础。不像西方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中产阶级、富人阶层，要有余钱才能进行交易，我们没有，那就只好让很少的钱进入市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适合中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场机制，又学习了西方的经验进行改造。首先把市场建起来做大，最后再走到全世界大家都共同认同的规则里。现在这个市场经过 30 年做起来了，现在中国商品期货在全球交易量是第一的，风险控制、监管也没出什么问题，可以借鉴这方面的经验。

# 加强中国碳市场机制建设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 何建坤 /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何建坤

关于碳市场的机制，我谈几点看法。

碳市场的机制是用市场手段促进减排的一种政策工具，也体现出碳排放的空间作为一种紧缺自然资源的价值，同时也是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中国从 2012 年开始推进七个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到 2019 年 8 月底，已经交易 3.3 亿吨，交易金额 71 亿元，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和经验。在七个试点市场的基础上，中国又启动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初期首先是以电力行业启动，马上就会拓展到钢铁、水泥、化工、石化、航空等高耗能部门。碳市场排放额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概占全国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中国在建立碳市场的过程中，也吸取了欧盟碳市场、美国加州碳市场和其他国家碳市场的经验，也和这些国家进行了多次交流。

中国碳市场有自身的特点，有三点和国外碳市场有所差别。

第一，对企业碳排放额度的分配，在很多行业采取了技术基准线的方法，重视产品的能效和单位产品的碳排放，以它的先进值为基准，对它的总量根据生

产量进行调节。中国为什么没有完全按总量控制而是按技术基准线控制，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在高耗能领域有非常多的过剩产能，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要淘汰那些落后的、低效率的、小规模产能。

所以总量的控制会使得效率低的企业以减少货物生产水平来完成碳排放额度。用效率基准线的办法，只要生产效率低，那就必须到碳市场购买配额，就可以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

第二，碳市场对于终端行业，不仅考虑直接排放，而且考虑间接排放。也就是说，在终端像钢铁、水泥这些部门，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也要算在终端用户身上，欧盟和美国加州只算直接排放。为什么终端用户的间接排放也要纳入到碳市场当中，主要是因为电力市场的市场机制不太完整，缺乏传导机制，所以鼓励企业节约能源的同时减少碳排放，要减少电力的消费减少间接排放。

第三，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边远地区先进清洁能源的供应，并与当地脱贫工作相结合。将边远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纳入到碳市场，可以促进边远地区利用生物质资源保护生态，促进自然的减排项目在碳市场获利，促进农村脱贫和自然生态保护。

这几个特点体现了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而且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推进碳市场，不仅强化了节能减排，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碳市场的建设，完善和建立了 MRV 体系，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监测和核查有了非常完善的体系，有利于增强企业碳排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这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在法律规定下增加透明度一个非常有力的制度措施。

有了碳市场后，碳市场的交易是真金白银，促进了上报、统计、核查 MRV 体系的建设，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碳市场的信号，能够促进金融界对于低碳技术的投资。长期稳定的碳价信号，会使得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有预期的回报。中国碳市场在这几个方面



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也非常注重碳市场的国际合作。中国已经和日本、韩国建立了中日韩东北亚碳市场交流机制，这个机制已经建立了四年，三个国家的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对三国碳市场的进展进行了经验的分享和共同问题的研讨，并且探讨三方合作的可能。

在当前，全球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2019 年的会议有可能就《巴黎协定》中国际市场机制达成共识，国际市场机制是各国碳市场的碳价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中国也非常期待和欧盟及其他国家在开展碳市场方面进行交流研讨，探讨相互之间的合作。

# 有效化解投融资风险，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 珍妮·希普利 /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如“债务陷阱”，但面对这些问题可以回应，实际上真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优于援助式的设施建设。我们应该考虑接下来做什么。就是如何让大家对“一带一路”的潜力有更强的信心，让更多的地区和国家能够参与进来。

首先，“一带一路”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很有远见，“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我们过去五六年里最重要的一项举措，但是要发挥潜力，还需要有多方参与成为这个项目的男主角才行。市场对金融机构的动机、金融工具表示怀疑。虽然“一带一路”有很大的潜力塑造未来经济

*一个倡议，如果有些人觉得是被迫接受，那社会有什么样的倾向、想法？在融资之前、拨款之前，有没有充分考虑当地人的对华情绪。我们需要很多坦率的交流，融资界、银行界的人士，他们愿意在这当中寻找机会，但是他们要充分理解项目中潜在的风险。*

做法。

五年、十年后我们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现在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可能需要调研，不光是拿到数据，而是要看大家是否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项目。一个倡议，如果有些人觉得是被迫接受，那社会有什么样的倾向、想法？在融资之前、拨款之前，有没有充分考虑当地人的对华情绪。我们需要很多坦率的交流，融资界、银行界的人士，他们愿意在这当中寻找机会，但是他们要充分理解项目中潜在的风险。因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项目有谁提供担保，还是他们要共担风险？现在很多担保来自政府，未来可以更成熟一点，让私营和公营部门都能够相信这些项目是好项目，都能够塑造未来。如果说这些经济体将来能够繁荣，资本市场更愿意来投资。

现在丝路国际联盟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中，我们能够提供好多研究来证明，这些项目能够给沿线国家带来裨益。同时也要向当地人民说明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让各方认为自己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主人翁的感觉。现在各方愿意听取不同意见，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要拿出好的证据和好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丝路

建设不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新西兰是 APEC 里的一个小经济体，但也是非常重要的。APEC 这样的机构曾经也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比方说，APEC 有一个“海关联盟”，我们当时就说，要认识到大家是各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有些方面可以实现一致性，实现一定的统一性的。丝路国际联盟也可以借鉴这些

## IFF 峰会 (5)

有效化解投融资风险，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珍妮·希普利，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	153
中巴构建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助力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 肖卡特·阿齐兹，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154
有效发挥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王丹，丝路基金副总经理	155
推动中国与巴基斯坦跨境金融合作 穆尼尔·卡玛尔，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前董事长	157
广州致力于创建国际性文化与金融示范城市 朱小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58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周松，招商局集团总会计师	160
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和启示 王燕，IFF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经济学家	162

# 中巴构建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助力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

■ 肖卡特·阿齐兹 / IFF 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前总理



肖卡特·阿齐兹

“一带一路”刚提出的时候，我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理，所以我们很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机遇之一。巴基斯坦资本市场本来很弱，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一个个具体的目标，为增长提供了环境，带来更多机遇。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采用了各种措施推动这些项目。还有亚投行，现在也有新的机构、新的制度来解决各个国家不同的问题。

二战之后，我们建立了世界银行，但现在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需要有一个新倡议。

首先，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缺点，现在是数字时代，大家都互联互通。例如，每个理事会组织的成员要监管每个国家的活动。如果我们不去讨论这样的架构问题，就不会有什么改变。到底要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监管。我是非常支持这些大型国际组织的，但是他们的机制有点像老古董了。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发起的，提升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开放的概念，而今天“一带一路”已经发展好几年了，我们应该开始反思，应该怎么改变自己的方法，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模式。基础设

施的确是国家经济的引擎，当然我说的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电信，或者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能够减少贫困，能够提高国家的发展。高速公路也很重要，但是，高速公路要跟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这才是能够促进民心的地方，才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减少贫困，这是我看这个事情最好的角度。尤其是在亚投行，亚投行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模式应该是多边组织遵循的模式。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跟世行并行的，它也应该被改革，越早越好，改变整个管理的形态。作为管理的代理人，要清晰一点，比如说 CEO、总裁，他们是选举出来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理事会成员来讨论，他们需要多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重新改组，需要建立新的机构。

现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应该好好地去重新审视、重新改革，要去改善。亚投行是当代国际组织的典范，但亚投行没有董事会，管理层完全有权利去做这些事情。有董事会，管理层权力就减小了。要看看这样的组织到底是管理层重要，还是董事会重要。我完全重视透明化，管理层一定要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国际组织。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一带一路”的成果，真的是给世界带来了现实的变化。巴基斯坦看到了真正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成为交通运输的现实。瓜达尔港也是现实，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持反对的态度，瓜达尔港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的公路联通，现在去那里可以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一带一路”真的是带来了确实的改善。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我们做事的良好方案和典范。它真的是能够发挥每个国家的潜力，增进经济增长。所有的基础设施都能够推进经济增长。我们应该进一步拓宽这个概念，进一步改善设施，才能够给人民带来最佳的成果，带来高质量的增长，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能够让所有人都受益，不管是贫穷或富有，为全人类服务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 有效发挥丝路基金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王丹 / 丝路基金副总经理



王丹

金融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呢？我主要从丝路基金本身的实践来阐述。

丝路基金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而专门成立的中长期投融资机构，如果要鼓励大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大家需要看到 Real outcome（真实的结果）。

丝路基金成立五年以来，公司通过股权投资为主的多种方式，投资支持了一批重大项目。到 2019 年 10 月底为止，签约的项目是 34 个，承诺的投资金额是 123 亿美元，其中包含人民币 304 亿元。金额看上去不大，但主要是以股权投资为主。通过股权投资其实可以带动数倍于这个金额的投资总量。

丝路基金在过去五年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想法。第一，是要重视与对方国家的发展规划相对接。要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共同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正如珍妮·希普莉总理所说的 Inclusive approach（有包容性的方式），中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有丰富的资金，同时在电站、高铁、工业制造等方面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与具有其他相对优势的“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发展相对接。在很多方面，包括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方面进行以

中长期股权为主的投融资合作。

我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巴基斯坦，这是一个水电站项目。正如肖卡特·阿齐兹总理刚才提到的，中国人说“要想富先修路”，肖卡特·阿齐兹总理精准阐述到要为经济增长创造合适的环境。因为巴基斯坦一直处于电力比较短缺的状态，通过补充电力、增加电力的供应，可以为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

第二，要开展多元化合作，也就是 Multilateral ownership（多边所有权），我们也大力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有效拓宽高质量发展空间。除了跟多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同时还跟一些发达国家开展合作。通过跟这些机构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结合中国资金和相对优势产能，结合发达经济体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投资所在国发展的需求和资源禀赋，把这三者进行有效的链接，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合作各方创造相应的投资回报。

我们跟欧洲投资银行下面的欧洲投资基金（EIF）共同组建了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以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子基金的投资，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容克计划”的对接。子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帮助欧洲中小企业发展，这个基金已经成功推动了一些欧洲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融合。

此外，我们最近跟新加坡的盛裕集团成立了联合投资集团，准备在东南亚开展一些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个经验，要坚持绿色投资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2015 年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也强调，要坚持“开放、绿色、连接”的理念，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

作为服务“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机构，坚持做负责任的投资人，我们加入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充分评估项目对当地生态环



境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投资决策中,有一个专门的环节是要评估项目的 ESG 指标。我们跟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 ACWA Power 共同在迪拜投资了全球最大的储热式光能光热电站项目,这个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950 兆瓦,可以推动开发当地的清洁能源,促进能源的转型。

最后,要发挥本地作用。拓宽“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的渠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国货币,有助于动员当地的储蓄,降低换汇成本,并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目前人民币已经被正式纳入 IMF 的 SDR 货币篮子,人民币在跨境货币投资中的使用率不断上升。

丝路基金是一个双币种基金,除 400 亿美元资本金外,还有 1000 亿元人民币资本金。在人民币投资方面,丝路基金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目前已经在中东和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成功开展了人民币的股权、贷款投资。在这些项目中,人民币资金一方面用于采购中国的设备、原材料,还有各项服务,有效降低了成本,防范了汇率风险。另一方面,扩大了境外企业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境外企业未来进入中国市场,拓展合作伙伴。

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投资理念,与境内外的投资者、各机构和企业携手,

共同拓展合作机会,为推进共建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做出应有的贡献。

## 推动中国与巴基斯坦 跨境金融合作

■ 穆尼尔·卡玛尔 /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前董事长



穆尼尔·卡玛尔

过去二十年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合作关系,这意味着给巴基斯坦带来很多益处。2013 年,巴基斯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当时巴基斯坦国家的发展状况也不好,没有投资方来给巴基斯坦投资,以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当时两国合作的第一阶段中,能源项目的投资需要 320 多亿美元,很快就以 79 亿美元为基础设立了多个能源项目,然后以 90 亿美元设立了百兆瓦的能源项目。

六年来,很多的高速公路项目都已经建成。拉合尔的地铁,2020 年一季度将会完成,这是个投资 26 亿美元的项目。下一阶段,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带来长期效益的项目,有 9 个经济特区,里面包括了旁遮普、卡拉奇等多个地区。

西方国家可能觉得这是中国的施舍,绝对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的一家企业在巴基斯坦建一个合资企业,这是世界一流的项目,用本地的货币提供融资,双方是权益的合资。

刚才说的 300 亿美元的能源项目,里面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在哪里呢?我们吸取经验教训,我们要研究用巴基斯坦国内的贷款,研究如何在巴基斯坦国内

发债,不是都用美元。现在巴中的贸易额大概是 160 亿美元,我们现在正在跟 IMF 构建货币稳定的机制。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如果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的话,可能会增长四倍。现在巴基斯坦卢比和人民币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兑换,如果能够直接清算的话,要开放中央银行资本款项。

我们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满足融资的需求。三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交易,就是与中国的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的合作,这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市场之一,还有中国的期货市场。在哈比银行,我们进行了覆盖巴基斯坦 40% 股市价值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有五六个道路的项目,有的已经实施,有的正要实施,这些项目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来的。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设备,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的融资。我觉得光用本地的资金并不合适,我们应该在巴基斯坦发债券,发基础设施债券,以实现本地的融资。

或许亚投行也能够帮助我们发行以卢比计价的债券,开发一些基础设施,然后在交易市场上投放,这个不容易做到。中国现在提供六个基础项目的基金,如果中国的机构可以通过增信的服务,让我们自己发债券,就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现在有很多大的机构,像黑石、贝莱德这样的基金公司在巴基斯坦参与融资,如果能够让债券上市的话,通过哈比银行为这些与中国合作的项目提供资金,并通过国际的基金让全世界知道,这将是非常高质量的“一带一路”的项目。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施舍,也可以让世界上一流的公司为这些项目投资。当然这需要中国金融机构的增信,让国际社会看到“一带一路”项目的专业性。与上海合作组织一样,“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很好的平台,我们覆盖了巴基斯坦所有地区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央银行都可以参与进来,这不仅对巴基斯坦是好事,对整个地区而言都是好事情。

# 广州致力于创建国际性文化与金融示范城市

■ 朱小焱 /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朱小焱

我介绍一下广州文化与金融的故事。

2018 年 10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广州的荔湾区老城区，看了越剧艺术博物馆。在这里习近平主席提出“老城市、新活力”。广州有 2230 多年的历史，公元前 236 年，我们的祖先在岭南大地选择了这个城市的中心点。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探讨国际金融领域合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关切并助力城市之间的金融合作。

广州正在举办整个大湾区最具辨识度的文化产业交易会，其中最重要的板块就是文化加金融。我简单从城市角度与各位嘉宾分享几个数字。

2013 年到 2018 年，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累计贸易总额是 1806.7 亿美元，占广州市对外贸易的两成。广州别称“千年商都”，一千多年前，在整个广州，在整个十三行最繁盛的时候，在黄埔古港，可以看到素馨花，特别在南亚、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素馨花是一个非常适合在亚热带栽培和种植的花。那个时代，我们通过贸易加金融的方式进行鲜花的贸易。千年商都，伴随着千年的花香走

进了新时代。在改革开放 41 年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 2019 年 2 月 18 日，国家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有 1 亿人口，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形式，四个独具特色的城市代表。例如香港，是国际大都会，贸易金融交通中心。澳门，是一个旅游休闲之都，特别是在中葡贸易或者葡语国家贸易平台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作为广州的兄弟城市，诞生只有 41 年的小渔村，在过去 41 年的历程中翻天覆地，这就是深圳，是广东省内两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辨识度的一个城市。2019 年 8 月 28 日国家正式出台文件，也是国家战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示范区。广州也是广东副省级城市，显得更加敦厚，更加全面，有 2200 多年的历史，老成持重。广州的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平衡发展。深圳，则年轻，充满朝气，在创新创意方面未来将引领或者代表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良性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8 年广州出台了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的牵头城市，在外国驻广州 60 多个总领事馆的支持下，在全球将近 1000 个有友好交流的合作圈、朋友圈的支持下，重点选择全球具有辨识度的城市建立了十个旅游境外推广中心。

广州的特色是综合实力比较强，这个城市有 1300 万户籍人口，管理的人口将近 2000 万，广州和新西兰的奥克莱，澳大利亚的悉尼都是友好城市。在广州的文化产业交流会期间，广州市长亲自倡议，鉴于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文化创意，特别是电影的后期制作领域具有非常高端的技术，有很多夺得数个奥斯卡金奖的功勋式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吸引他们来广州，来大湾区设立文化 + 科技，文化 + 金融的工作室。

广州也是全球的一个航空枢纽中心，中国著名的南方航空集团总部就在广州，如果看地球仪的话，可



以看到从欧洲国家前往澳大利亚最便捷的中转点就是广州，就是深圳，就是大湾区。通过这条航线，欧洲的政商、各界嘉宾可以享受南方航空的服务，经停享受过境签证，在广州享受美食，感受花城四季如春的魅力，然后舒舒服服地再前往澳大利亚，甚至到南太平洋。

从城市人居文化消费力来讲，广州排在中国城市前列。广州有 2000 万管理人口的消费能力，整个大湾区超过 1 亿，文化消费能力独占鳌头。

2018 年广州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是 1260 亿元人民币，在广州市 GDP 总量中占据了 5.5%，在广州 743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 300 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里面有全国 30 强的长隆集团。超过全球市场占有率的 20%，全球最具销售能力的珠江钢琴。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吴牧野使用的钢琴就是广州的珠江钢琴，珠江钢琴还和德国两个品牌合作，共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是文化合作的典范。

广州这个城市，还有特别具有辨识度的两个球。我们打开微信端显示小小的球标，它已经超过了全球最大的社交平台，共十几亿人使用。还有亚洲最著名的恒大足球，恒大足球的主场就在 1987 年建立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使用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千年商都，在新时代展现独特的新活力，也展示花城人民热情好客，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品质，不久

的将来，广州将向全球呈现一个文化 + 金融的示范城市范例。

#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 周松 / 招商局集团总会计师



周松

招商局是一个实业色彩很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我简单报告一下我们在 “一带一路” 上的实践，招商局在 “一带一路” 的建设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聚焦核心能力，网络化布局。招商局是从港航业务起家的，在交通基础设施和综合物流方面有核心的竞争力。围绕着 “一带一路”，我们海陆并举，全面布局，构建互联互通的陆上物流通道和海上港口网络。

在 “一带” 上，招商局积极开展全球综合物流服务，推动欧亚物流大通道建设，中欧班列大概占到市场 1/4 的份额。在 “一路” 上，我们不断完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截至 2018 年末，招商局在全球 2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56 个港口。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运营了中白工业园，这是在白俄罗斯的一个旗舰项目和典范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和国家多位领导人都曾莅临视察指导。这个规划面积 91 平方公里，首期 8.5 平方公里已经全部建成，签约投资额超过 11 亿美金，为当地创造了 5100 个工作岗位。

第二个特点，因地制宜，推广 “前港、中区、后城”

的模式。深圳的改革开放最早是在蛇口，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总结蛇口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招商局创造性地提出了 “前港” 概念，实现货物集散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商品交易中心， “中区” —— 打造临港产业园区、保税加工园区、商贸物流园区， “后城” —— 建设城市住宅区、购物消费区和生活物流区，这样形成一个产业开发的闭环。

同时，我们也重点打造港口投资运营能力、园区开发和运营能力，以及城镇化的综合服务能力模式。在 “一带一路” 上最典型的实践是在吉布提，2017 年 5 月，招商局和吉布提政府合资建设的中非最大、最现代化的吉布提新港正式投产。2018 年 7 月，吉布提国际自贸区 2.4 平方公里自贸区建成，并开园运营。当时有五位总统出席，现在已经有 60 多家企业入住。2019 年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峰会期间，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对吉布提的老港进行城市改造合作的项目，实质性推动新城的建设。

第三个特点，业务拓展上，我们致力于第三方市场以及属地合作。在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日本等国家，都和当地的第三方市场、当地企业还有中资企业的商业合作伙伴实现了双赢和共赢。

同时，招商局能够为 “一带一路” 提供需要的金融服务。

第一，基于传统的银行，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招商局旗下的招商银行已经打造了一个全面的 “一带一路” 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包括全球的贸易及供应链金融服务，全球项目融资服务，全球现金及财资管理服务，全球外汇交易等。

第二，围绕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提供服务。2018 年 2 月 5 日，由招商证券独家承销的招商局港口 “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在深交所成功发行，是我国首单 “一带一路” 熊猫公司债券，实现了境内人民币募集资金的跨境使用。

在这次债券成功发行的基础上，深交所发布了《关于开展 “一带一路” 债券业务试点的通知》，正式推



出标准产品，提高了工作效率，丰富了我国金融市场 “一带一路” 融资创新产品。

第三，提供 “引资 + 引智” 服务，这是围绕板块开展的。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需要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资源 and 动力。招商局将自身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优势和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与内部孵化的优质产业项目、科技资源结伴 “走出去”，为沿线国家实现 “引资 + 引智”，或者是 “引技”。

围绕中白产业园我们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由招商局牵头的中白产业投资基金，目前规模大概 5.85 亿美元，重点围绕白俄罗斯的中白产业园来开展业务。

此外，我们有一个创新孵化器，或者叫做天使投资的招商启航，它孵化了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叫 “中新智擎”，2015 年成立，这家企业 2018 年作为中白工业园第 27 家入园企业获得了园区授牌，2018 年 7 月这个企业得到了中白产业基金的投资。

# 债务可持续性 问题及启示

■ 王燕 / IFF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经济学家



王燕

回顾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合作，我有三个问题、四个论点。首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差距很大。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但仍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中国真实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 1/4，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次，很多国家过去 40 年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这点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及非洲国家比较明显。去工业化可以用工业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过去 70 年来，有四万亿美元是花在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投资上的。

目前仍有十亿人还生活在贫困当中，很多国家的人民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无法保证足够的电力供应。例如非洲许多国家一直忽视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处于落后状态。为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推行南南合作和贸易投资领域的优先发展。贸易可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局面，每个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有三项比较优势，一是基础设施优势，水电厂、公路、铁路成本比较低。二是人力资源优势，我们每年有千万的毕业生，他们中 40% 都是科技和工程专业

的。三是制造业优势，中国已经在制造业的 97 个分类里面占有 45 个优势。

近年来，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但投资周期长，中国的投资算是比较有耐心的资本，但周期可能是十年或者以上的。现在我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能源方面，每一项大概都占 33%。例如，中国参与了蒙内铁路的援建。有 139 个国家与中国已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非洲国家大约是 15 个。安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最近看到中国制造商投资增加的好处。比如，中国华建公司数年间雇佣当地人数显著增加。

海外融资的缺口弥补了吗？还没有。许多国家对基础设施融资有特别大的需求，但是现在缺少长期投资的来源。过去三年，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令人乐观的是，现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全球发展投资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所提供的。

目前，我们对于融资的概念已经是拓宽了，不仅有长期贷款，还有股权投资。像丝路基金，还有其他一些私募基金投资也是一样的，包括在股权投资当中。

最后一点，就是对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诱导受援国承担过多债务而实现主权干预或资源掠夺等目的，提出“债务陷阱”外交论，说中国增加其他国家债务负担，还提供了相关的数据支撑。

然而，以债务与 GDP 之比来界定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有误区的，因为这个数据没有明确区分具体是什么样的债务，它到底是消费性的，还是用来投融资的。债务与 GDP 之比，要看政府资产和债务各有多少，净价值才是重要的。IMF 的报告显示，每个国家政府资产和债务的数据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发达国家是负净值，比如说美国政府就是负的，没有实际的证据来说明“债务陷阱”的概念。像水电站、电网、公路、海港、桥梁，对于公有部门来说这都是资产，是能够带来投资回报的。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一起融资建设



这些资产，未来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如果做好规划，这将会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

最后总结一下，那些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国家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还有去工业化的影响。但接受东亚模式的国家其实是在快速增长，在结构性的改革当中获益。南北之间的援助还不够有效，南南合作是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可以补充南北之间合作的缺口。南南和南北之间合作可以解决结构性的改革，能够达成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赢。

*南北之间的援助还不够有效，南南合作是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可以补充南北之间合作的缺口。南南和南北之间合作可以解决结构性的改革，能够达成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赢。*

# 中国 - 东盟经济 一体化合作将引领世界经济

■ 卡洛斯·多明格斯 / 菲律宾财政部部长



卡洛斯·多明格斯

现在全球经济从总的趋势来说,是一个放缓的局面,但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东盟成员国、中国仍然体现出活力和强劲的状态。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影响,举例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强韧有力的国内市场,同时也极大程度拓展了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通过建立支付和跨国交易的基础设施,不但能维护国内市场,也能够使跨境交易变得更为方便。目前,16国正在深入探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协议达成之后,将对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的经济增长受到威胁,主要是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它事实上会阻碍产品的跨境自由流动,尤其是将关税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更加恶劣。贸易战会带来经济的放缓,消费者为了购买商品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幸运的是,在东盟地区,各个国家之间达成了关于自由贸易的共识,人们认为自由贸易和更加高效的资本流动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东南亚的国家在贸易、服务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上做了大量的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该地区的经济体仍然在增速上全球领先。我们感谢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的大力支持,进一步促进了东盟经济和投资的自由流动。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东盟与主要的贸易伙伴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且我们不断地在这个协议当中受益。过去十年当中,中国作为东盟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从2009年开始,每年增长率达到10%,到了2018年,东盟国家和中国总贸易量已经达到了48万亿美元的规模,这已经较2017年有了20%的增长。

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和中国进行了更加积极的贸易合作,中菲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能带来更加协同的效益。两个国家的合作共赢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中国也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的游客来源国。从2016年开始,菲律宾与中国的总贸易量,每年在以15%的增长率增长。2018年,总贸易量达到了520亿美元的规模,比2017年高15%。来到菲律宾的中国游客人数也是逐渐在增长,每年增长率达到27%,从杜特尔特总统就任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情况。20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0万,比2017年要高20%。

菲律宾能够从中国市场上自由交易的熊猫债券当中获得大量的益处,菲律宾2019年发行的债券事实上已超过标准32个基点,按32.58%的票面收益来发行,被中国的联合信用评级机构评为3A级的产品。中国市场对于东盟所有的国家来说,以及对东盟地区之外的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机会。通过鼓励更加有效的投资流动,增加互联互通,中国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更有包容性,使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

在国家层面,菲律宾接纳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内容,包括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的更新和现代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基础设施项目是杜特尔特总统实施的国家发展计划之一,这个计划不但有数千个物流后勤基础设施项目遍布全国各地,而且也有更好更先进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将使菲律宾各个群岛之间的交通变得更加方便,同时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这些项目不仅需要国内的经济增长来提供经费,同时也需要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投资,在这方面菲律宾要用

## 区域圆桌会议 (1)

中国 - 东盟经济一体化合作将引领世界经济 卡洛斯·多明格斯, 菲律宾财政部部长	165
推动中国 - 东盟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体系 李梅, IFF 成员、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67
进一步深化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 罗斯·塞瓦拉, 柬埔寨财经部国务大臣	169
中国 - 东盟加强本币合作, 促进经贸发展 周诚君,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	171
东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 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基金会主席	174
建设金融安全网络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重点 邦帝·尼加萨温, 泰国央行前副行长	176
借鉴 PPP 模式, 加强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丁化美,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董事	177
警惕中美贸易战升级, 防范抵御金融风险 李强民, 中国驻美国休斯敦原总领事(大使衔)	179



更好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得到了菲律宾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广泛支持，同时东盟地区的金融机构，如 AIIB 亚投行也给予很大的支持。中国为菲律宾提供了发展援助基金，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现代化。

到目前为止，中菲两个国家已经签了三期的连续贷款协议，总价值达到 4.93 亿美元，主要是对大坝、铁路以及灌溉系统进行更新。从 2016 年开始，菲律宾已经获得了 4.3 亿美元的中国建筑经费，这些经费主要用于标志性的桥梁、道路建设以及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等。同时菲律宾创造了更多的机构机制来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效果，举例来说，包括付款机制、支付机制的更新，使得的货币支付变得更加方便。

2018 年，菲律宾有 13 家主要的银行与中国银行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能够进一步促进菲律宾比索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和结算机制。同时也建立了菲律宾的人民币交易平台，能够促使经济往来和贸易的成本下降。

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双方有过多次高层的交流访问，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杜特尔特总统是东盟国家中唯一一个受到习近平主席五次会见的领导人。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体将会有越来越一体化的经济往来。亚投行为这个一体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搭建了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平台。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RCEP)，也是我们大力

支持的一个协议，我们期待它能够达成一个最终协议，有助于该地区各个经济体的进一步一体化，同时也会惠及该地区的人民。民生离不开我们各国的合作，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合作是非常关键的，这样才能够追求各国人民的发展，达到脱贫目标。今天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协议，会为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上，该地区的经济体可以为未来的世界经济起到引领的作用。

## 推动中国 - 东盟 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体系

■ 李梅 / IFF 成员、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梅

我来自中央金融企业，在业务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想法和思考，聚焦深化中国 - 东盟开放合作，构建新型支付结算体系。

当前正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时刻，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可逆转，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中国和东盟。随着“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持续扩大，产业和市场融合正在不断深化。这对于在全球大变局背景下，寻求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建立属于中国 - 东盟区自己的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跟大家进行交流。

一是中国和东盟开放合作面临新机遇。2019 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第 16 个年头。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贸易额迅速增长。前 10 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 3.54 万亿人民币的数字，仅次于中欧贸易总值 3.98 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同期中美贸易总值 0.47 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也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

伴。在投资领域，2018 年东盟首次跻身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并成为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地。投资额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欧盟。中国与东盟双边金融开放也日益扩大，2019 年 8 月份，国务院批准广西、云南等 6 个省区新设自由贸易区，给予面向东盟跨境金融创新的政策，东盟国家也扩大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政策，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更为便利的准入条件。

二是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政策，将给中国 - 东盟合作带来更多的活力和新的动能。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强调中国将坚持扩大开放，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格局。

中国与东盟当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之不易，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在自我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之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保障各国人民享有更美好生活的重要引擎。中国与东盟应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战略关系，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和旅游的往来，深化金融合作，分享技术创新，共同为建设开放包容、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世界作出贡献。

我来自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我司作为国有金融企业一直致力于参与和服务及推进中国 - 东盟的合作。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中国第一家带有金融控股字样的公司，也是财政部直属的 23 家中央金融企业之一。股东是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还有一小部分社保基金。

公司目前拥有 5 家控股子公司，总体是 4+N 战略布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板块：银河证券是证券业务平台；银河基金是成立最早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是公募基金平台；银河投资原来是中央直属的中央金融企业之一，2018 年划归中国银河金控，在 PE、CV 等领域开展业务，旗下拥有中国银河保险金融公司等其他几家公司；此外正在筹建全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建立以聚焦资本市场业务为核心的

不良资产处置平台。这个工作正在进行，我们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专业化、国际化的平台。

上述各个业务板块互相协同，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与东盟合作日益深入，比如收购联昌证券，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设有分支机构。银河保险正在与柬埔寨建立高层次的合作，目前已经签约湄公河堤坝建设、首都机场建设的保险经济服务，正在推进西哈努克港物流专线轻轨、吴哥窟旅游轻轨等项目，国家粮食储备项目等等。目前公司和柬埔寨合作的项目主要涉及电力、交通、通讯、特区建设、基建和金融领域的金融服务支持。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在农田水利、交通通信、能源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未来还将与国外的机构建立不良资产的合资基金，可以为投资东盟的企业服务，同时也为东盟各国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和服务客户过程中，建立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越来越重要。不断增长的金融贸易合作，为深化人民币结算提供强有力支撑。中国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东盟已成为人民币跨境收付和结算重点地区。包括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国家在内，已经在各个方面推进多边、双边支付体系建设。

以此为契机，不断扩大人民币在东盟经济往来中的便利非常重要。2018 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和金融知识的问题。今天中国和东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涉及小币种交易及汇率风险的硬约束，而这些问题也是未来中国和东盟合作不断深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关键的问题。

对此，我有四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一是要对标发达经济体清算系统，积极发挥人民币跨境清算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资源，不断提高效率；二是与东盟国家资金融通，为其架桥、铺路；三是支持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要深化保障支持，健全跨境、支付、结算、法律法规体系。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操作指引，但是要全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仅有指引和协议应该还不够。因此在此基础上，要对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设计和规划，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法规体系，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提倡互利共赢，逐步扩大人民币在中国 - 东盟支付结算比例的范围。人民币替代美元作为贸易结算选择之一，在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并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继续大力推动双边人民币结算。一方面，加强目前已有的货币互换、外汇交易中心、边境贸易货币兑换试点，现有金融机构提供兑换服务等方式，满足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外汇交易要求。另一方面，推动基础设施融资，大宗农产品交易等以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中国 - 东盟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在条件成熟的东盟国家建立小币种交易中心、人民币交易中心等形式，大力发展人民币业务，为有需要的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行，便利东盟各国相关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这些都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助推中国 - 东盟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四，积极创新突破，深入研究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对现有贸易支付结算体系的重塑。数字货币的出现可以大幅改善甚至颠覆现有的贸易支付结算体系，要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实现突破。一是可以改善现有贸易支付环境的安全，比如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区块链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技术路径；二是可以大幅降低现有贸易体系的交易成本；三是可以进一步提升支付效率，缩短支付时间。总体而言，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的使用，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交易安全性，或将推动贸易支付结算体系新变革。

推动中国 - 东盟以人民币为主的结算体系意义重大，有助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和东盟各国间的金融贸易合作，中国银河金控愿和在座各位一道，助推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作出贡献。

## 进一步深化 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

■ 罗斯·塞瓦拉 / 柬埔寨财经部国务大臣



罗斯·塞瓦拉

目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显得日益重要。这会成为一个极好的平台，能够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尤其是在该地区的金融合作方面，以及中国 - 东盟金融合作这个话题。

金融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增长能够为各国的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由于这个原因，柬埔寨作为东盟的成员，能够认识到金融合作的必要性，知道它能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无限潜力，能够促进国民的团结以及社区的建设。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见证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和东盟地区不断拓展的合作关系，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对话对象和合作伙伴。

在 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各成员国都普遍重视自己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合作，这一点在未来也会不断地深化，柬埔寨希望能够与友好邻邦中国进一步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样的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处，并且能为本地区带来和平和繁荣。

举例来说，东盟互通性的主要发展蓝图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3+X 合作框架。在这些机制之下，中国和东盟落实了一系列非常切实的措施，通过共同努力获得协同效应，并且在本地地区进一步促进互联互通，带来政治的合作、经济的合作，以及民间的往来和交流交换。

除此之外，各成员国也建立了清迈倡议，清迈倡议是一个多边的货币互换安排，这是东盟加上中日韩三国的共同框架。通过建立一个价值 1200 亿美元的外币储备金池，并且利用这样一个储备金池更好地管理本地区的短期流动性问题，而不是一直依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目标是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并且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在这个背景之下，应当关注如何能够把各国的目标在项目早期就统一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性。

中国在 2009 年开始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到了 2018 年，它已经成为东盟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国，除此之外它还是东盟国家外国游客的主要来源国。2018 年，中国对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 102 亿美元，占东盟地区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当中的 6.6%。

在未来，中国和东盟地区都有计划要进一步达成一万亿美元贸易量和 1500 亿美元投资的共同目标，这是 2020 年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中国 - 东盟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且改善互联互通，期待在未来能够看到中国 - 东盟的贸易投资带来更多的成果。

应当进一步深化彼此的整合和合作，这样的合作能够带来巨大的潜力，帮助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了能够进一步促进整合和合作，中国和东盟双方都在不懈的努力，希望能够最终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品质以及互惠互利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就是



RCEP。这个协议将会极大程度上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是非常包容的和普惠的。除此之外，中国 - 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也在落实，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

中国和东盟地区，同样也在进一步促进金融合作，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各项活动和倡议来完成。举例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使得本地区的私有投资更好地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发展。2010 年，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叫做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这是一个以美金计价的离岸多边合作基金，主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金融机构来担任大股东。同时，专注于投资大规模的项目，比如道路、港口、能源、自然资源等等基础设施。这个基金有望筹集 100 亿美金来投资东盟地区，这样的金融投资将会极大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

中国和东盟之间更加紧密的金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促进双方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且是互惠互利的。我们相信未来双方会进一步地促进紧密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体的强韧发展，并且通过互联互通，实现有更加有效的合作。利用这些机会，能够扮演非常积极的政治上的角色，促进和平、繁荣发展，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好处。柬埔寨

和东盟其他国家，都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与中国建立更为坚实有力、也更为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 中国 - 东盟加强本币合作，促进经贸发展

■ 周诚君 / IFF 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



周诚君

中国和东盟之间应更好地通过本币合作，促进中国和东盟双边、多边贸易、投资及其他领域的发展。

首先，第一个大问题是为什么在东盟和中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我们主张更多地使用本币来结算。本币结算不一定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通过本币合作来推进实体经济的投资贸易和合作。这是为什么呢？首要原因是可以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

最近我见了特别多的东盟国家中央银行各级官员，都讲了这个情况。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中国国内出现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它的趋势更加明显、更加迅速。中国许多产业成建制、大规模地往东盟国家转移。我们在东盟国家投资很多工业园区，少则 7 平方公里，多则十几平方公里，最大的 92 平方公里。这些贸易投资背后 90% 以上都是用美元结算。

一方面，这是中国产业成建制、大规模对外转移；另一方面，从中国来说这是 ODM。伴随着这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商品货物和服务贸易。这些大型投资背后相关的商品、货物、生产线、设备、原材料，包括劳务，甚至法律评级都是从中国进口。最近

我见了老挝央行行长和副行长，在不同场合我都跟他们这样讲：中国的企业到老挝投资，其中好几个民营企业家到老挝建十几平方公里的产业园。中国的企业家要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拿着这些美元到老挝，投资落地时要把美元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基普。这个老挝企业投资落地以后，它从中国购买设备、生产线、原材料等等，它又要将老挝基普再换成美元。中国出口这些货物以后，还要把美元再换成人民币。人民币兜了一圈，经几次转换，最后回到国内还是人民币。我们双方企业要为这种转换承担多少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要有多少不确定性。为什么这些投资和贸易我们不能用本币结算呢？用人民币、用老挝基普都可以。这是第一个原因，通过本币的结算可以帮助市场主体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第二个原因，哪怕中国有 31000 亿外汇储备也觉得不那么好用，何况更多东盟国家没有中国那么多的美元。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美元很大程度上成为某种工具。而且在这点上，美国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所有欧洲国家、加拿大、墨西哥长臂管辖重要的基础是，因为使用美元。我们没有那么多美元，或当我们使用美元不方便时，为什么不更多依赖本币？不通过本币来实现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呢？

第三个更重要的、更加基础的原因是，如果我们在投资和贸易当中更多地使用本币，可以产生一个公平的汇率。我以人民币为例，假如在投资和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投资者拿到人民币，当然这些人民币有很多用途。但如有货币错配，将围绕人民币头寸资产进行外汇交易。外汇交易的结果是形成人民币和当地货币的直接兑换，绕开美元、第三方货币的套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是通过市场交易直接形成，这是一个均衡的汇率，这是一个市场发现、市场交易形成的汇率，所以这是一个公允的汇率，这是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共同交易出来的价格。这个价格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更加可以承受外部冲击。

如果中国和东盟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能够摆脱第三方货币的套算，形成直接交易的价格，那么这个汇率体

系对于中国和所有东盟国家之间的实体经济、投资贸易往来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汇率是一个公允的汇率，是一个公平汇率，更加透明、可预期。在实体经济中，这个汇率是加强实体经济的手段。如果汇率是市场化、公允的、公平的，充分反映市场参与者预期，对实体经济领域，对东盟和其他国家的资源都会起到更加优化的配置作用。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投资贸易用本币结算最重要、最基础的原因，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作用领域。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贸易中为什么要用本币结算。

我想讲的第二个大问题，使用本币结算我们有没有好的基础。我认为，在所有国际关系当中，中国和东盟之间用本币结算的基础最好，最具有坚实的基础。为什么呢？早在 1993 年 5 月 26 日，中国就跟越南国家银行签署了双边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协定。两个月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中国银行的马尼拉分行成为我们第 27 家人民币海外清算行。菲律宾做的还远不止如此，菲律宾在 13 年前，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把人民币作为菲律宾官方储备的国家。我们在泰国、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都有清算行。几乎大多数东盟国家都持有人民币，作为他们的官方储备。我们跟大多数东盟国家都签订了本币合作的协定或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或其他类似的货币合作协议。我们正积极跟印尼、跟泰国等相关国家商量，对他们目前正在做的（活动），我们持开放态度愿意加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良好的共识，在双边投资贸易活动中，我们更多依赖本币结算而不是美元。

第三个大问题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这么紧密的投资经贸合作关系当中，总本币结算的比例并不高？坦率地说这个比例很低，大概只占 3% 左右。到 2019 年 9 月，在中国所有对外投资贸易合同中，超过 38% 的比例都用人民币结算了。但遗憾的是跟东盟国家之间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跟东盟各国的中央银行之间没有共识，我刚才说过共识非常好，而是在技术层面、在操作层面存在一些技术障碍，没有政策障碍。在大多数东盟国家没有政策障碍，而是一些技术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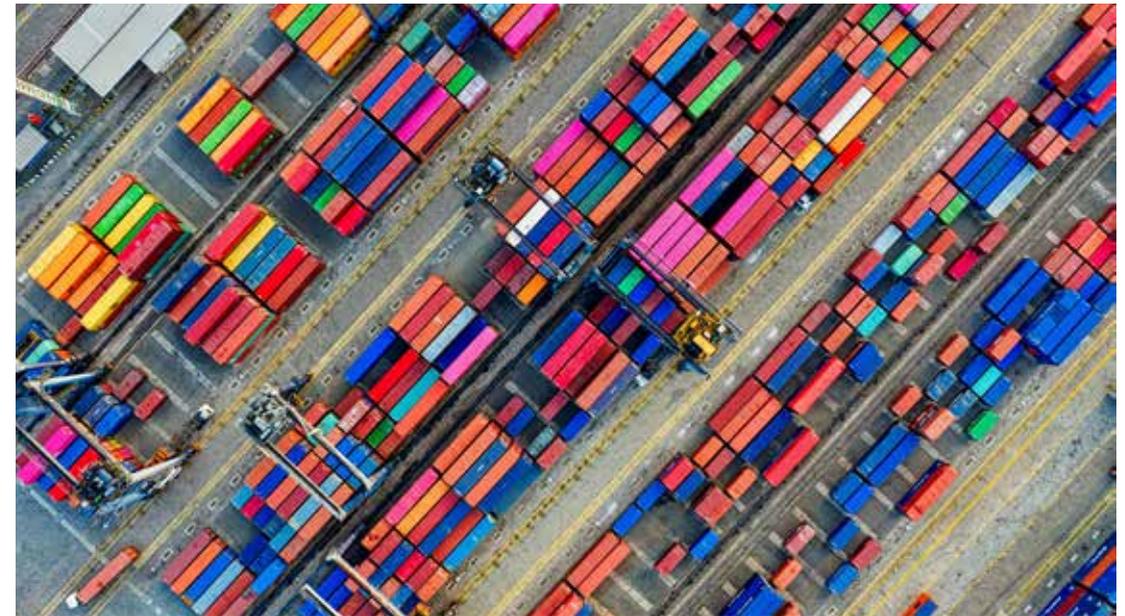
第一个，在相当一部分东盟国家，我们发现中央银行没有让商业银行给市场主体开人民币账户。在商业银行尤其不是中资银行，当地的商业银行是没有办法为当地企业开立人民币账户。因为它不知道怎么开人民币账户，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东盟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包括越南，他们的商业银行还没有跟中资银行之间建立同业往来的业务

关系。事实上需要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很重要，但并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必须要依靠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老挝、柬埔寨商业银行为当地的市场主体，不管是当地企业还是中资企业，要为它开人民币账户。然后老挝、柬埔寨商业银行，要跟中资银行特别是跟大陆的银行开同业往来账户，这样才能运转起来。但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缺乏这方面的技术，需要对其技术进行升级，需要培养懂人民币业务，知道怎么合规、怎么风控的人才。但是很遗憾，目前在这些方面还有些困难。

第二个，要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我们鼓励中资企业拿着人民币去投资，比如投过去 100 亿元人民币，问题是这部分人民币到了当地，当地商业银行和市场主体用这些人民币来干嘛。第一，拿着这些人民币可以从中国进口，购买中国商品、货物、机器设备、劳务、原材料，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第二，如果它用不了那么多人民币，还能干嘛呢？中国的金融市场对所有东盟国家，是完全开放的，只要愿意来，而且这个金融市场是有吸引力的。如果大家去比较一下，我们看近期美元的十年期国债回报率是 1.771%。欧元区像德国、法国十年期国债回报率基本上都是负的。德国曾经一度 30 年的国债回报率都是负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总是在零上下，最近总是跌破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无风险回报是负或者是零，买了这些产品还得倒贴。我们看中国，中央政府十年期国债回报率多少？截至星期五下班时的数据是 3.197%，也就是 3.2% 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任何一个海外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境内市场买我们的债券、买我们的股票，最起码享受 3.2% 的无风险回报，这是十年期的回报。如果买商业银行债、信用债等，回报率就更多了，6%、7% 都有。

在中国市场充分开放的情况下，欢迎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资产相对比较高的回报，而且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些好处。但是我们要去广泛宣传，要让东盟国家的投资者知道，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开放了，欢迎来投资。我们看到大多数东盟国家中央银行或者它的官方机构，都已经把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当地市场主体接受持有的人民币作为支付工具，同时持有人民币金融资产，将获得比较高的相对安全的回报。

第三个，具体怎么做呢？除了让商业银行提供全流程的服务，除了让东盟国家投资者持有高回报的人民币



资产，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以及相关的服务也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从人民币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关于用本币来结算、清算及货币合作的机制。比方说有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目前我们正在跟一系列东盟国家，包括老挝等，正在谈进一步推进双边本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实施。比如人民币海外清算行机制，刚才说到两个月前在菲律宾宣布中国银行作为人民币海外清算行。而且对境外中央银行选择当地商业银行作为清算行，我们持欢迎态度，这不一定要由人民银行宣布。比如最近印尼宣布，建设银行在印尼新的开发区做人民币业务，对此也持开放态度。

我们还非常积极地支持香港的人民币基础设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也欢迎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民币海外离岸中心。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是，希望东盟各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一道，能够更多地为当地的市场主体开立人民币账户，建立广泛的业务往来关系。对人民币海外清算系统我们也持开放态度。

总体而言，通过中央银行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我们就可以为市场主体在双边投资和贸易中更多选择本币，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很多东盟国家的商业银行缺少人民币使用时从账户开立、商业服务到风控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商业银行愿意为东盟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技

**通过中央银行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我们就可以为市场主体在双边投资和贸易中更多选择本币，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很多东盟国家的商业银行缺少人民币使用时从账户开立、商业服务到风控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商业银行愿意为东盟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技术、产品、服务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合作。**

术、产品、服务方面提供各种各样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援助等机制，促进双方的商业银行的合作，在本币使用方面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 东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 已经转向亚洲

■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 / 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基金会主席



德吉斯曼·西门金塔克

东盟在减少和降低商品服务贸易的壁垒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移除了很多人员之间交往交流、服务信息和商品之间越境交换的障碍。尤其是在信息交流交换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因为东盟各成员国都采用了更具开放性的信息政策。这是东盟内部的情况。

东盟外部情况是怎样的呢？东盟国家现在也在向周边国家学习，比如起源于“清迈倡议”的东盟 + 中日韩三国机制 (10+3)，类似于欧洲的 EFTA，相当于亚洲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与相关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监控金融市场的动态。还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也很重要，我们希望 RCEP 能尽快完成所有的谈判，于 2019 年底能达成最终协议，但由于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要尽快达成最终协议，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东盟经济的现实情况是，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实质进展太多，尤其是在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这两个方面。东盟内部虽然签了很多协议，但并没有主要的金融方面的改革措施。东盟，我们把它叫做

25% 社区，因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能够得到很长远的发展，没有达到 25%。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都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周边，比如说印尼和新加坡、菲律宾和新加坡、泰国和新加坡、越南和新加坡之间产生的贸易，新加坡是这个 25% 社区贸易的最大核心。其他的东盟国家之间并没有能够更好地去发展自己的贸易往来，政府也没有能够更好地去促进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

而在东盟外部，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东盟中每一个单一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和日本也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欧盟和北美好像已经从东盟的贸易地图中退出去了。可以说，东盟的贸易和投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尤其是转向东北亚和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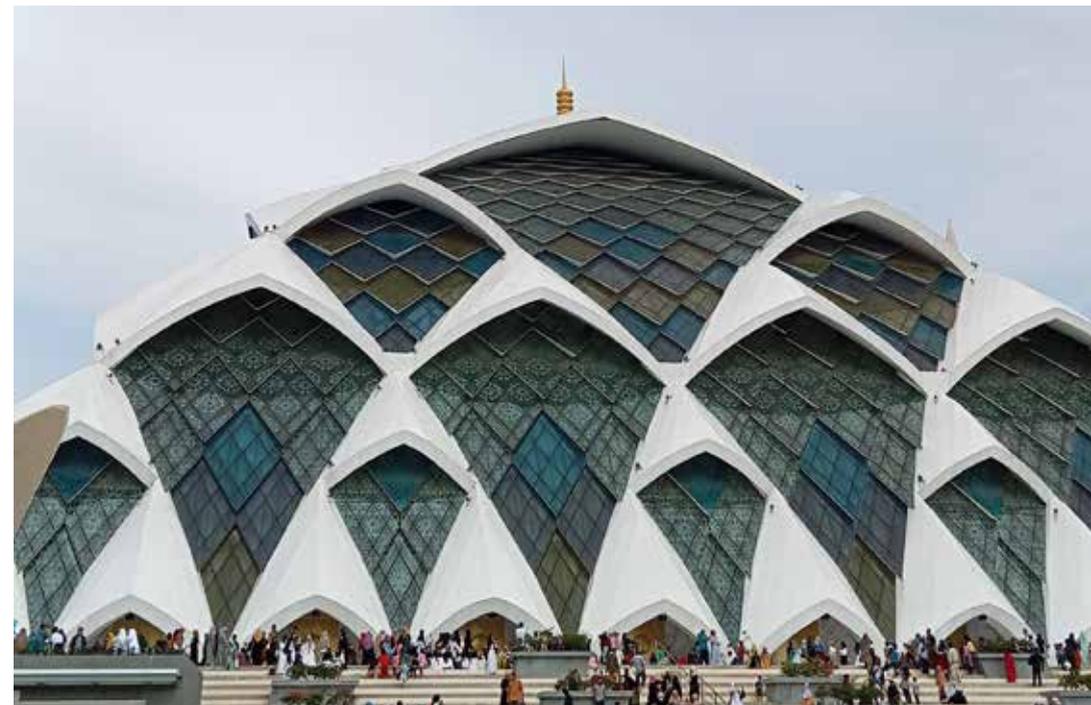
现在来讲一下印尼的状况。

第一点，印尼现在有一个新的政府，人员都非常年轻，很多人在数字经济行业相当有经验，所以我预期很快印度尼西亚就将重新发现在亚洲的各个机会。在过去几年当中，印尼并没有能够充分注意到亚洲和东盟带来的机遇，但是印尼新政府将会重新发现东盟的重要性，并且更好地促进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以及与东盟以外国家之间的贸易。

第二点，印尼会重新发现制造业的潜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尼西亚。现在有很多企业从中国迁移到越南，我们希望这个转移方向最终会转向印度尼西亚。

第三点，印尼新政府将会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印度尼西亚也会向前推进，更好地建设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的发展环境。印尼工业部长是一个本土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是一位企业家出身的政府部长。

第四点，印尼有促进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机制，包括教育的国际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会进一步深入，印尼的



大学非常积极地想与中国的高等学府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

第五点，印尼新政府已经宣布有意愿在经贸领域全面去监管化，意思是要消除或者大幅度地减少投资和贸易的壁垒，这将促进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能够加强。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全面的融资环境和金融配套体系。

我很欣赏周先生对于本币结算的热情和积极性，其实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要发展一个泛亚的货币，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理念从来没有正式启动过。至少日元从来没有成为亚洲的主要货币，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如果亚洲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和财长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促进这方面的合作，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可以有一些突破。

还有一种设想是成立一个区域内的 SDR——各国的不同本币占有不同权重的一揽子货币，这样可以提高各个本币的重要性，同时减少对某些第三方国家货币的依赖。

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在亚洲区域的金融系统当中扮演领航的角色，人民币早晚会成为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货币。届时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需要参与进来。

最后我想说，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一带一路”的进展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印尼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是持开放态度的，甚至已经批准了很多初步的项目和方案。但当地的一些现实情况是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落实，希望未来的五年可以有更多更快的进步。

## 建设金融安全网络 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重点

■ 邦帝·尼加萨温 / 泰国央行前副行长



邦帝·尼加萨温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合作克服各方面带来的挑战。中国和东盟的金融合作也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既可以支持本地的发展，也可以让整个区域能够更好地处理和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关于金融合作，我想分享几点想法。

第一，我们需要一个金融安全网络，才能够为未来的发展保驾护航。在这方面，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加强合作，确保未来的发展环境是安全稳定的。在这个地区金融安全网络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起到引领性的作用，搭建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 这样的多边机构，还有中日韩和 10 个东盟国家的 10+3 合作机制，提供了宏观的合作平台，这是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这些多边合作机制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很多信心，也使得中国 - 东盟地区能够很好地渡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展望未来，如果考虑到全球经济的现状，大幅度的衰退或者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不可能被完全排除。东盟地区也有一些资金的脆弱性，比如说比较高的债务水平，还有资本流的波动。所以完全有理由投资建

设一个更强大的安全网络，尤其是要应付资本流的波动。我认为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加深合作的一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扩大它的双边紧急借贷网络，帮助小型经济体更好地处理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冲突。

第二，可以做更多的压力测试，来确保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CMIM) 在需要时能够发挥作用，也应该加强它的资源储备。展望未来，下一个危机的规模可能会比前一个危机要大。而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所以它完全可以领导这个倡议。我们也应该允许更灵活的国际组织的信用贷款。

第三，中国可以支持东盟国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安全网络，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危机，国别的安全网络可以与地区的安全网络形成互补。

对于市场的开放问题我也分享几点看法，我们区域要促进包容性，提升生产力，各个国家一起合作就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通过加深金融一体化，能够促进包容性和提升生产力。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需要加深合作。第一，科技；第二，基础设施；第三，智力。简短地说，之前的合作主要是在投资和贸易上，但是我们正在转向数字经济时代，要通过一个共同的技术平台来加强互联互通，也要增加投资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比如说利用电子支付、数字支付、数字认证，再用区块链技术提高效率和透明度。第四是该地区的公司治理，尤其是商业准则和商业标准，还有审计和申报的程序和标准。这将帮助我们打造一个高标准的营商环境，最终会惠及该地区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些都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

## 借鉴 PPP 模式， 加强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 丁化美 /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董事



丁化美

我是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的 CEO，同时兼任天津金融资产结算公司的董事长，主要从事交易和结算业务。关于中国 - 东盟多币种支付结算包括市场开放的主题，我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谈一谈我在这方面的观点。

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个是关于多币种支付结算的观点；第二个是关于中国跟东盟合作的；第三个，作为市场参与者，我有一个倡议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观点，关于多币种支付结算。我认为建立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和市场开放，应放在一起来看。交易有 4000 多年历史，金融服务与交易包括金融机构的发展也就 400 年的历史。支付是交易的最后环节，支付是为交易服务的，支付不能限制市场和交易。多币种支付是多边贸易体制机制或者说投资贸易市场开放的一种状态，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从过去、从历史的经验实践来看，完全是技术可行、风险可控的。建立多币种支付结算体系的可行性探索，和全球化、一体化、自由贸易、统一货币、数字货币的探索是同一个方向。

分享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中国与东盟合作。过

去一段时间我司参与过很多国际之间的交往，个人这两年主要是去境外考察参观，特别是跟境外企业的沟通非常密切。从过去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很多重大的里程碑式的基建项目，包括中泰铁路、中老铁路等运输交通建设项目，除了铁路以外还有公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仅 2018 年，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累积金额就超过了 2000 亿美金。

PPP 模式应当作为中国和东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连通机制中一种很有价值的选择，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观点。PPP 模式，作为社会资本和政府合作的一种机制，最早起源于英国，过去 200 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开始采用这个模式。从 2014 年开始，过去的五年中，我国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包括以色列等一系列国家考察过其国家的基础设施，发现 PPP 模式是世界通用的机制。中国在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借鉴 PPP 模式，在过去的五年做了 12000 个项目，达到了 14 万亿额度规模，是全世界用 PPP 机制解决资本问题发展最快、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国家，而且产生了很多包括世界银行都感到很惊奇的一些经典案例。

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中间，有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问题需要沟通，但是机制上沟通更加容易。现阶段，中国 - 东盟的合作，基础设施项目是先行的。PPP 模式是促进中国 - 东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最重要的机制。PPP 模式是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任何国家单边多边的合作，包括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社会资本都非常重要。东盟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都在逐渐采用 PPP 模式满足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尽可能地发挥私人资本的力量，柬埔寨 PPP 模式也已经开始。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受中国财政部的委托，建设了一个中国 PPP 资产交易管理的平台，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国 PPP 项目的再融资和二级市场的流动做好准备，花四年时间来准备。中国 PPP 二级市场的经验，得到



了世界银行的认可。我们希望把这种机制应用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上，PPP 不仅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一种现代化的政府治理机制，还是一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创新金融机制。

第三，基于上述两个观点，我想提一个倡议，机会非常难得，利用这个主题论坛的机会把信息公开，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共建。我们的倡议就是建立东盟 PPP 项目再融资服务的清算系统。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系统，并得到了财政部的认可，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中国财政部以市场化采购机制选中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承建 PPP 资产交易管理的平台。希望与各国再融资的服务系统合作，建立一个相对应的东盟 PPP 项目再融资服务的清算系统，也是多币种支付清算系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

## 警惕中美贸易战升级， 防范抵御金融风险

■ 李强民 / 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 (大使衔)



李强民

2016 年年底，习近平主席在对外使节会上专门讲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变”表现在哪些方面？通常来说主流的观点有几个。

有世界经济实力对比之变，有国际治理之变，有国际思潮之变，还有科技创新之变。当然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发展之变。如何把握这个大变局，因势利导，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我们需要勇敢面对、也要认真思考的一个课题。

在大变局中，金融也面临着很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何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势不可当的。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我们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然而，中国的崛起和复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和帮助，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 40 多年历程，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可逆转，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金融领域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 年 7 月 20 日，国务院推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 11 条措施，可能

2020 年起，金融领域将正式向全球开放。然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金融风险越大，特别在当前中美关系的情况下。

自 2017 年 1 月份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他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推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任性退群的做法，提升了风险指数。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不光体现在贸易战方面，贸易战只是一个外在表现形式。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现在执政的是美国的共和党，美国共和党背后最大的金主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和美国的私有企业。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是企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这是美国对中国认知发生改变的标志性事件，而这份报告对美国政府国内外政策指导是长期性的。

2019 年 3 月 25 日，美国成立了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近 40 个人组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极右翼分子和民粹。他们的鼓动对美国执政当局影响非常大，贸易战打了这么久，美国当局没有想到，中国的韧性这么强。越打我们的主动性越强。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不希望打也不愿意打，但是我们不惧怕打，如果要打，我们必须强力回击，现在在美国也真正体会到了。

因此，贸易战谈判第一阶段，原来说有可能签约。11 月中旬，智利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大会因为内乱无限推迟，给贸易协议的签约带来变数。总的来说，中美双方第一阶段达到贸易协定目标越来越接近了。

然而，贸易战第一阶段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只是把双方容易达成的一些方面写到协议里面。这个协议之后，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在特朗普政权大搞美国单边主义的情况下，即使签了贸易协定，也未必有很强的约束力。2020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为了维护其在 2020 年大选中继续当选，他可能



推出更加民粹的做法。因此，我认为贸易战可能会升级，最后是不可避免的金融战。虽然有一点危言耸听，但长期来看，我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中国的哲学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希望中美关系不断往前发展，维护好、发展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目标，目前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美国这一因素。

## 区域圆桌会议(2)

<b>对中拉经济金融合作的思考与建议</b>	182
埃内斯托·塞迪略，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b>金融如何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以 NDB 在巴西的投资为例</b>	184
祝 宪，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b>反思拉美经济问题，全面深化与中国经济金融合作</b>	186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b>强化金融机构协调机制，打造中拉共赢格局</b>	188
范希文，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	
<b>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研究</b>	190
里卡多·帕斯卡尔，乌拉圭央行前行长	
<b>拉美金融合作的问题与对策</b>	192
叶辅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 对中拉经济金融合作的 思考与建议

■ 埃内斯托·塞迪略 /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埃内斯托·塞迪略

之前,中拉间的交往不管是在贸易还是投资领域,其实或多或少被忽视;而现在中国对于拉美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来说非常重要,它已经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对拉美的经济体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拉美主要的金融合作国家。

中国包括私营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在拉美地区投资。要讨论中拉合作关系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先关注拉美国家现在的经济状况。

考虑宏观层面问题时,根据 IMF 最新的数据,当前的大环境不太乐观,以几个中国参与度比较高的国家为例。

1. 阿根廷。2019 年阿根廷的经济萎缩率可能达到 3%,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通胀情况非常严重。我想阿根廷的经济在 2020 年可能会有所好转,经济衰退率可能只有 1%。同期,很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不

到 1%,希望 2020 年能够达到 2%。

2. 厄瓜多尔。它的经济萎缩率大概是 0.5%,2020 年可能增长率为 0.5%。

3. 委内瑞拉。在拉美地区,问题非常大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其经济在过去 5 年萎缩了 60%,2019 年预计萎缩率可能是 35%,会稍微好一点点。我想委内瑞拉经济的衰退率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世界纪录。希望以后经济的衰退可能会稍微有所缓解,大概为 10% 左右。对企业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委内瑞拉的通胀非常高,IMF 的报告指出委内瑞拉 2019 年的通胀率将达到了 10000000%,而 2018 年甚至更糟,是 2019 年的两倍。

这些数据是非常具有参考性的,未来几年拉美经济肯定会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和调整期,尽管这些改革非常痛苦。拉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经济调整方面做得非常好,当时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当然也要承认,经济的恢复要有好的政策和好的运气,很多公司是借助中国公司的崛起而不断发展,因为中国的商品价格非常稳定。

很多情况下,经济发展离不开运气和政策,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当中吸取了一些经验,我们希望拉美的政府能运用、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积极学习运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知识。

很多情况下,经济发展离不开运气和政策,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当中吸取

了一些经验,我们希望拉美的政府能运用、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积极学习运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知识。

中国在拉美进行了不少投资,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虽然缺乏相应的数据,但我曾经主持过拉美国家的一些圆桌会议,了解一些情况。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在拉美开展了很多业务。我对巴西的情况并不太担心,对阿根廷也是如此。但委内瑞拉的负债数字非常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并不是



要指责委内瑞拉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我想中国的朋友应该对此保持关注,而并不仅仅是关注委内瑞拉当下的情况,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也有可能出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几年前,我和经济学家朋友探讨过一些基本原则。即当某个国家在发展自然资源产业时,应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研究建立出来的原则。不管是对于投资者,还是对于借贷方而言,都需要去了解可能的回报,去仔细地分析目的国及其资源状况和政策及商业模式。

我坚信拉美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复苏,虽然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机,但是我认为我们展现了很惊人的韧性,而且政府也对经济十分重视,也在推行一些利好的政策。

我对巴西的经济非常有信心,而且我想中国和巴西之间的投资、经济的往来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当然因为新政府上台,我们要观察一下后面的政策导向。对于现在的经济调整期,首先要采取的是对必要政策的再观察,看看到底在推行什么样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可能会跟中国的合作更加紧密,也希望中国能够给拉美国家更多的支持。

关于委内瑞拉,不管是它的政治还是经济都在面临危机,委内瑞拉面临着巨大挑战,怎样利用好中国的带来的机会增强自身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 金融如何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 ——以 NDB 在巴西的投资为例

■ 祝宪 / IFF 副主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祝宪

新开发银行 (NDB) 目前在拉美国家进行的业务主要在巴西开展, 因为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 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 新开发银行准备进行扩员, 我们希望拉美能够有更多的成员国, 这样我们在拉美的业务和合作将更加深入和广阔。

以巴西为例, 新开发银行开展的主要工作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巴西正处于深刻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 从基础设施发展和融资的角度而言, 巴西现在面临的局面有以下两点。

第一, 长期以来巴西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过低, 给经济增长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制约因素。

第二, 巴西的财政情况不容乐观, 所以巴西不具备大规模利用预算资金进行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

因此, 巴西政府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尽量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通过 PPP 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这方面潜力还是很大的。

但同时就 2019 年而言, 我们觉得要充分认识和应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挑战和风险。从融资的角度来讲, 现在全世界可使用的民间资本固然很多, 但是民

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是有自己的条件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政府有了相应的措施, 民间资本就一定会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我想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部门情况各异, 应当分类施策来解决融资的瓶颈。

我们认为对基础设施而言, 从融资的角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商业上可行的基础设施。比如说收费公路、大规模城市的机场、商业前景比较好的港口。对于这样的项目, 政府可以通过改善营商环境,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等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在这方面我觉得广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有益的经验, 巴西也是这样子的。

第二类, 具有非常大的外部性和社会效应, 但需要政府给予相当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供水、污水处理、输电线和其他设施等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财务收益, 但是财务收益可能还不够高, 不能够完全吸引私人资本进入, 这个时候政府要通过有效的办法提供支持。比如设立比较好的价格标准, 通过股权投资、担保甚至贴息来发挥公共资源的杠杆和引导作用。

第三类, 属于民生性、社会服务性的公共产品类基础设施。在这一类中, 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 在资金上应该是以公共资金为主, 但是在经营上可以交给民营部门去经营, 以提高效率。

在低收入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时候, 发展融资方面的重点应该是优化债务结构, 管控风险, 不能够做过于超前的事情, 这甚至会让债务可持续性遭受风险。

在历史上, 大家一谈到基础设施, 就认为它是公共产品和服务, 所以应该是政府来承担责任, 政府提供主要资金。但如今在相当多的国家, 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从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资源可行性来讲, 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必须要吸引民营资本。但是如果不区分不同的基础设施类型和财务回报率, 而



采用一揽子的方式去吸引民营资本, 实际上可能事倍功半, 应该进行分类的指导从而采用不同的政策进行处理。

关于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拉美地区可以起到的作用, 应该说, 开发性金融机构特别是传统的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 在拉美地区包括巴西, 已经做了多年的工作, 为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新开发银行作为一个新的成员, 现在刚开始在巴西做起来, 也跟上述机构进行了合作。四年来我们的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已经批准了 40 多个项目, 总金额达到 120 亿美元, 在巴西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项目, 包括一些可能跟中国进行合作的项目。

根据我们的经验, 巴西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而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巴西和中国更便捷的贸易和投资。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项目就是在巴西的北部建一个港口, 完全民营, 我们给这个民营企业提供贷款, 同时中国的公司也愿意建设这个港口, 也进行了一些股权投资。这个港口建成以后, 相当部分的利用场景是促进巴西的大豆向中国出口。这体现了中巴经济的互补性。我们通过跟中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也发现, 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的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资金上, 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 在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 中国企业在巴西是很有竞争力的, 能够承担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

总而言之, 巴西和中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强的互补

性, 如果说我们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把中国和巴西的投资、贸易合作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那将是一个共赢的局面。

# 反思拉美经济问题， 全面深化与中国经济金融合作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IFF 理事、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回顾拉美 90 年代的改革，虽然我们进行了不少宏观经济的改革，但是我们却缺少微观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当前，拉美依然面临结构性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讨论政治问题和其它相关问题，我觉得是不太合理的。经济发展意味着我们必须提高就业率，而不能单单关心 GDP。换言之，问题不仅仅出在宏观经济上，微观上我们也面临不少问题。

2005、2006 年，以及 2008 金融危机后，拉美没能准确把握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虽然中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债务，但这些外债并没有用来促进拉美未来的经济发展。在巴西我们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来形容一直以来的经济现象——“让鸡飞翔”，我们思考如何让经济持续发展，就像是希望让一只鸡去飞翔，但它终归是一只鸡，是没有办法飞起来的，经济陷入增长、停滞的循环，恰如一只鸡的“飞翔”。这个词精准地描述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忽略了一些本质问题。

我们对危机的认识其实还不够深刻，这限制了很多人拉美国家的的发展。尽管拉美各国的国情不尽相同，但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很多拉美国家的人民

饱受痛苦，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积极调整，但依然没有解决拉美地区最重要的问题——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平等，如果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那犯罪率就会不断上升，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拉美地区问题的一些看法，现在让我们把视角回到中拉合作。

从 2001 年到 2005 年，我们吸引了很多投资，建立了众多战略合作协议，我说的合作协议不仅仅是购买石油资源，而是在多个领域双方都有很多合作潜力。过去 20 年间，拉美与中国的贸易增长了近 25 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巴西第五大贸易合作伙伴。当然，不同的拉美国家情况不一样，但对巴西而言，与中国的贸易仅次于美国、法国等国家。我们分析与巴西开展经贸合作的中国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以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公司就已经来到巴西开拓市场。进入 2000 年后，巴西进入了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企业不仅仅需要市场份额，更想得到银行的支持，在 2003 年之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相继进入巴西，这也显示出了巴西在国际化尤其是金融国际化方面的进展。

另一方面，在 2004 年前后，中国加入 IDB 并对拉美进行更多投资。投资的规模一直在增长，从当时的 50 亿美元到 5 年之后的大约 200 亿美元。很不幸，2015 年后，因为政治问题这一数字有所下降。2018 年后，这一数字稍有回升，大约到 100 亿美元左右。这些投资去了哪里？如何衡量它们是否真的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我认为，在其中两个领域中国的投资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一个领域是基础设施，巴西每年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赤字。以大豆为例，巴西生产的大豆是世界上最好的大豆，但在把大豆从产地运到港口的过程中，我们会损失 20% ~ 30%，这是非常高的成本，让巴西的大豆变得缺乏竞争力。中国在通过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巴西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样的合作也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具有竞争力。当然，我们也



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比如税收政策，不然也不行不通。

第二个领域是中国帮助拉美经济体创新经济融资。这样的合作能够帮助拉美国家迎头追上，尤其是在一些很重要的领域。例如，墨西哥、巴西、乌拉圭在生物医药方面的技术非常好，我们的科技创新活动很强，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体系来帮助这些创新活动，尤其是在进入经济调整期时。所以，拉美的银行在提供融资时总要求抵押品。目前，虽然已经有很多的中国银行在拉美地区提供贷款，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不仅仅是在商品贸易方面合作，也需要向中国学习在创新经济方面怎么样迎头赶上。

总结一下，我的建议有两点。首先，拉美需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投资，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问题不在中国，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与拉美合作；而在于拉美，我们是否想清楚了到底往什么方向走。其次，我们能否推动一个共同的、互补性的议程。如果中国与拉美能够达成一致，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合作前景就会更加广阔，甚至超过美国、欧洲。

# 强化金融机构协调机制， 打造中拉共赢格局

■ 范希文 / 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



范希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也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于 2015 年下半年成立的，同时成立的还有欧亚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等六七支同一层级的基金。如果比较基金活跃度、融入当地经济的程度，中拉合作基金在这些顶级的“一带一路”相关基金中首屈一指。

中拉合作基金的愿景是支持中国公司走出去，同时有一个国际区域的侧重，这是基于同期成立的基金各自确定的不同重心。中拉合作基金主要围绕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合作，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商品贸易和制造业发展等，投资业务范围非常广，除了土地购买交易、零售行业等，其他的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其实我们都所涉及。

目前我们基金有九个大项目，五个在巴西。从中国和拉美合作的大趋势看，2016 年中国对拉美投资额达到 196 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当然由于政治原因，实际上 FDI 有一些下降，但投资额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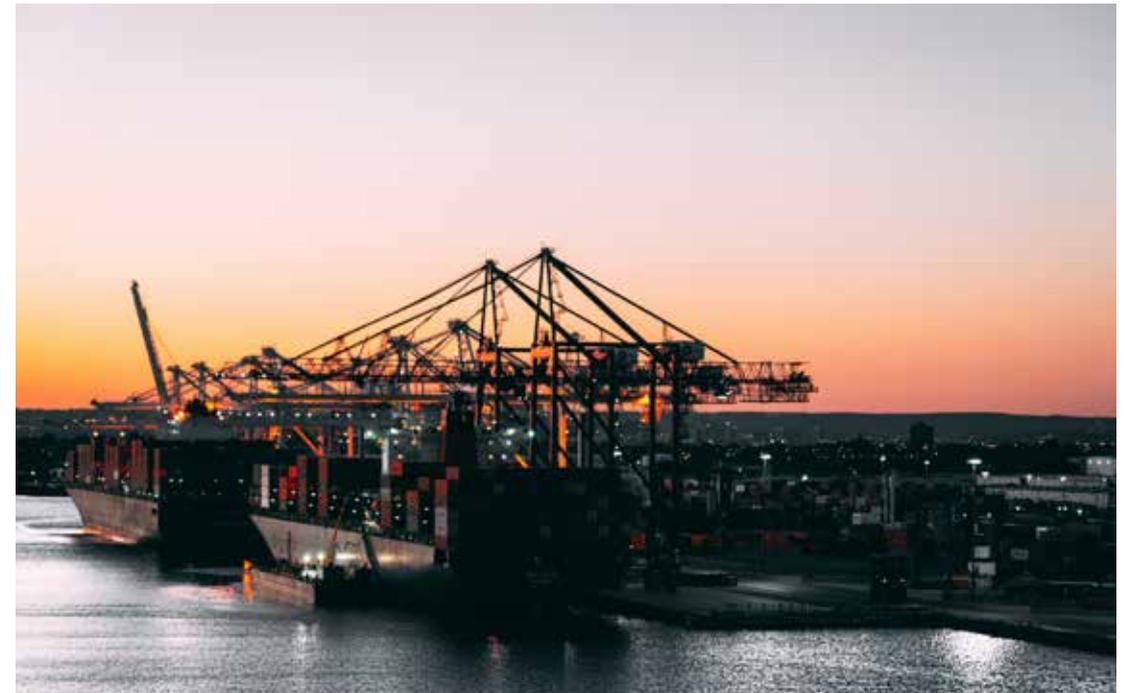
我们在拉美国家的投资是跟贸易紧密联系的，2018 年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 3000 亿美元，

那一年的投资则大约在 1200 亿 ~ 1300 亿美元之间。目前，从流量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有时排第三）；从累计对外投资额来看，大概是第五或者是第六的水平。虽然从累计额来讲，中国依旧排在美国和欧洲之后，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非常强劲，而中拉合作基金也是非常积极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基金非常重要的业务方向，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大，可能存在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缺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中国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全部的建设，所以我们希望把各方的力量都汇聚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处也很明显，比如说一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创造更多 GDP。在具体执行方面，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大趋势，中拉合作基金将去满足这些需求。

首先，我们看到巴西的经济中心正在从南部地区往北部地区转移，在北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慢慢地越来越多，当地政府也非常支持这些建设。目前，巴西的东北部州政府建立了一个联盟，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次一个趋势是，拉美国家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可以替代一些传统的能源供给方式，它会带来产业变革，使能源更加绿色，有助于控制气候变化。因为我们意识到传统供电方式的不稳定性和对环境的巨大影响。一次能源目前占巴西发电量的 60% ~ 70%，但非常不稳定。我们要保障这些能源供电的稳定性。最后一个趋势是，不管是哪个政党主导的政府都越来越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在巴西卫生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问题。现在巴西和南美的卫生资源分布非常不均等，一些地区医疗覆盖率大约是 10%，而一些城市则达到了 80%，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一鸿沟、大量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满足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总之，我们与拉美的合作涵盖了方方面面。我们觉得拉美地区不仅仅是需要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还需要社会政策方面的变革。巴西最近通过了养老金改



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措，未来十年，这可以帮助政府减少大约 8000 亿美元的成本，能够让当地政府更好地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拉美国家要打造或者说维护一个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要能够帮助外商满足自己的目标，也希望拉美地区能够管控好自己的风险、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外汇方面的风险。当然，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对于中拉合作基金和拉美金融机构来说，有很多的领域是可以共同合作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共同措施。我们需要在双方之间打造更好的分享和沟通机制，去了解拉美当下的情况，尤其是拉美现有的金融投资机会。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沟通渠道，但我觉得还不够。虽然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遇，但对中拉合作基金和其他不同背景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在当地的存在感并不高，应该在当地设立办事处，这样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希望中拉合作基金能够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共同合作，尤其是当地的投资银行，也包括与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合作。我感觉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中拉合作的前景很光明。要打造双赢的局面，我们不仅仅要知道中国公司到拉美投资的意图和动机，同时也需要知道当地政府的一些想法，还有当地社区

的看法。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强化协调，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来实现更大程度的双赢。

#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 因素研究

■ 里卡多·帕斯卡尔 / 乌拉圭央行前行长



里卡多·帕斯卡尔

全球最近的 FDI 增速趋势是下降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发展中国家 FDI 增速放缓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例如，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了大概 13%。排名第一的是巴西，第二是墨西哥，大部分的 FDI 来自于中国、欧洲和美国，38% 来自于北美，20% 来自亚洲。

在过去十年中，FDI 极大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而且它也推动了很多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也会流入到公共和私营企业。在乌拉圭，他们可以用任何的货币来进行贸易，乌拉圭政府对外商和本国的企业都一视同仁，也没有什么登记和入住的限制要求，企业面临相同的税收体制，政府还会在投资方面豁免一些公司税。这在拉美是比较优秀的制度环境，乌拉圭外商直接投资大约占 GDP 的 5.6%，仅次于智利。但我们也还面临一些财富分配等问题，需要靠经济发展来解决，我想就这几点来做一

些分享。

我们想要打造一个知识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会帮助我们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提高生产力首先是靠技术，并且要引入竞争，以此来鼓励公司使用新技术。现在我们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外国公司一定是因本地的经济利益吸引而来的。对于投资的公司来说，当地国的政策环境、工人的熟练程度还有劳动力的培养情况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想要在竞争中胜出，尤其在外国市场当中胜出，我们必须把技术、组织还有熟练的工人这些营商环境都保障好。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并且在整个供应链、牌照的发放方面都要提供一些便利；而且要推行鼓励性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措施能够帮助投资更加顺畅地进行。

实际上，在全球的贸易和跨境投资当中，市场环境对于 FDI 非常重要。我们十分清楚的是，投资是基于我们的盈利能力和最终的项目盈利性来进行决策的。在这方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论断。

第一，在确认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第二，我们对于未来经济利润的回报预测，有时候不一定是准确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 FDI 的项目是基于一些激励政策的刺激，而不是基于本国真正的经济环境基本面趋势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只有在一个国家提升了他的技术水平、创造了良好的就业环境，而且经济增

长的环境和前景好的情况下，FDI 才能够顺畅运行。很多国家想吸引外国投资，最重要的其实是创造他们本国的环境，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才是吸引外国投资最重要的本质。我想强调的是，一些投资激励的政策，有时误把聚焦点放到外国的公司上面，而忽略



了本国环境的改善。但实际上在很多项目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策略是不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投资真正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是本国的投资环境。

所以，所有的投资激励政策都必须考虑到本国经济环境的引导。因此，FDI 政策其实是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刺激政策或者说投资刺激的优惠政策，它可能也要包括很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另外也要考虑怎么样协调多个投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

良好的投资刺激政策需要把焦点放在创立优良的外部环境上，让外国的公司和当地的公司教育、培训、研发等方面结合起来。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在 FDI 中，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从历史案例来看，只有保持可信任，才能获得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成功。

# 拉美金融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 叶辅靖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叶辅靖

这些年，中国与拉美的金融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受到了拉美人民、拉美政府和拉美各界的积极欢迎，合作的空间不断增大，金融领域的各项共识不断达成，金融合作顺利推进，基础也越来越扎实。这一点可以从拉美的反映中看出来，他们认为中拉金融合作目前更加注重廉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民心相通，更加注重包容性发展，更加注重把合作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应该说对中拉合作做出了整体上比较积极的评价。

基于对拉美的实地调研，中拉经济合作目前还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这些共性的问题从中方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合作的良好政治氛围经常面临着挑战，挑战有的是来自外部势力的影响，有的是来自于政府党派的更替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拉美政府在治理能力方面还有一些问题，而且当地的工会力量也普遍比较强大。

第二，中方反映的突出问题是币制不稳定给双方的金融合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指中拉合作中，以美元为主要的结算货币，而拉美国家的汇率波

动较大，本币兑美元经常贬值，这给中拉经济合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三，与当地市场的关联度有待提高。这里面有中方自己的原因，包括我们对当地市场软性的、硬性的法律、政治理解不够。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了解当地的经济法律事务、与当地有联系、有影响力的人才不够。因为我们的起步时间不长，会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对方国家从表面上看整体市场开放度比较高，但是在事实上的开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我们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不断增加，但不少分支机构仅仅是办事处，主要服务对象依旧是中资企业和海外的中国公民，而进入当地的市场还是面临着不少的障碍。

从拉方的角度来看，中拉合作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在拉美投资的行业过于集中，过去是矿产，现在增加了基础设施，但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涉及度不够。

第二，从宏观上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的存在感远大于拉丁美洲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存在感。中国的金融机构对拉美的影响远远大于拉美机构在中国的影响。

总结起来，拉美国家反映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行业过于集中，二是二者关系作用不太对称。下一步如何加强中拉合作？

第一，要大力提升双边的政治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大力提升政治友好关系必须建立在我们的经济可持续性上，如果经济不可持续的话，将来势必会影响政治和经济关系，特别是我们要更加注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这既是对拉美国家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国家负责。

第二，必须要适应双方产业经济结构以及相互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创新金融合作的领域，用新的方式、新的手段实现新的突破。

第三，拉美国家要更好地利用中国金融开放的机

会，增加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存在，更好地利用中国金融开放的机会，为拉美的发展服务。

近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开放明显提速。比如说在银行领域，市场准入、持股比限制几乎全部取消了，而保险、证券的股比上限，一方面限额已经大幅度提高，另外一方面部分限制也会进一步取消。除了边境准入环节，境内中国也在进一步对外开放。当前中国建立许多自贸区，许多地方把金融发展、吸引外资金融机构，作为发展金融服务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也为拉美国家利用中国金融开放的机会，增加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提供了便利。

针对如何克服汇率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提出了解决方案。第一，建立新的支付结算体系；第二，增加人民币的使用比例。这些方向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建立新的支付体系也好，还是提高人民币使用比例也罢，都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新支付体系会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也有和其他现有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结合的问题，还有相互联系的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新体系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现有支付体系脆弱性的问题。而单纯地提高人民币使用的比例，仍然会面临着因为经济发展不稳定或者其他方面导致的币值不稳定。所以解决汇率问题要多管齐下，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方面。

一是在提高人民币使用率的同时，双方合作可以采取减少币种错配的缓释措施，适当增加当地货币计

价负债，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实物交割。

二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和对方的金融机构要更好地合作、更好地配合，开发性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要更加配合，更好地使用金融工具来规避各种金融风险。

我们要特别重视加强对政治经济形势的研判，不仅仅是对经济形势的研判，更重要的是对政治形势也要加强研判，选出合适的时机。同时，新的增长点要与时俱进，要探索开发性金融合作的新增长点。双方可以共同出资设置科技创新、产业引导资金，可以在现有的合作基金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可以拓展传统商业银行的合作新空间，可以在新兴的合作领域打造供应链金融合作，可以找到金融科技合作的新亮点，也可以将寻找支付结算合作作为新的突破口。

最后，关于如何拓宽投资领域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讲，除了在经济领域要拓宽到其他行业之外，还要更加重视在社会领域、卫生教育、科技这些方面的投资。对这些领域投资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当地人民对我们的质疑，也可以增强民心相通。这种投资对我们未来的合作有其他方面的好处。我们现在投资产业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主要原因只是双方的契合点、双方的需求，我们需要尊重这种经济的客观规律，投资领域的拓宽也必须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 发挥好资产配置 在养老金投资中的重要作用

■ 陈文辉 / IFF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陈文辉

OECD国家50.7%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从养老金的储备结构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养老准备基金占到了83%。以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个人储蓄金、商业保险的第三支柱,仅占17%,政府承担绝大部分的养老责任,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国家财政将难以负担。这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动第二支柱,特别是第三支柱的建立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建设将使得养老金资产管理行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从养老金储备的投资运营情况来看,全国社保基金是最早开展市场化投资的,成立近20年来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是8.05%,较好地实现了养老储备基金的保值增值。基本养老保险之前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和国债,收益率也比较低。

2015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提高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并加强投资运营,允许集结到省级财政专户的养老基金,委托给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同时也放宽了投资范围。截至2019年10月份,社保基金理事会已经先后和18个省区市签署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是9660亿元。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到2019年年底总金额肯定超过10000亿。虽然只是从2015年8月份归集起来到现在,运营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了5.89%。另外就是企业年金,投资范围比较广,主要委托具有资质的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等,进行投资运营,近十年平均达到了6.97%,超过了通货膨胀率。

这是养老金大概的情况。养老金具有规模大和周期长的优势,但是风险偏好较低,监管也比较严格。管理机构必须充分考虑养老金特有的属性才能够做好养老金投资管理工作,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在管理全国社保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过程中,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理念,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这些经验能够给其他的养老金管理机构提供一些借鉴。今后,我们将加强对资产的研究。

我这次主要谈谈养老金的投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密切关注老龄化进展形势,持续加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从1997年到2011年,先后建立了以城镇居民为主的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目前已经覆盖了9.5亿人,累计超过5.8万亿元。此外中国政府于2000年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是一个战略储备基金。

我现在服务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就管理着这个基金,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基金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持的补充调剂,目前总资产大概是2.5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储备基金的建立,在有限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满足了基本的民生需要,较好防范了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因为老龄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中国未富先老,特别是过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问题其实更严重,这里也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从养老金的规模来看,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出现在经济尚不发达、国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呈现未富先老的特点,现在养老金的储备大概是1.1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仅为11.4%,与

## 区域圆桌会议(3)

发挥好资产配置在养老金投资中的重要作用	195
陈文辉, IFF 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	
推动两岸绿色金融和风电产业发展	197
史纲, 富邦证券董事长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经验和成效	199
邱亿通,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做好养老金融规划	200
桂先农, 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阶段和成功经验	202
贝多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多措并举推动普惠金融惠及社会各阶层	204
朱润逢, 高雄银行董事长	

第一是发挥好资产配置在基金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有效的资产配置是大型养老金获取长期收益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小资金可以靠抓市场的机会，大资金主要还是把配置工作做好，这是战略的事情。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保基金理事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产配置体系。从资产配置来看，社保基金资产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衰退和经济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如果要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就必须放眼全球，加大境外资产配置。一个方面是通过区域配置分享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红利，在全球产业链和经济周期中寻求各种投资机会，多样化投资主体。另一方面跨市场资产的相关性显著低于单一市场资产，通过境内外跨市场的不同搭配，能够提高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

通过这种大的配置，包括境内的和境外的，也包括固定收益的，有一级市场的投资也包括二级市场的投资。我们各类资产的配置过程中，也有严格的纪律。比如在二级市场，配置比例有限制，如果是在股市涨的时候，我们的趋势应会大幅度增加，但如有纪律要求，也会减持。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二级市场股票的市值会比较低，要等跌到底线，才会加大投资力度，作为长期资金，我们的投资心态还是比较好。这是一个大的资产配置。

第二借助外部的力量，开展委托投资来提升效益。考虑到我们的人力以及激励等方面的因素，直接投资主要是运用存款，大型企业的财务性投资大概占到总资产的一半，其余资产多是借助优秀的投资机构开展投资。

自成立以来，有 40 多家国家指名的基金管理公司和 20 多家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成为社保基金的管理人，帮助社保基金开展在公开市场的投资，为社保基金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境内，我们委托的资产管理人的投资收益率，应该说是都比较大程度地战胜了基准利率。

第三个是聚焦重点领域，抓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投资机会。从增量上来看，中国创新企业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养老金具有长期属性，符合科技投资长周期的特点。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同时，分享科技创新的经济成果。当然我们有一些是直投，有一些是通过 PE 投到高科技企业上去，比如像阿里、蚂蚁金服，还有其他的高科技，比如 AI 领域。

从存量上来看，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有较强的技术积累、人才储备和信用优势。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发挥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市场化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国企混改资

金需求量多，投资优质的项目可分享改革的红利，我们在这方面也积极参与，支持国家大战略，混改国企改革战略也带来体制机制的优化提升，迸发出了比较大的生产率。

在投资策略上，借助市场上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开展项目投资，发挥他们在科技领域的专业优势，运用国企混改中的经验，控制风险，并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 推动两岸绿色金融和风电产业发展

■ 史纲 / 富邦证券董事长



史纲

过去三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在绿色金融尤其是风电方面产生了非常大的突破。当然，这与日本福岛发电厂的核灾有很大关联。亚洲工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污染，空气污染也是一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因为风电科技的发展，带动了风电电费补贴率急速下降。2018 年，德国的风电已经不需要任何补贴，完全走向市场化。未来风电会超过整个亚洲从现在到 2030 年所创造出来的发电量，会超过整个美国的发电装机容量。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量还是在中国，中国大概有 188GW 的累积量。

未来两岸可以在全世界最好的风场——台湾海峡上加强工作。根据已有研究，全球 20 个远洋风场里有 16 个是最好的，其中就有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两岸资源共享地，如何在台湾海峡发展风电产业和未来的产业链，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国台湾地区的执政党颁布了“非核家园”政策，未来在台湾海峡的风电场会有 10GW ~ 15GW 的大型开发计划，希望 2025 年有 20% 的发电量是绿能发电。美国风电的购电价格现在更低了。从 2009 年开始，风电的价格基于科技的创新和其他的因素急速下降。

绿色低碳的能源转型需要金融业的支持，这点毋庸置疑，所有的绿色金融在银行都有专门的融资，在保险有经营设备的财产保险，在私募基金上有股权投资，这些事实上都是支持绿色金融的重要金融基础建设。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 2025 “非核家园”的目标，其实在绿能发电上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非核”是另外一件事。绿能发电在低成本的情况下是全民的共识，如果能达到低成本不需要过度补助的话，大家是接受的。

过去两年台湾离岸风电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示范奖励，涉及的风场容量 0.23GW，但是风电购电费是 5.8 元，按目前风电价格算是非常优惠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比较好的优惠措施，吸引大量的海外尤其是一流风电 PE、制造商、基础设施建设商来参与这个计划。

第二阶段是潜力场址，涉及 5.5GW 的发电量，遴选的部分风电溢价现在已经从 5.8 元下降到 5.5 元，未来还会继续下降。竞价价格是原来购买电价 5.8 元的一半，也就是 2.22 ~ 2.55 元。这个竞价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竞价是 2.22，为什么要花 5.8 元购买？我们了解到台湾在第一阶段的 5.8 元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全球一流的厂商进来做基础建设，所以在第二阶段潜力场址上牵扯到 3.8GW 的建设，要求中标的厂商必须把建造技术和整个产业链带到台湾地区。整个风电产业链的设计、建设、安装、维护工作正在台湾地区进行。

第三阶段是区块开发，每年释出 1GW 风场产能，共将释出 5GW，最终会有 10GW ~ 15GW 以上的大型风电场的开发。

这些计划引起了国际上非常大的关注，以前台湾在风电领域只是试验性质。只有台电比较零散地做了一些，国际大厂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是，这三年因为风电的开发牵扯到 15 个 GW，绝大部分国际大厂，像日本东京电力、丹麦海上风电巨头沃旭能源 Orsted、Machuarie 等国际大厂都进驻台北，参与相关的风电计划。尤其在第一示范阶段，Orsted、日本东京电力赚了非常多的钱。因为它投入的量很小，成就了比较大的风



电市场, 所以后来的风电市场也会比较顺利,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风电产业链不只是电的问题, 尤其是远洋风电, 从涡轮发电到安装都要考虑, 因为设备太大了。如何打造风电产业链, 如何运到外海, 在外海如何安装, 怎么进行设计, 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在这个环节中受惠最多的是台湾地区的两个公司, 一个是中钢, 是做钢铁的, 另外一个台船, 是做船业运输的。台中港是临近风力发电远洋区的重要港口, 所以大部分工厂建立在台中港。台中也是台湾地区很重要的机械制造基地, 所以台中的厂商在台中港沿海发展了很多相关的全球风力基建系统, 设立组装厂 15 家以上, 本土从业者可以进入国际供应链, 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结果。台船和中钢在制造材料、运输方面都获得了比较大的科技进展。人才培养方面, 台湾地区的中山大学在高雄是非常好的, 台湾的成功大学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也很好, 还有台湾地区风能训练公司、能源局委托金属中心开办的离岸风电产业人才培养。可见台湾地区在离岸风电方面确实有了一些进展。

未来两岸合作发展风电是个非常好的绿能发展合作项目。

第一, 共享台湾海峡——全世界最好的风电风场。台湾海峡是两岸共同拥有的, 台海风场的共同规划和开发是非常好的绿能合作项目。中国大陆有非常好的基础建设, 大陆的风电尤其是内陆风电做得非常好。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公路上, 旁边有一辆运着风车的卡

车过去, 走了大概 15 到 20 分钟, 车身才超越我们, 那个车非常大, 新疆的风场做得非常好。可见中国大陆的风电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基建方面。未来两岸如果能够在风电领域做共同规划和开发, 我觉得可能要比天然气或其他方面更理想。因为天然气的运输是比较烦琐的, 如果能够在台湾海峡建立风场是非常好的, 不但是绿能, 而且能促进两岸和平。

第二, 两岸风电产业链的结合。因为台湾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营造会有欠缺, 但是台湾在机械业、制造业, 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工匠精神, 高阶的铸造做得非常好, 未来加强这方面建设, 再结合大陆的经验, 会有很好的结合效果。

第三, 两岸绿色金融与风电项目融资的结合。这点毋庸置疑, 可做专案融资。

第四, 两岸共组风电产业基金, 进行绿能基础建设投资。这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永续经营, 是我们这一代可以帮下一代做的事。

## 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的经验和成效

■ 邱亿通 /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邱亿通

我简要介绍一下广州绿色金融发展的情况。

2017 年 6 月广州获批成为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 这是全国一线城市中唯一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截至 2019 年 9 月末, 广州地区银行机构绿色贷款营业额大幅增加, 全市累计获批各类绿色债权 638 亿元, 新增绿色保险收入 488 亿元, 三项指标在各实验区中排名第一位。2017 年以来, 新增绿色股权 421 亿元, 全年交易市场发展较快, 广州碳交易所的碳配额现货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 1.33 亿吨, 排在全国首位。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近年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报告中, 广东绿色金融发展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第一, 以上是广州绿色金融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

一是创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核心实验区、示范区。重点打造广州绿色金融街。在广州北部的地方, 建设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展示中心, 为绿色金融结构和绿色企业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综合政务服务。

二是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规范体系, 我们制订了绿色企业认证规范, 建立全市绿色项目库, 为项目进

行认证。截至目前绿色项目 536 个, 同时我们联合香港、澳门推进大湾区绿色金融标准的对接, 我们也希望跟香港方面开展合作, 推动两岸绿色标准的对接。

三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组织体系, 我们积极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专业部门, 配备绿色金融专业团队, 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的专业性。截至目前, 广州绿色金融街道进驻绿色金融机构 631 家, 绿色信贷产品, 比如建行发放的实验区首笔碳排放权抵押贷款, 首创了绿色网络供应链的产品, 第二个创新绿色保险产品, 是广东万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试点。

四是夯实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 建设绿色项目对接会, 系统解决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项目的不对称问题。同时大力应用金融科技, 打造绿色支付工程, 广州有超过 4000 辆公交车已经实现了支付宝、微信二维码扫码乘车, 地铁也率先成为国内应用移动支付技术最先进、方式最丰富的地铁线路之一。

五是加强绿色金融合作。绿色金融专场论坛,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绿色交流对话。

六是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控机制, 七是推广绿色金融试点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 建设绿色金融。

总的来看, 广州绿色金融发展的成效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拓宽绿色产业的渠道, 全市绿色产业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 融资超过 8000 亿元, 有效缓解了绿色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 建立绿色产业优惠政策, 我们积极出台扶持政策,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不断降低绿色企业的成本, 2018 年到 2019 年 4 月份, 我市累计落实税收优惠 888.67 亿元。

第三, 促进主导产业的绿色转型, 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以及企业节能环保的绿色改造。

第四, 增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建立绿色金融风险补偿和正向激励机制, 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广州将进一步强化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为绿色广州、绿色大湾区而不懈努力。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支持广州绿色金融发展, 为广州绿色金融发展把脉支招, 贡献真知灼见。

# 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做好养老金融规划

■ 桂先农 / 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



桂先农

2000 年前孔老夫子就表露过他的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目前两岸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快，如同明朝文学家汤显祖在《南柯记》里写“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如同时光飞逝，所以怎样把养老金融规划好，老有所终，是目前非常急迫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养老社会应该有的体系架构进行一个说明，要有“保障金字塔”的观念，这是世界银行在 1994 年的研究报告——《避免老年危机》中提出的概念，“保障金字塔”分成底层、中间层和顶层。

第一层——底层，在普及化的前提下，根据民众的身份，政府用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险为民众建构一个基础的保障，这是政府要负责的部分。第二层——中间层，通过多元化的退休金制度，由雇主为员工建构。第三层——顶层，这是个人通过自己自主筹措资金，自主理性投资进行商业保险的规划，来补充第一层第二层保障的不足，以此规避老年风险。

高龄生活的状态。依照年龄跟身体的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间，即健康期、卧病期、残辅期。台湾地区规定 65 岁退休，大陆规定 60 岁退休，60 岁到 75 岁之间，这样的高龄者身体还很健康，还可以四处走动，这段时期

是健康期，最大的风险是退休金不够。75-85 岁之间，这样的高龄者身体健康状态开始恶化，医疗的需求增加了，经常要去医院或诊所看医生，这段时期叫卧病期，医疗费用准备不足是最大的风险。85 岁以后，很可能发生失智失能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认识自己的子女，不能自己穿衣、吃饭，这样的高龄时期是残辅期，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或相关人员进行辅助。如家人不能协助，不管是居家照护还是机构照护，目前台湾地区的行情是每个人需要的费用为新台币 3-6 万不等，约人民币 7000-14000 元，所以照护费用准备不足是这个时期最大的风险。

高龄生活的保障缺口。在健康期，高龄者退休以后的所得替代率很重要。所得替代率就是每个月退休金占在职时每个月工资的比例，健康期所得替代率的缺口主要是退休金缺口，针对健康期，要考虑怎么解决高龄者面临的退休金准备不足的风险。第二是卧病期，高龄者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准备不足是最高风险。全台湾地区医疗费用的 44.3% 是用在老龄人口上，65 岁以上老龄人群最近三年住院平均每人每年花费新台币 12.8 万，约合人民币 3 万元；门诊新台币 6.9 万，约合人民币 16000 元。此时重点是解决高龄者在卧病时期面临的医疗费用准备不足的风险。残辅期，养老社会应该有的体系架构，重点是弥补高龄者在残辅期医疗费用和照护费用准备不足的保障缺口。

2018 年，台湾地区男性平均寿命 77.5 岁，女性是 84 岁，全体民众平均年龄 80.7 岁。台湾地区在 2018 年已经迈入高龄社会，100 个人里有 14 个人以上是超过 65 岁以上的高龄者，2025 年会迈入超高龄社会，100 个人里有 20 个人以上是超过 65 岁的高龄者。

依照世界银行“保障金字塔”三层保障的概念，来说明台湾地区的养老金融架构。台湾地区养老金融架构第一层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依照身份不同分别设立国民年金、劳工保险、公教人员保险、军人保险、农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医疗则排除身份差异，减低全民的健康保险，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目前对于高龄者，台湾地区也提出“长期照护十年计划 2.0”的制度。

台湾地区养老金融架构的第二层，也是属于中间层的保障，是由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的雇主为员工提供的退休金计划，包括劳工退休金制度，企业团体保险等，是由雇主为员工建构的退休制度和筹措老年经济财源。台湾地区养老金融架构第三层，也就是顶层，是通过个人的理财行为和商业保险规划，补强底层和中间层保障不足，规避老年的风险。

台湾地区目前的趋势是所得替代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高龄风险的三大缺口最好是通过个人自主性的商业保险，分别借由商业的年金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来弥补，这三种商业保险可以依靠个别需求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应对风险。目前台湾地区最常见的保险是以利率变动型年金保险为主，通过浮动利率获得比较优厚的年金。卧病期，商业医疗保险、癌症保险可以应对准备不足的风险。台湾地区目前的产品是实支实付型的保险，通过提供高端器材和药材的费用来补足缺口，一定金额以下的费用自己付。超过这个金额保险公司赔付，这样的保险产品保费比较便宜，更能符合保险保大不保小的精神。在台湾地区，长期照护保险只占商业保险保费收入的 0.53%，183 亿台币，成长空间还很大。

台湾地区在资讯服务方面也有发展，比如我自己服务的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已经在官网上建立了高龄化保险

专区和脸书平台。2014 年修订契约转换规定，对契约进行大幅开放的转换，把自己持有的终身授权的保单转换为高龄保单，是减少对子女依赖的有效措施。台湾地区有小额终老保险，是支持机构提供的保障，以新台币 50 万元为上限的商品。

年金保险年轻化后，保险公司往往约定保护不得解约，实际上保护在资金运用的弹性上是有一些限制的。长期照护保险发展困难，主要有四点原因。

一是民众普遍低估所需要的费用，二是比较难以感受到长期照护保险的迫切性，三是三方对于是不是符合长期照护的认定不能取得共识，四是长期照护的认定需要定期检查是否还符合长期照护的认定标准。在保险基金运用上也有一些困难，需要公共部门提出很多具有现金流量的案件。

高龄化要面对的冲击是退休金不足和健康状态下降所带来的风险。针对高龄化的风险，政府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是提供给人民应对高龄化风险的一个基础保障，商业保险可以提供给人民弥补应对高龄化风险基础保障不足的风险。高龄者可以用年金保险来应对健康风险的缺口，以健康险和长期照护保险来面对残辅期的风险。



#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阶段和成功经验

■ 贝多广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贝多广

今天跟各位专家报告一下，我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观察。中国金融发展走过了 40 年历程，40 年前中国可以说基本上没有金融，是计划经济，财政作为主导的分配方式。

中国开始建立现代银行体系，大概花了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1984 年中国建立了中央银行，跟其他商业银行分开，商业银行开始走向商业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建立现代银行体系开始的第一阶段。

大约到 2005、2006 年，中国走向资本市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体系，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金融发展如果仅仅靠银行，很多长期性的基金、资本性的投入就缺乏一个很好的渠道，银行主要是提供短期的资金，这个时候社会对资本市场有很强需求，中国 1990 年和 1991 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股票交易所，建立起资本市场。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现代的资本市场体系，除了金融期货跟国际最发达的市场还有一些距离以外，其他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也是相当成熟的，也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在现代银行和现代的资本市场体系建立以后，金融发展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中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以及

人口当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实际上被现代银行体系和现代市场所排斥，或者是为其服务不够。差不多十一年前，中国开始比较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是逐步发展起来，我称之为中国金融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整个金融体系重新优化改造，变成一个更加包容的体系。

普惠金融是怎么演变的呢？2007 年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国内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把孟加拉国、拉美等海外模式引进到中国来试点，专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个试点进展到现在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这里面一部分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真正的微型贷款是有一些很成功的公司，但是整体来说发展还是比较有限。这里有各种原因，中国小贷公司发展好的时候有八九千家，现在这个数字在减少，反映出这些小贷公司并不是国际上真正意义的微型信贷，他们做中小企业服务，他们的客户实际上是银行不太愿意覆盖的生产链下端客户。小贷公司由于先天原因和监管原因，面临一些困难。在我看来，这个行业现在处于增长状态，这是一个领域。

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中国监管部门主动推出的村镇银行。因为现代银行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集中在城市里面。对于乡村金融需求怎么满足？国家采取措施，差不多十一年前，开始推出村镇银行，特别注重给农村现代化提供服务，现在发展有十来年。村镇银行有一些致命的问题，因为要求所有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主办方，就是得有现成的大银行来办村镇银行，这个要求跟村镇银行要去覆盖的乡村客户要求显然是有冲突的，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从村镇银行的领域来看，现在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第三个领域，中国银行业全面进入普惠金融，大概是在 2017 年。世界各国没有让全国所有的银行做普惠金融，当然中国做得非常有效，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银行到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农商行，全面开展普惠金融业务。这既是国家的要求，同时从银行自身来说，也是业务发展的战略要求。现在也在进行当中，成效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的普惠金融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几乎覆盖了所有能够覆盖到的中小微企业和乡村人群。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在普惠金融方面推出了金融科技，在这个领域起到了一种鲶鱼作用，覆盖了很多传统银行没有覆盖的客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归纳起来，就是这四个方面，应该说普惠金融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关于金融科技方面展开说一下，数字普惠金融是中国普惠金融最明显的特色，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数字支付，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人群，不管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支付。

这还仅仅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第一阶段，已经比较成熟了，甚至开始走向世界。中国正在发展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第二阶段，就是数字信贷，特别是数字微型信贷。这个技术有很大发展，很多客户完全是白名单，就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向一些银行或者机构来申请贷款，非常快，获得 Yes 或 NO 这样一个答复。

中国未来在数字理财方面会有很大进展，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做法，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这是第三阶段。特别是理财方式，不仅仅是在城市里发生，将来可能在乡村发生。农民、农户都会采用数字理财的话，那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将会出现一个非常新的格局。

简单地说一下中国普惠金融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府重视。2016 年 1 月颁布了推进普惠金融五年规划，动用国家力量推进普惠金融的实施进程，促使其得到全面贯彻。其次，中国走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并没有像孟加拉国那样，成立一个格莱珉银行（乡

村银行）。我们是完全让现有的金融机构全面投身于普惠金融。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这也是中国普惠金融取得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天在座的好几位都是台湾资深专家，从推进普惠金融角度来看，我们还有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问题，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问题，我知道台湾农村建设，特别是运用金融力量来支持农村有很多经验，我们特别期待将来在中国大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能够学到中国台湾的宝贵经验。

# 多措并举推动 普惠金融惠及社会各阶层

■ 朱润逢 / 高雄银行董事长



朱润逢

我是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那个年代银行是有钱人才去的地方，现在普惠金融就是要打破这个思维。联合国在 2006 年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认为各国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普惠金融制度，让这个金融服务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让边远地区、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村地区都可以享受金融服务。所以普惠金融也是个让大家远离贫穷的金融。

台湾地区对于普惠金融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视的。台湾实施普惠金融的措施，第一是推动金融友善的服务。比如银行的营业场所要是没有障碍的空间，ATM 场所也是无障碍的空间。第二是协助中小企业取得融资。第三是鼓励在金融服务较欠缺的地方设立据点，金管会对于台湾的银行设立有标准，但是对于偏远地区完全是开放的。第四是推行微型保险和小额保险普及弱势群体。第五是打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在 2019 年 9 月份开放了三家网络银行。第六是发展移动支付和电子化支付，这方面台湾发展得比较慢，至少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大陆这方面是值得学习的。强化金融教育的宣导与全民金融知识的普及，推动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法，对消费者进行保护。

台湾目前是金管会在积极推动普惠金融，在台湾的中小企业也是弱势群体。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 1974 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台湾向韩国和日本学习信用保证制度，所以在 1974 年成立了台湾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台湾的中小企业注册标准是资本额在 8000 万台币以下，雇佣员工人数在 200 人以下。因为台湾的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 98%，就业人口也将近 80%，所以除了银行体系，金管会也要求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且制定了奖励办法。最近十年来每年成长大概 10%，对于前三名都有奖励。台湾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政府规定最低要达到 60%，也就是银行放款 60% 一定要给中小企业。

1974 年台湾有了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这个基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是以财团法人的方式成立，现在保证手续费是 0.325%，费用非常低。这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要帮助中小企业的，因为中小企业财务比较弱，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基金的保证，从银行体系里取得融资，这点在台湾做得很成功。目前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四十年前也是通过这个基金来获得保护的，他在广东增城也有设厂，所以说这个制度在台湾实施得非常成功，到目前为止也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很重要的机构。

四年前上海市政府也有做类似的这个机构，大陆也有保证公司，但是大陆的保证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听说保证手续费将近 10%，目前为止保证公司好像不太成功。上海市政府在五年前说要学习台湾地区成立信用保证基金，当时的上海银监局长廖岷先生（现在是财政部副部长）曾经请我来做简报，希望帮上海市的中小企业成立类似的基金，来为其提供保证。因为银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没有担保品就不帮你确权，国内外都是如此。

台湾 1984 年成立了一个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对农民提供保证，只要是金额在新台币 500 万以下，由银行做放款后直接就送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来保证。因为台湾的农民耕地也少，天然灾害也多，比如台风、地震时常发生，所以遇到有灾害的时候，政府也会提出农业专案，通过这个基金来保证，到目前为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 1988 年才成立的华侨信用保证基金，这个基金是对海外华侨提供信用保证的。因为当年早期华侨到国外，主要做的是餐厅、理发等基层工作，三十年前台湾政府觉得应该帮助这些人，所以成立了华侨信用保证基金。美金 15 万以下，授权给华侨信保基金有合作的海外银行，包括外商银行可以贷款给他们，以此来保证八成到九成的额度。后来因为环境的改变，2009 年改为海外信用保证基金，这其中就包含对台商的保证。

现在在大陆投资的台商，海外信用保证基金也提供保证。我曾经在这三家基金都服务过，这三家基金是典型的对经济上的弱者提供信用保证，使他们可以从银行体系取得资金来扩大事业。

#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 着眼宏观大局·关注金融动态·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中国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本土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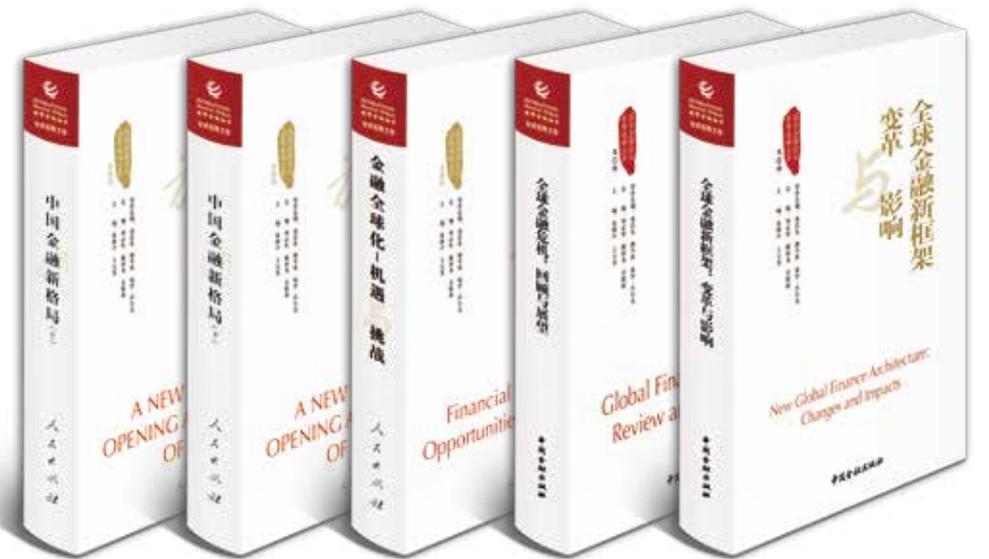


扫一扫加关注  
微信：IFFweixin



#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 出版声明:

-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 General Statement:

-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materials.
-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 may be subject to legal 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